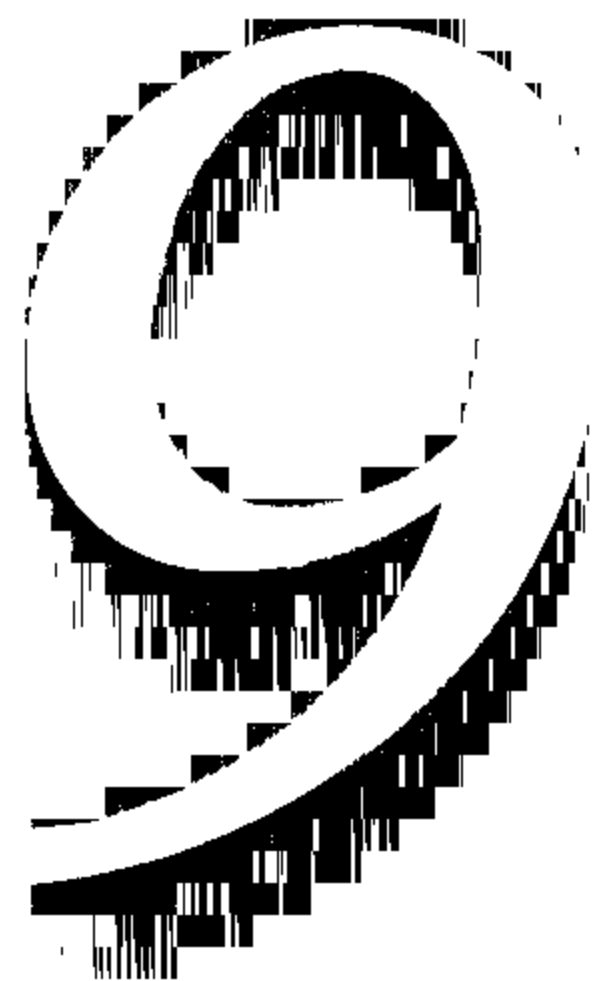


第九期 2004年7月號

# 批判與再造



新自由主義之後：帝國、社會民主——或社會主義？

市場囚籠裡的台灣媒體

中國勞工的全球化及其對國際勞工的影響

最野蠻最殘暴的私有化

勇敢的無產階級戰士——韓丁

白色的青春，黑色的記憶（上）

——一個與台大青年有關的「二二八」往事與「白色恐怖」的回憶

批判·進步·解放



批判與再造 no.9 定價 / 90元

ISSN 1811-9344



00090



9 771811 934006

# 第三屆 夏潮報導文藝營 2004

- I 活動時間：2004/8.27~2004/8.30
- 2 活動地點：天母農訓中心（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七段113號）
- 3 主辦單位：夏潮聯合會、人間學社、台灣立報社
- 4 協辦單位：傳記文學社、人間出版社
- 5 報名資格：大專院校在學學生、中小學教師或紀實文藝工作者
- 6 報名費用：學生 2000元、教師暨社會人士 3500元
- 7 招收名額：報導文學組50名 / 報導攝影組50名（額滿為止，錄取先後以繳費為準）
- 8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8月20日截止
- 9 繳費方式：郵政劃撥戶名：夏潮聯合會 / 帳號：19639094
- IO 召集人：陳映真
- II 營長：藍博洲
- I2 駐營作家：報導文學組：汪立峽、范振國、林深靖  
報導攝影組：李文吉、黃志翔、吳德淳
- I3 講師：報導文學：陳映真、鍾喬、成露茜、藍博洲、鄭鴻生、楊渡、楊祖璿  
報導攝影：郭力昕、鍾俊陞、黃子明、蔡明德、莊正原、張照堂、關曉榮  
紀錄電影：井迎瑞

【課程內容】

【報名表】

<http://www.xiachao.org.tw/signup.asp?type=041&classified=41&Signed=1>

夏潮聯合會 Chinatide Association

Tel: (02)2375-9558 / Fax: (02)2735-9035 / E-Mail: xiachao@giga.net.tw

>> 社會主義探索

01 新自由主義之後：  
帝國、社會民主——或社會主義？

著■李明騏 / 譯■李哲宇 關晨引

>> 媒體批判

11 市場囚籠裡的台灣媒體

■莊慧良

>> 全球化批判

21 中國勞工的全球化  
及其對國際勞工的影響

■陳佩華

>> 大陸思潮

28 最野蠻最殘暴的私有化

■楊帆

>> 紀念韓丁

33 勇敢的無產階級戰士

——韓丁

■金寶瑜

>> 歷史檔案

40 白色的青春，黑色的記憶（上）

——一個與台大青年有關的  
「二二八」往事與「白色恐怖」的回憶

■陳英泰

53 城裡城外

■葉芸芸

>> 文化廣場

57 【《弱勢群體之聲》第一集】

\* 誰是弱勢群體？

\* 弱勢群體的籍貫

■浪淘沙

62 光州，  
難以墜落的記憶……

■鍾喬

63 兩顆子彈

■施善繼

歡迎贊助 19803670  
批判與再造雜誌社

零售	90元 / 本	
訂閱	台灣地區（一般訂戶）	一年 1,000元
	（榮譽訂戶）	5,000元
	歐美地區	一年 50美元
	大陸、港、澳地區	一年 40美元
	亞洲地區	一年 45美元
【美金支票請寫明 Pay to Huang Te-Pei】		

發行人 范振國  
社長 黃德北  
總編輯 杜繼平  
執行編輯 陳乃慈 宋文揚

發行所 批判與再造雜誌社  
社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84巷12號  
編輯部 台北縣新店市德正街27巷29弄60號3樓  
電話 (02) 8914-7520  
傳真 (02) 8914-7520  
電子信箱 critra99@yahoo.com.tw

北市建商商號092字第255400號

新自由主義之後：

# 帝國、社會民主 ——或社會主義？

著■李明騏\* / 譯■李哲宇 關晨引

1980年代初以來，北美、西歐的資本主義大國，就孜孜於推行自由主義的政策與制度變革。在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大國和國際貨幣機構（國際貨幣基金會(IMF)與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的壓力下，拉丁美洲、非洲、亞洲和東歐等邊陲與半邊陲國家，採用了「結構調整」、「震盪療法」或「經濟改革」，根據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要求重建他們的經濟。

新自由主義的體制通常包含：降低通貨膨脹和維持財政收支平衡的貨幣政策（經常靠減少公共支出和提高利率來達成），以及「彈性」的勞動力市場（意指解除勞動力市場的管制並削減社會福利），和貿易與金融的自由化、私有化。這些政策是全球的統治精英（主要是資

本主義大國的金融資本）向全世界勞動人民發動的攻擊。在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下，數十年的社會進步與發展的成果已經逆轉了。全球收入與財富的不平等之大前所未有。世界上許多地區的勞動人民苦於貧困，整個國家陷入悲慘之境。

根據聯合國的《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所得到的收入與57%最貧窮的人的收入總和相等。世界上最富有的20%的人與最貧窮的20%的人之間的收入差距比例，從1960年的30：1，上升到1990年的60：1，1999年則為74：1，預計2015年時將達到100：1。1999年至2000年，有28億的人一天的生活費不到2

\*作者簡介：李明騏，1990-1992曾為中國大陸的政治犯。目前於加拿大多倫多的約克大學(York University)政治系教授政治經濟學。此文得益於與David Kotz, Robert Pollin, James Crotty, Gerald Epstein, Leo Panitch, Gregory Albo, Samuel Gindin和Patrick Bond的討論。

塊美金，8億4千萬人營養不良，24億人享受不到良好的醫療服務，此外全世界每6個學齡兒童，就有一位失學。估計全球的非農民勞動者約有50%不是失業就是未充分就業。（註一）

許多國家的勞動者苦於生活水平的絕對下降。在美國，從事生產和非管理工作的工人，他們每週的實際工資（按：1992年的幣值計算）已從1973年的315美元降為1989年的264美元。經過十年的經濟擴張之後，1999年達到271美元，但仍然低於1962年的實際工資。從1970年代就遭受新自由主義改造方案之害的拉丁美洲，大約有2億人（或46%的人口）生活貧困。在1980年到1990年代初期（1991-1994）之間，實際工資在阿根廷下降14%、在烏拉圭為21%、在委內瑞拉為53%、在厄瓜多爾為68%，玻利維亞則為73%。（註二）

雖然新自由主義的鼓吹者允諾，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或「結構調整」將帶來前所未有的經濟成長、技術進步、生活水平提高和物質繁榮。事實上在新自由主義的時期，世界經濟已逐漸走向蕭條。全世界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平均年增長率已逐漸衰減，從1950年至1973年間的4.9%、退到1973年至1992年間的3.0%，而在1990年至2001年更衰減為2.7%。1980年到1998年間，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包括所謂的「轉型經濟」（譯按：指蘇聯、東歐等由政府指令型經濟轉向資本主義經濟的國家）中，有半數其GDP的實際人均產值下降。（註三）

世界經濟之所以至今未逢大難是靠美國以債務資助的經濟支撐住的。1995年至2002年，世界GDP累增的增長額有96%是美國經濟所創造。（註四）美國經濟擴張的資金源於：縮減國內儲蓄，提高私人部門的債務水平，以及連年巨額且不斷攀升的貿易經常帳赤字。這樣是無法持久的。這種巨大的不平衡總

得加以矯正。如果美國無法再滋生日益上升的經常帳赤字，而又沒有其他的巨大經濟體可以有效地充當自主的驅動力，新自由主義的全球經濟就會處於強大的衰退壓力下，且受到金融危機的威脅。

新自由主義所導致的社會經濟災難，已到處引起越來越多人民的抵抗。而全球經濟情勢更進一步的惡化，也將促使千百萬人忍無可忍。所以不能排除會出現全球反抗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運動。自許為左翼的改革者與革命份子首先在思想上必須準備好面對這樣的發展。

### 新自由主義與全球性的不景氣

新自由主義無法提供一個讓全球資本持續積累的制度框架。它侵蝕並拆解了為穩定資本主義經濟與緩和資本主義社會矛盾所建立的制度。資本主義的全球經濟因而被置於頻率升

註一：United Nations,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and 2002); James Petras and Henry Veltmeyer, Globalization Unmasked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2001), p. 24; 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State of Food Insecurity in the World, 2003 (Rome, FOA, 2003).

註二：參見Dollars & Sense, Real World Macro (18th edition, Cambridge, Mass.: Dollars & Sense, 2001), Appendix 3; Duncan Green, Silent Revolution (London: Cassell, 1995), p. 91 and Appendix A.

註三：Editors, Monthly Review, "The New Face of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April 2002, 1-14.

註四：Stephen Roach, "Global: Do Imbalances Matter?" Morgan Stanley Global Economic Forum, [www.morganstanley.com/GEFdata/digests/latest-digest.html](http://www.morganstanley.com/GEFdata/digests/latest-digest.html), September 2, 2003.

高、震幅加劇的金融危機中。誠如《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的主編所言：「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下的全球化，在許多方面意味著蕭條的趨勢與金融危機的全球化。」(註五)

全球的有效需求，是全球的個人消費、全球的私人投資與全球各地政府支出的總和。然而在新自由主義當道下，全球的不平等已達到史無前例的地步，世界的勞動人民已遭受絕對貧困化之苦。結果就是全世界大多數人口的購買力下降或是增長地比世界的產出還慢得多。

私人投資因全球生產過剩而停滯下來，私人資本轉向金融工具的投機。由於金融市場的自由化，跨國界的投機資本大幅增加，加劇了資本抽逃的危險與金融危機。有些中央銀行為對抗這樣的危險，被迫維持高利率，實際上卻是為全球金融資本付保險費。在7個資本主義的大經濟體裡，其實際利率對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的平均比率，分別為，1881年至1913年的0.97、1919年至1939年的2.40、1946年至1958年的0.36、1959年至1971年的0.55、1972年至1984年的0.47，以及1985至1997年的2.34。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二戰期間的大蕭條與新自由主義當道這兩個時期，實際利率才高於經濟成長率。這樣的現象意味著生產性投資與投機性投資的重要性顛倒過來了，而這也就是體系危機的導因。(註六)

在新自由主義主導之下，政府大都施行財政與貨幣的緊縮政策，抑制公共支出。隨著金融市場的自由化，有財政赤字的政府，易於遭到私人投資者以抽逃資本或攻擊通貨施加「懲罰」。因此政府(尤其是邊陲與半邊陲的政府)就有刪減公共支出以維持財政平衡的強大壓力。所有新自由主義的政策都會力求限制政府的公共支出。總之，在新自由主義時期，構成全球有效需求的三個組成部分，都受到強大的縮減壓力，有緊縮或停滯的趨勢。

19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有制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我們可以說，生產的日益社會化已經表現在固定資本的日趨重要與金融結構的越趨複雜又相互聯繫。自凱因斯(Keynes)之後，很多的經濟學者已經了解到，固定資本的投資根本是不確定的，經常超乎理性的計算。投資者的信心與心理狀態的驟然起伏可能導致投資以至整體經濟激烈且巨大的波動，金融結構與日俱增的複雜性更大大增強了這樣的風險。為了防止資本主義經濟深陷於衰退或蕭條當中，就必須要有一個能有效發揮總體經濟穩定作用的「大政府(註七)」。

新自由主義汲汲於金融自由化與攻擊公共部門，在某些實例中已大大損壞，甚至徹底卸除了政府的穩定作用。在新自由主義時期，已經見到日益頻繁的劇烈金融危機。1995年墨西哥的金融危機之後緊接著是1997年的亞洲危機，1998年俄國與巴西危機，以及2001年的阿根廷危機。全球總體經濟穩定一直是靠美國財政部以及美國進口的商品與勞務日益超過美國出口來維持；而這還能持續嗎？

註五：Editors, Monthly Review, "The New Face....."

註六：會計上的事實顯示，如果實際利率比經濟增長率更高的話，那麼私人和公共部門的債務就會傾向於比收入或政府歲入增長地更快(假設財政收支差額是零)，從而導向越來越高的債務—收入比率。實際利率的資料，參見David Felix, "Asia and the Crisis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in Dean Baker, Gerald Epstein, and Robert Pollin (eds.), *Globalization and Progressive Economic Poli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63-196.

註七：Hyman P. Minsky, *Stabilizing an Unstable Econom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美國的金融泡沫化與失衡

如果沒有一個大型的經濟體產生自主需求的話，全球經濟可能已進入螺旋型的不斷衰退。1990年代後期美國經濟的繁榮與其龐大且不斷增長的貿易赤字，發揮了制止新自由主義的矛盾普遍蔓延的作用。

美國經濟的繁榮肇因於靠借貸支撐的私人部門消費與公司競相大舉投資於高科技產業。私人部門的收支差額（收入減掉支出）過去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4%，至1990年代卻史無前例地變為負數，在2000年的第三季，甚至達到了負5.5%。家庭與公司部門的負債佔GDP的比例達到了歷史的高峰。家庭部門願意並且有能力去借貸如此高的額度，是因為資產價格的巨大泡沫。用Tobin的「Q」指標〔資產（譯按：指股票等有價證券與房地產）的市場價值與資本（譯按：指機器、廠房等生產設備）的更新成本之比〕，或參考本益比（股價與盈利之比）來衡量，美國在2000年股票市場膨脹到極至所造成的泡沫之大，為美國經濟史所僅見。（註八）

股票市場的泡沫一爆破，公司部門的支出便明顯緩慢下來（特別是「高科技產業」）。為了避免嚴重的衰退，美國政府於2000年至2003年間的財政收支，由佔GDP 1.4%的盈餘，轉變成佔GDP 4.6%的赤字，或在6%的GDP擺蕩，而美國聯邦準備銀行則將短期利率由6.5%降為1.25%。

雖然實行了大為寬鬆的財政與貨幣政策，美國的經濟增長仍有氣無力，就業狀態停滯不前。這些政策實際上是幫助維持了金融的泡沫。家庭部門的債務依然繼續擴張，股票市場的泡沫也沒有完全戳破，房地產的泡沫接著又達到高峰。

2002年末，美國的貿易經常帳赤字高達GDP的5%，大部分是它在國際商品與勞務貿

易的赤字逐步增加所致。作為資本主義的世界霸權竟有這麼巨額的經常帳赤字，這是史無前例的。對比之下，也曾是世界霸權的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經常帳盈餘接近GDP的4%。

從世界其他地區流入美國的資本相當於美國的經常帳赤字額。美國經常帳赤字要能持續不斷提高，世界其他地區就必須願意在他們的金融儲備金中以越來越高的比例持有美元名義的資產，摩根·史坦利（Morgan Stanley）公司的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區（Stephen Roach）指出：「目前，全世界所有的外匯準備金大約有75%是以美元名義的資產方式持有——這個數額比美國所佔世界GDP的32%（按市場匯率計）還高出兩倍多。同時，外國投資者持有美國財政部巨額債務的約45%，公司債的35%與12%的美國股票。所有這些比率都是（或者接近）紀錄的最高點。全世界從來沒有把這麼多股票放在美國——這些股票既充當經濟增長的引擎，也充當金融價值的儲存。問題是，如果把上述這些數字放到未來來看，又顯得太微不足道了。」（註九）

註八：新自由主義和90年代美國的擴張，參見David Kotz, "Neoliberalism and the U.S. Economic Expansion of the 1990s," *Monthly Review*, April 2003, 15-33. 美國家庭和公司部門的負債，參見Wynne Codley, "The U.S. Economy: A Changing Strategic Predicament," *The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www.levy.org](http://www.levy.org), 2003. 美國股票市場的估價的統計數字，參見John Y. Campbell and Robert J. Shiller. "Valuation Ratios and the Long-Run Stock Market Outlook," *Cowles Foundation Discussion Paper No. 1295*, Yale University, 2001.

註九：Stephen Roach, "The Heavy Lifting of Global Rebalancing," *Morgan Stanley Global Economic Forum*, May 27, 2003.

以當前匯率計算的美國經常帳赤字額，要在未來顯得「微不足道」，其實不必太久。徵稅經濟學研究會（Levy Economics Institute）的一項研究，用堪稱合理的假設指出，若美國經濟要達到足以降低失業率的經濟增長，美國的外債淨額就會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的60%，且在2010年前經常帳赤字將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8.5-9.5%。

### 全球經濟危機的另外幾種可能發展

美國承受不了經常帳赤字永無止境的增長，要扭轉赤字持續惡化，有四種可能的方式。首先，如果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增長比美國當前的經濟增長率快得多，就會增加對美國商品和勞務的需求，美國的出口便得以比較快速地增長來彌平進出口的差距。第二，美國經常帳的赤字能藉由緊縮美國的國內需求來矯正。第三，可用調整「相對價格」即：美元的貶值來制止經常帳赤字的暴增。最後，運用政治與軍事權力可能改變造成美國經常帳赤字增長的因素，使之有利於美國。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第一種可能性，即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增長能比美國當前的增長快得多，是無望的。第二和第三個方式雖然可行，但會引發重大的危機。

提高美國國內利率以限制美國的經濟增長，從而限制進口與貿易的赤字，美國決策者當然知道理論上可以這麼做。實際上，世界其他國家要是發現自己有了像美國這樣的經常帳赤字的難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定會開出這帖「正宗」的藥方。但美國可不像一般的其他國家，它是這個世界的霸權國家，沒有任何一個機構能強迫美國服下這劑藥。對美國的統治菁英來說，這條路不具政治上的可能性，至少在選舉週期的這個階段不可行。但關係更重大的是，美國消費信貸和抵押借款空前的巨

額累積所引發的危機。若國內經濟沒有大幅增長（增長本身會加重經常帳的困難），利率持續升高就有造成像「大蕭條」時期那樣大規模的個人破產浪潮的危險。

美元的貶值是剩下的唯一選擇，相當清楚的是，美國財政部偏好使用控制美元逐步貶值的政策，且已付諸實行。美元貶值對美國的家庭和公司來說，國產品會變得較便宜而外國產品較貴。這幫助刺激出口和抑制進口，然而美元的貶值降低了美國對外國產品的需求，把通貨緊縮的壓力轉嫁到世界其他地區。

亞洲經濟體（日本、中國和東南亞）握有的經常帳盈餘一年總共近2300-2400億美元，近乎美國經常帳赤字的半數。但亞洲經濟體或者將他們的通貨釘住美元，或者為了避免貨幣升值而大力干預。這使得調整的重擔幾乎全落在歐洲身上。

歐洲經濟沒有能力擴張國內需求，它的成長完全依賴出口。歐洲最大的經濟體，德國，正處於衰退狀態，其他地區出現的增長信號，在德國仍很微弱。因此美元的貶值對歐洲經濟特別具有威脅。再者，歐元區政府被所謂的「穩定和增長協定」所約束，財政赤字不能高於3%的國內生產總值（GDP）。

金融界敦促歐洲政府進行「結構改革」，讓勞動與產品市場的政策向美國標準看齊。他們以為「結構改革」會釋放生產力的增長，「終究」能創造出強勁的需求擴張的條件。從金融資本家的觀點來看，要有強勁的資本積累，必須大幅增進獲利率與資本家的信心。而要讓資本家有信心，就必須進行「結構改革」挫敗勞工階級的抵抗。此際，仍不能確定歐洲的資產階級可徹底擊垮勞工階級的抵抗。但是，如果確實實行所謂的「結構改革」，不論對資本積累「終究」可以有什麼樣的「積極」效果，但對國內需求的負面效果（透過對勞動



人民的生活水準更進一步的打擊)理所當然的會更為重大。

在歐洲經濟不景氣下，要歐洲吸收足可矯正美國經常帳赤字的美國輸出品是不可能的。要完全依靠美元貶值來矯正經常帳赤字，美元的價值就得慘跌。根據一些評估，美元可能得跌30-50%才行。而這樣的下跌在政治上、經濟上和心理上都是令人難以接受的。(註十)

如果美元不對其他貨幣貶值，經常帳赤字何以必須矯正？如果世界其他國家的中央銀行持續干預，讓世界充斥他們各自的貨幣(歐元、日圓、中國人民幣)以避免美元貶值，為何美國不可能永無止境地積欠越來越龐大的經常帳赤字？之所以不可能沒有限制，是因為美國不斷上升的經常帳赤字吸收了越來越高比例的全球儲蓄。從理論上說，在全世界的儲蓄都被耗盡，用來填補美國的經常帳赤字之際，就到達了極限。但是實際的限度遠比理論上的限度到達之前就會到頂了。這個過程會提高美國和日本政府的債務至極為龐大的額度。這些巨額的政府債務將和美國及歐洲境內的家庭和公司的債務並存。(註十一)

這些債務能怎麼處理呢？有兩種可能，第一，全球的經濟蕭條和廣泛的家庭及公司的破產，可以勾銷大量的私人債務。先前所有資本主義體系的危機都是用這種方式解決的。理論上，一旦債務的價值貶降，就逐漸浮現能讓資本在更高水準重新循環積累的條件。但是，上一回的全球大蕭條，由於壟斷資本之故，這種自發性的復甦力道並不夠強勁，而今天的壟斷資本更為強大了。因此選擇這種方式就一定會有一段拉得更長的蕭條期。不管這個假設的結果是什麼，可以確定的是，新自由主義如果不是永遠，也會有很長一段時間被棄之不顧。

第二，可以用印鈔票造成通貨膨脹的方式來打消巨大的私人及公共部門的債務。由於需

要打消的債務規模極為龐大，這種通貨膨脹的策略會使全球經濟陷入超級通貨膨脹和利率猛升的惡性循環中。如果有一種選擇是全球各類統治階級所絕對不取的，那就是這個選擇。

## 朝向帝國的解決方式？

在現存的剝削、壓迫的框架裡是否有解決危機的辦法呢？美國經濟陷入極深的危機，而以美國在世界經濟所發揮的作用，世界經濟深受其影響。但是美國帝國主義持續控制了世界上最強有力、未受搖撼的軍事力量。美國的統治菁英能用武力建立一個剝削的帝國，一個空前的能在政治和軍事上遍佈全世界的支配勢力，且在這過程中處理它的經濟危機嗎？事實上，美國目前的政策正是企圖做到這一點。

為了抑制美國經常帳赤字的激增，必須減少進口。其中的一個辦法是，重估日圓與人民幣的價值，讓汽車、電子產品這類主要進口品的美元價格提高，以減少進口。這只有靠政治壓力才能做到，而且也正在這麼做。其他大量的進口，如衣服和鞋子沒法減量，因為美國的生產者不再能供給境內所需的產量。這些產品的成本可藉著殘酷的最低價競爭(race to the bottom)而壓低——不斷把生產轉移至更貧困

---

註十：參見Martin Wolf, "The Rake's Progress of the Dollar Comes under Threat,"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8, 2003.

註十一：關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當前公共及私有部門債務的劇增和超級通貨膨脹的潛在危機，參見Joachim Fels, "Europe—All: Too Much Debt," *Morgan Stanley Global Economic Forum*, September 5, 2003; Tim Lee, "Inflation Is a Bigger Danger than Deflation," *Financial Times*, May 27, 2003; Martin Wolf, "The Fine Line between Deflation and Inflation," *Financial Times*, May 28, 2003.

和更渴求訂單的國家。在某些地區美國還運用武力強制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造成驚人的災厄，細想美國干預尼加拉瓜和非洲的結果即可得知。但是美國主要的進口品是礦物燃料，它們的長期成本只能靠美國控制自然資源來保持低價供應。調節生產和價格的樞紐必須由美國控制。這是美國的全球政治權力運用軍事力量謀取經濟利益的一個方面。

要抑制經常帳赤字難以承受的增長，另一方面的策略是擴張美國的出口。然而美國製造業基礎已衰落不振，只有寄望於像「知識產權」的壟斷價格才可望擴張出口值。同樣的，要強制取得專利權、基因改造種子、藥品、歌曲和電影的壟斷價格，全靠以軍事力量為基礎的政治權力。

但是這個帝國計畫如何籌措資金？美國軍事花費的擴張可能使美國的經濟危機更趨惡化而不是緩和。摩根·史坦利公司的史蒂芬·羅曲（Stephen Roach）問道：「儲蓄短缺的美國經濟能繼續資助一直擴充的軍事優勢嗎？」他的答案是：「綜合歷史、地緣政治學和經濟學的知識，使我更加確信，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是條無法持續的道路。」（註十二）

美國的軍事擴張能為自己的擴張取得資金嗎？摩根·史坦利公司的安迪·謝（Andy Xie）評估，美國佔領伊拉克可直接和間接地替美國省下每年花費在石油進口的近400億美元。（註十三）即使這些「利益」能充分實現，也只不過佔美國經常帳赤字的一小部分而已。

但面臨伊拉克人民越來越普遍的抵抗，美國尚未能實現這些規畫中一丁半點的「利益」。在所謂的「主要戰鬥軍事行動」結束數月後，儘管美國調派了一半的正規軍至伊拉克，美國仍無法掌握伊拉克，不能控制道路、邊界、水和電的供給。

從美國的33個作戰旅中，分別派遣了16旅

至伊拉克，2旅至阿富汗，2旅至南韓，1旅在科索沃（Kosovo）。而在美國境內的12旅中，有3旅正在接受現代化訓練，有3旅為可能發生戰爭的朝鮮半島而待命，有2旅準備支援在阿富汗的部隊。只剩4旅要支援在伊拉克的16個旅。事實上，美國耗盡了所有的正規軍，只為佔領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種極窮困的第三世界國家。

不論在經濟上是「耗費」或是「得利」，美國帝國主義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都打了敗仗。根據位於華盛頓的全球態度計畫（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的最新調查顯示「美國在全世界的形象急劇轉壞。」（註十四）美國奠基於武力的全球新自由主義帝國的計畫已經挫敗。這不單只是因為資本主義體系運行的固有限制使然，同時更是因為想用全球的軍事優勢避免新自由主義政策產生的經濟危機的企圖，已在伊拉克人民群起抗爭中碰了壁。新自由主義的危機隨之將至。

## 朝向社會民主主義？

後自由主義世界將會是什麼樣子？其中一個可能是返回社會民主資本主義。1950年至1973年之間，伴隨社會民主的制度，像是大型政府、凱因斯主義、階級和解、收入和財富的重分配、資本的管制，世界資本主義經歷了偉大的「黃金時期」。有25年之久，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享受了快速的經濟成長、低失業率、

註十二：Stephen Roach, "Worldthink, Disequilibrium, and the Dollar," Morgan Stanley Global Economic Forum, May 12, 2003.

註十三：參見Andy Xie, "Asia Pacific: The Ying-Yang World Reloaded," Morgan Stanley Global Economic Forum, June 2, 2003.

註十四：Financial Times, June 4, 2003.

生活水準提高和社會穩定。邊陲和半邊陲國家能夠透過「進口代替」或「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在國家發展上有所進展。返回社會民主主義能夠使偉大的黃金時期再現嗎？

在社會民主資本主義下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矛盾並未停止發展。在某些限度內，社會民主制度幫助減緩了階級衝突並維持了較高水平的總需求。在某些歷史條件下，這些制度和高而穩定的利潤率調合一致並且有利於快速的資本積累。然而，隨著這些制度的建立與運行，逐漸產生出愈益侵蝕全世界資本積累的新情況。資本和勞動間以及核心和邊陲間權力平衡的改變，導致全世界獲利率的衰退，促成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積累危機。（註十五）恰恰是針對社會民主資本主義的危機，全球統治精英才開始尋求新自由主義做為此危機的「解藥」。

假設目前的危機要以社會民主為基礎來解決，重新由國家管制貿易和資本流動，勞動和金融市場再受規制，收入和財富以平等的方式進行有意義的重新分配，而公共部門也再度在經濟中發揮重要的作用。這些改變是否足以開展一個新的黃金時期？不改變資本主義的基本制度，怎麼阻止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發展呢？又怎麼防止「新的」社會民主資本主義再陷入積累的危機呢？

社會民主資本主義要能建立，至少須有勞工階級在政治上的局部勝利。但是果能如此，世界上不同地區的勞工階級所要求者當不僅回復他們有過的社會和經濟權利，並鞏固他們現有的權利，同時也會要求擴大這些權利。這些新的社會改革所需要的資金從何而來呢？如果必須靠對資本家的利潤徵收額外的稅，那麼社會民主制的復甦，在勞工階級恢復談判權力後仍然可以存活嗎？壟斷階段的全球資本主義的特點就是經濟停滯，二戰後黃金時期的增長率

只是壟斷資本主義的例外狀況，沒有這種增長率，社會民主資本主義是不可能建立的。

還有其他問題是復甦的社會民主資本主義不能夠處理的。社會民主資本主義能提供必要的制度框架來處理全球環境的危機嗎？環境上的投資和管制增加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總成本（這不能和環保產業可為一些個別的資本家創造獲利機會混為一談）。問題是，完全納入環境成本後，剩下的利潤是不是還足以讓資本積累至適當的水準。但更有可能的是，在由民族國家構成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競爭會阻止各國充分考量環境成本。這樣一來，社會民主資本主義就會只是朝向全球生態大災難的「另類」方式。

## 重新評價社會主義

馬克思曾說資本主義的歷史合理性是發展生產力。資本主義在發展生產力上顯然卓有所成。它同時已替佔居上層的全世界15-20%人口帶來物質財富。然而，資本主義卻絕未滿足生活於邊陲和半邊陲的絕大多數人的生理和情感上的基本需求。事實上，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質疑，自形成資本

註十五：關於壟斷資本主義的停滯趨勢和凱因斯理論政策的限制，參見Paul A. Baran and Paul M.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6) and Harry Magdoff and Paul M. Sweezy, *Stagnation and the Financial Explosi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7).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和勞動之間的權力平衡的變化，世界獲利率的衰減和資本積累的危機，參見Samuel Bowles, David M. Gordon, & Thomas E. Weisskopf, *After the Waste Land* (Armonk, N.Y.: M. E. Sharpe, Inc., 1990) and Philip Armstrong and Andrew Glyn, *Capitalism since 1945*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1991).

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以來，對世界人口中大多數的窮人來說，生活品質是否有任何改善，實大有疑問。（註十六）

在20世紀，人們歷經了2次可怕的災難，而這災難是由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所引起的帝國主義戰爭。過去的25年是人類歷史的另一黑暗期。在新自由主義之下，不平等、壓迫、剝削又達到了極致。同時，在資本主義體系下，人類正快速奔向全球生態的大災難中。

鑑於新自由主義所引起的巨大社會和經濟的災禍，有必要重新評估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10至15年前，前蘇聯、東歐、中國大陸和古巴的國家社會主義經驗，普遍被認為是一大失敗。除了不民主的特點，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被認為已經失敗，因為從效率和技術創新來看，他們不及資本主義社會。有一段時期，許多人試圖設計「可行的」社會主義新模式。這些模式中有許多想要納入諸如市場、競爭和私人誘因的資本主義的特點來達到和資本主義相同的效率。

現在很少人會懷疑蘇聯和東歐的大多數人，在國家社會主義下的生活比在目前「自由」和「民主」的資本主義更好。甚至在中國大陸，這塊全世界最有活力的經濟中，自1990年代初開始的資本主義改革，大大降低了農民和城市勞工階級的生活水平，在許多方面（健康醫療、教育、職業安全和工作環境），極大比例的中國勞工階級比毛澤東時期的生活水平還低。

國家社會主義的歷史成就不該被低估。它讓有工作能力的男女成年人可以充分就業和享有職業安全（免於失業的恐懼），這當然是極為重大的成就。眾所皆知，國家社會主義在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營養、保健、教育、居住、退休養老金）以及改善婦女處境上，比相同經濟發展水平的資本主義國家更為出色。蘇

聯、東歐和古巴的社會主義已做到了滿足實際上所有基本的社會需求，這是一項大多數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所無法宣告的成就。

社會主義與今天對抗新自由主義會有什麼關聯？隨著新自由主義的危機加深，許多邊陲和半邊陲國家（如拉丁美洲）的情勢已發展至若不徹底與國際金融資本、帝國主義國家以及代表他們利益的國際機構切斷關係，那麼在付給跨國金融資本高比例的每年產出後，就連只是用來進行社會的簡單再生產的資源也一點不剩，更別提要對付嚴重的社會問題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唯一有利於大多數人民的明智之舉，就是徹底打破現存的國際資本主義秩序。國家經濟需要改造結構，使資源轉向為基本需求而生產，而不是著眼於生產出口至核心國的產品，在不平等交換的條件下，進口滿足特權精英的奢侈消費品，和進口用來再生產出既有的國際分工模式的生產資料，以產生償付債務和填補資本外逃漏洞的「貿易盈餘」。但是這樣的安排必然會與大型的金融和工業資本家的利益起衝突。到某一階段，為了能持續經濟和社會的轉型，就必須施行主要生產資料的國有化並展開全面的經濟計畫。

在前蘇聯、東歐和中國大陸，腐敗的資本主義私有化過程，令人民極為不滿。一旦發生社會革命，把所有非法私有化的資產重新國有化會是人民渴盼的要務之一。重新國有化的資產將構成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社會主義在邊陲和半邊陲國家中的復興可能會掀起新一波的世界社會主義革命。

下一輪的社會主義革命會比20世紀的革命

註十六：Immanuel Wallerstein, *Historical Capitalism with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London: Verso, 1995).

實行地更好嗎？社會主義能用什麼方式證明它本身比資本主義好？大衛·柯茲（David Kotz）在總結蘇聯社會主義的歷史教訓後認為，單從經濟的角度來看，中央計畫的國家社會主義是個行得通的體系。蘇聯之所以崩解是因為親資本主義的政治聯盟（包括大多數的官僚精英）崛起並掌握權力。柯茲建議，未來的社會主義要能生存發展，必須建立民主的政權和其他制度，以避免滋長擁有特權的統治精英。（註十七）

假如未來社會主義的社會立基於民主政治，未來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將如何組織和安排呢？對這個議題目前已有許多的理論貢獻可供參考，此外，未來社會主義運動當然能在實際的歷史鬥爭中，發展出許多種新制度、新措施。最終，未來的社會主義必須組織成能處理資本主義所無法解決的歷史矛盾的經濟模式。

有國家社會主義的歷史紀錄在先，我們可以很有信心地認為，以生產資料大部分公有和民主計畫（對社會盈餘的配置採民主控制）為基礎的經濟體系，很可能得以滿足社會所有成員的基本需求。如果能做到這點，那麼社會主義至少能為世界上60%-70%最貧困的人們帶來更好的物質生活，而在資本主義體系底下，他們的基本需求卻從未被滿足過。

社會主義為人類避免全球生態災難並在人類與環境間建立和諧的關係，提供最好的希望。在這方面，國家社會主義的紀錄並不令人

贊許。但這項紀錄應放在其歷史環境中來理解。除了國家社會主義計畫所具有的官僚、不民主的特性之外，國家社會主義社會還被迫從事軍事和經濟競爭來對抗虎視眈眈的資本主義勢力。在這樣的處境下，他們被迫犧牲一切來「發展生產力」。

希望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能有好一點的、大體上親善的外部環境（如果還不會有社會主義的世界政府出現的話）。在那樣的情況下，就不會有外部的壓力來逼迫未來的社會主義用不平衡的方式快速發展生產力。假如實行了政治民主和社會計畫，人民就能依據他們的偏好，經過討論決定要產生多少剩餘，並決定剩餘要如何配置。透過民主化過程，一般公眾將能了解必須要有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在權衡其他需求和慾望（包括追求物質享受的慾望）之後，會把環境保護列入經濟計畫中。除非我們相信人們總是滿腦子資本主義思想，總是貪求無度，不顧因此而會對下一代造成什麼樣的後果，否則維持人類生存的環境，看來當然會成為未來社會主義計畫中的至高目標之一。◎

譯自：《Monthly Review》，2004年，一月號。

註十七：David Kotz, *Revolution from Abov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 感受你熾熱的心

本刊創刊後承蒙各界捐款贊助，謹申深摯的謝忱

梁先生 16000元 / 葉島蕾小姐 5000元 / 陳映真先生 5000元 / 關曉榮先生5000元

鍾先生 3000元 / 梁克萍小姐 2072元

在自由主義的教條中，只要排除政府的檢查、管制，讓媒體在自由市場中競爭，媒體就能自由報導攸關國計民生的重要訊息，提供思想言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空間，滿足公眾知的權利，從而有利於為民主政治培養見多識廣、熱心參與政治的理性公民。然而，事實不然。美國傳播學學者麥克切斯尼(R. W. McChesney)在他的名著《富了媒體，乏了民主》(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中，痛切指陳：在新自由主義橫行無忌下，媒體日趨集中、壟斷，受利潤驅動、廣告支持的媒介體系，競逐市場利潤，受制於廣告主，鄙視新聞專業，輕忽公共利益，媒體內容充斥著暴力、色情與低級趣味，壓

制挑戰自由市場的言論與行動，剝除了公民瞭解他們的處境與管理自身生活的能力，促使公民對政治冷漠，日益成為受政客、利益集團操縱的對象，因而媒體實為民主的毒劑，在全世界都形成一股反民主的惡勢力。這篇深入調查台灣媒體生態的報告，極為生動地印證了麥克切斯尼的論點。【編者】



台灣媒體大亨王令麟赤裸裸地道出了資本家的心態。

■莊慧良

# 市場囚籠裡的台灣媒體

**摘要** >> 1988年台灣開放報禁，加上有線電視的開放，台灣所擁有的媒體密度幾乎是全世界最高的，但10多年來，曾在台灣走向民主之途扮演過積極角色的新聞媒體，今天卻成為社會的主要「亂源」之一，擺脫政治力束縛的媒體，卻掉入市場機制的囚籠中。本文分別從媒體追逐收視率（或閱報率），以及廣告主對媒體的箝制等幾個方面，來探討市場機制對媒體及媒體工作人員所造成的影響。

關鍵詞：新聞、媒體、市場機制、民主、收視率、廣告主



《天下》雜誌在2002年4月，以「弱智媒體，大家一起來誤國？」為封面故事，當時在傳播界引起強烈的震憾。同年該雜誌的「國情調查」結果顯示，媒體被視為台灣的主要亂源之一，而且，台灣人民對於媒體的不信任度達37%，高於信任度22%。（楊瑪琍，2002）

曾獲得普立茲新聞獎的美國《華盛頓郵報》記者卡爾·伯恩斯坦，曾在1992年批判美國新聞界造就了白痴文化。他說：「我們已經偏離真正的新聞，而逐漸創造出一種沒有內容的訊息式娛樂，我們教導讀者與觀眾，瑣碎的事反而是重要的，庸俗而窺視性的消息比真正的新聞還要重要。」（轉引自楊瑪琍，2002）這些話用來形容今天的台灣媒體也相當貼切。

自從1988年開放報禁以來，媒體如雨後春筍興起，特別是有線電視開放後，百家爭鳴，以台灣這個蕞爾小島所擁有的傳媒密度幾乎是全世界最高之地。但是，10多年來，媒體似乎從政治力的束縛中掙脫，卻掉入商業力量所掌控的漩渦中。

特別是過去這3年，台灣經濟嚴重衰退，媒體歷經前所未有的寒冬，廣告業務大幅縮水，媒體裁員、關門時有所聞，政府「置入性行銷」的作為也不再遮人耳目。

在新聞媒體方面，為追逐高「收視率（或閱報率）」，一窩蜂的現象非常明顯，大家都在競逐中產階級這塊大餅，導致新聞的雷同性很高，頻道雖多，內容貧乏，位於社會金字塔端的菁英階層，以及處於弱勢的農民、勞工等群眾的需求均被忽略。

而新聞媒體之所以追逐高「收視率（或閱報率）」，乃因媒體私有化後，必須靠廣告收入生存，相互競爭以吸引廣告主的注意，為廣告主服務，所以私有媒體在政治上趨於保守，且為了提供商品廣告合適的環境，偏愛娛樂節目而不喜歡公共領域。

職是之故，把有錢的觀眾提供給廣告主是

私有媒體的首要目標，為觀眾服務只是方法而非目的，於是廣告主所賴以評估的「收視率（或閱報率）」主宰了媒體的內容走向，媒體未能完全秉持新聞良知，卻以觀眾（讀者）有「知的權利」為由，鉅細靡遺報導八卦、羶色腥的新聞，各種色情暴力、怪力亂神的節目充斥在各大媒體之中，尤其是有線電視24小時不斷重覆播送，甚至連向來被期許為較中立、淨化的新聞節目也被「綜藝化」、「連續劇化」，毋怪乎媒體被社會大眾批評為三大「公害」之一。

為制衡媒體亂象，「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媒體觀察基金會」、「閱聽人聯盟」、「中華民國廣告主協會」等團體陸續成立，但未發揮應有功能，徒增爭議。

很多媒體工作人員對此都感慨良深，原以為解除戒嚴，開放報禁，政治勢力鬆綁後，在市場競爭的機制下，台灣媒體會有更大的伸展空間。然而，10多年來的歷史經驗顯示，媒體為爭逐收視率（或閱報率）以吸引廣告主，惡性競爭與日俱增，作為媒體工作者的一分子，人人備感無奈，卻又不得不屈從其下，鎮日囫圇吞棗一些無法立即求證，卻不得不「有聞必錄」的報導，媒體工作者的尊嚴受到強烈質疑和傷害，更嚴重的是對社會產生負面的影響，在台灣的民主逐漸惡化為民粹之際，媒體也不自覺成了幫凶。

此外，《蘋果日報》去年登台後，除了大膽的羶色腥新聞引起廣泛關注外，同時也提醒台灣媒體應重視讀者的看法。在追逐高「收視率（或閱報率）」的同時，如何兼顧「閱聽人」的聲音與媒體應負的社會責任，對媒體是相當嚴苛的挑戰。

## 一、媒體競逐收視率（和閱報率）

對業界而言，收視（聽）率是一個回饋機制，其作用就像神經系統之於人體一樣，「廣播合作分析」（CAB，Cooperative Analysis

Broadcasting) 在1930年代開始第一個收聽率調查系統前，廣告業其實是「盲目飛行」的。由於閱聽人的數目決定了廣告的銷售與價格，導致電視快速茁壯，成為最有力量的傳播及廣告媒介。(Beville,1985)

從正面效益而言，收視率(或閱報率)確實有助於了解大眾對媒體所提供的節目和內容的評價，有一個參考的回饋機制，媒體更能檢討改進，製作更符合大眾口味的節目和內容。

但是，從台灣1987年解嚴以來，大眾媒體為迎合大眾口味，特別是電視所提供的節目，品質日益低俗，被批評得體無完膚，收視率被視為導致優質節目消失的罪魁禍首。(Beville,1985)

### 1. 收視率掛帥，電視節目庸俗化

《東森》S台的〈青蓉K新聞〉節目，今年過年時，安排當時爭議性極高的許純美和柯賜海同台，果然效果奇佳，收視率一舉衝至0.65%，是平常的二倍多，《東森》新聞台見狀，不由分說隨即拿去重播，又創下高收視率，於是該節目至少在兩台重播了兩、三次，令友台十分眼紅。

《年代》電視台隨即跟進，找了如花上節目，主播張雅琴的「處女說」更引發社會爭議，事件愈吵愈熱，「閱聽人聯盟」找「廣告主協會」施壓，連新聞局也對始作俑者的《東森S台》開出罰單，此事目前仍在申訴中。

〈青蓉K新聞〉的製作人回顧當時的情形，她表示，今年過年時，正逢總統大選，很多人都對政治新聞感到厭煩，為了提升收視率，他們就想到當時的「風雲人物」許純美，儘管爭議性極高，若把她和經常站在電視台SNG後的柯賜海擺在一起，會擦出什麼火花呢？

果不其然，這個節目一炮而紅，一舉打響該節目的知名度，也為該公司賺進不少廣告費。據了解，《東森》電視台高層最後的評估是，雖然形象有些受損，但因收視率高，仍值

得鼓勵。

該製作人省思事件始末說，「許純美V.S.柯賜海」這個節目原本就是過年時的應景之作，主要是讓大家輕鬆解懷，她檢視了節目全部的內容；裡面除了許純美有一句不雅的話，由於是LIVE播出，無法及時制止外，並無不當之處。至於後續引發的一連串效應，則是始料未及的，但這的確印證媒體圈的一句話——「有大事件，才會紅」。

事實上，電視一窩蜂抄襲的現象由來已久，既不需研發經費，又有收視率保證，何樂而不為呢？放眼望去，新聞政論節目《新聞e點靈》創下高收視率後，《新聞挖挖哇》、《新聞麻辣燙》等各種政論仿效節目相繼產生，《命運好好玩》算命卜卦節目受歡迎後，一連串命理節目也應運而生，《復仇者》、《天使與地獄》等處理男女感情糾紛異軍突起後，類似節目陸續出籠，直至造假得太過份，備受社會攻訐之後才叫停。

所謂「市場能最大限度地滿足個人選擇自由」的說法令人懷疑，毫無節制的市場競爭實際上會大大妨礙公民的選擇自由。為了爭奪觀眾，媒體會儘可能拿出對大眾具有吸引力的節目來佔據市場，這就使節目難以多樣，類型重疊，從而造成浪費，所提供的節目也就愈來愈沒有新意，單調乏味。(Keane, 1991)

### 2. 爭奪收視率，社會新聞掛帥

為了收視率，連較嚴謹的新聞節目也不免被「綜藝化」、「連續劇化」，幾乎都以社會新聞掛帥，一打開電視新聞節目，不是殺人，就是放火、自殺，民眾對電視新聞類節目滿意度甚低。

根據《天下》雜誌的調查發現，42%的人覺得電視新聞很吵鬧，看完以後很煩，24%的人認為電視新聞報導讓他們焦慮不安，甚至有14.5%的人認為看完電視新聞後，感覺台灣沒有前途。(楊瑪琍, 2002)



《華視》晚家新聞當家主播李四端分析說，過去幾年來，台灣新聞頻道成長5倍，但是人口、土地、新聞事件並沒有相對成長5倍，「只吁去挖掘最速成的東西，社會新聞最速成，只要去，就會有畫面」。（楊瑪琍，2002）

一位電視台記者私下表示，主管給他們最主要的要求就是「收視率」，因此，嚴肅不討好的政策討論不會做，而偏好往幕後、政治人物的人脈、互鬥關係去做文章。民眾對此也心知肚明，有高達71%的民眾也認為，其實電視台在製作新聞時，以提高收視率、增加電台營收為主要考慮。（楊瑪琍，2002）

包括資深新聞工作者，如《中視》當家主播沈春華都感歎說，「台灣的社會環境造成了目前的媒體生態，在商業電視競爭的環境下，個人的力量實在是無力回天，這樣的媒體生態，根本沒有什麼是適合闔家觀賞的電視新聞，我不讓我的小孩看新聞，就像我女兒Amanda有一天突然說什麼自殺如何如何，嚇得我問她從哪裡學來的，趕快把電視關掉。」（林佳樺，2002）

李四端也很無奈地說：「現在的新聞真的很沒營養，一則八卦連炒兩周，但是卻不可忽略市場生態、環境的考量。」（林佳樺，2002）

《年代》電視台「晚間新聞」主播張雅琴講得更明白，她認為社會新聞的內容雖可以滿足大部分民眾的口味，創造收視率，但卻是下一代的殺手，孩子看太多這樣local、負面的內容，只會讓視野侷限，無法拓展國際觀，對國家未來絕非好事。（黃兆璽，2002）。

「節目一定要能做起來，收視率好，才有生存空間，一些公平、道德、傳統等肯定是排在收視率之後，頂多是第二或第三考量。」一位電視台製作人很無奈地這麼說。她舉過去在《三立》電視台製作「真相多異點」節目為例說，每天要從繁雜的新聞中挑出「好看」的新

聞，「收視率就是最好的佐證，結果我發現凡是有關鄉野奇談、怪力亂神的新聞收視率最高」。她坦承說：「我沒有辦法抗拒收視率，因為它是所有廣告企業的參考指標，節目、廣告主和收視率就像是一個三角關係，相互影響，明知很可笑，明知它可能有錯，但又有何辦法呢？」

一位媒體公司的主管也直言「大家都知道rating可能有誤差，但不能怎麼樣，因為我們需要一個絕對的數字」。

### 3. 為爭收視率，政論節目統獨兩極分化

目前的政論節目也在收視率的驅使下，明顯有兩極化的趨勢。

「周玉蔻就是顯例」。一位不願具名的電視工作者這麼說。他表示，由於過去的政論節目多偏向藍營，汪笨湖和鄭弘儀的成功，逐漸開拓出偏綠的市場，「證明收視市場是可以培養的」，以周玉蔻為例，過去她在《中天》和《緯來》電視台都主持過政論節目，但是收視率只有0.1%，離開《飛碟》電台，轉而投效《東森》電視台，言論明顯偏綠，收視率也衝高至0.6%，「這證明過去政論節目找一藍一綠代表，形式上平衡，但收視率不佳，節目就是要找賣點或能提升收視率的人才有用。」

《東森》集團負責人王令麟日前在接受《商業周刊》專訪時，更赤裸裸地指出，媒體的收視率可以立即反應出節目受歡迎的程度，「媒體要的是什麼？刺激辛辣，不然沒有人看」。他常告訴員工說：「當一個新聞不能賣錢時，這個新聞是不值錢的。」（王文靜、郭奕伶，2004）

王令麟引述迪士尼的CEO（執行長艾斯納）的話說，「不要跟我講你的專業、你的經驗，Show me the Money」，他還說，「理想曲高和寡，擺在那裡沒有用的！No Money no Talk，這很現實的」（王文靜、郭奕伶，2004）

台灣知名傳播學者徐佳士就指出，現在的媒體有「三多」：「自由多、意見多、管道多；但同時有「三媚」：「媚勢、媚商與媚俗」，也就是趨從於政商勢力及流俗，因此要改變媒體向下沈淪，必須提升媒體的自主性、責任心及品味，不向政商勢力靠攏，實踐社會責任，保持不俗的品味，才不會成為人見人怕的公害。（梁玉芳，2001）

前清華大學校長沈君山指出：「媒體，所謂第四權，其權力的基礎，在於讀者對他的信任，當讀者對它的信任動搖時，它的權力基礎也隨之動搖。近年來，新聞報導更豐富多元，但讀者對它的信賴卻似並未隨之增加，『報紙上說的』，從前聽了，多就相信了。現在聽了，哦的一聲，半信半疑，可能還疑多於信。這是新聞界應該自我警惕的。」（沈君山，2003）

#### 4. 報紙爭奪「閱報率」，品味低俗化

在報紙方面，為爭奪「閱報率」，情形也不遑多讓。由於有線電視的崛起和網路科技的進步，台灣人口的閱報率從10年前的將近8成，去年首次跌破5成，尤其是30歲以下的年輕讀者降幅最大，少了20%，報紙所賴以為生的廣告大餅嚴重被分食，台灣報業也正審慎思考未來的走向。（莊慧良，2003）

2003年5月，挾著50億元鉅資來台的《蘋果日報》創刊，更使得面臨寒冬的台灣報業雪上加霜。已發行50幾年的兩大報《聯合報》、《中國時報》均宣佈把售價由15元調降為10元，原本以10元低價促銷而躋身第三大報的《自由時報》，也祭出訂一年報份可參加200部高級轎車抽獎的手法。

為了迎戰《蘋果日報》，《聯合報》、《中國時報》早在一年前就不斷在思索對策，嚐試去接近讀者。以《中國時報》為例，前年10月改版時，曾推出一個「男女夜生活」版，但不到3天就因讀者的反應激烈而取消，中央研究

院、台大教授紛紛寫信指責：「怎麼會淪落至此？」內部也有批評聲浪。《聯合報》也有類似的慘痛經驗。（莊慧良，2003）

正因《蘋果日報》以羶色腥掛帥，因此，很多傳播學者都擔憂，隨著《蘋果日報》來台，台灣報紙是否會隨之「蘋果化」，紛紛建議《聯合報》、《中國時報》兩大報發展為質報。

《聯合報系》發言人、《民生報》社長項國寧對此表示理解。但他指出，必須有一定規模的市場，才有質報生存的空間，就台灣的市場規模而言，「當你的報份降到一個程度，發行收入、廣告大量減少，就難以維持一個team，報紙不能只是寫評論，你要提供資訊，提供資訊要花成本，波灣戰爭派記者駐點，所費不貲，要找好手供稿，也需要錢，如果沒有足夠的資源，如何辦質報？質報和量報平衡點何在？若連經營都有問題，就無法奢談質報」（莊慧良，2003）

## 二、廣告主左右媒體的報導內容

今年三二〇總統大選，各電視台為爭逐收視率競相灌票，已成台灣傳播史上一頁笑話。

但更令人驚訝的是，「閱聽人監督媒體聯盟」在4月17日召開記者會，指責《中天》電視台在三二〇總統大選開票過程中惡意灌票，並指該電視台失衡大幅地報導總統府前抗爭畫面，「不但欺騙觀眾，更以不實數字欺騙廣告主，……進而造成社會動盪不安」，進而結合廣告主自4月26日起拒絕在該電視台刊登廣告，並籲請閱聽大眾拒買在該電視台播出之廣告產品。

根據《中天》電視台發函給各新聞傳播機構的函中指出，事實上，早在3月25日，廣告主協會秘書處以電子郵件要求各廣告主避免在政治性節目及LIVE轉播總統府前抗爭的新聞節目刊登廣告；3月29日前後，包括《中天》在內的各電視公司業務部主管也先後接獲來自

廣告主協會秘書長王彩雲的來電表示：「三二〇之後電視報導抗爭活動不妥，已造成社會動亂及股市下跌，因此，強力要求各新聞台不得再作轉播，否則將發動其會員不上廣，若有廣告主仍上廣告，則會公佈廣告主名稱，以促消費者抵制廣告主商品。」

《中天》電視台認為，「閱盟」和「廣告主協會」所訴求的重點並非社會大眾一致關切的選舉「灌票」報導，而是「藉監督媒體為名、以商業廣告抵制為手段，對於特定媒體要求減少對於特定政治事件的報導」，「挾持商業資源，假藉社會大眾所關切之道德議題，遂行干預言論自由及箝制新聞之實」，而其訴求之新聞觀點，「恰屬於有利於政府之觀點」，因此，該電視台認為，台灣的新聞自由已面臨少數特定個人及團體，意圖挾持財團資源而肆意箝制，干預電視新聞的製播方向，此一行為實與戒嚴時期、白色恐怖時代以政治力箝制新聞言論之作風並無不同。

同時被「閱盟」點名有「灌票」的《年代》電視台，於4月22日邀集《東森》、《TVBS》、《三立》、《中天》、《台視》、《中視》、《華視》、《民視》等電視台董事長及主管聚餐，並組成「中華民國電視新聞聯誼會」，並發佈新聞稿，批判新聞自由遭箝制，文中指出：「部分特定個人及團體企圖運動影響廣告主下廣告意願為手段來箝制新聞採訪、報導自由的作法，本聯誼會除深表遺憾外，並一致認為，新聞媒體有責任堅持新聞道德及專業，盡到媒體應有的告知責任，我們樂於接受觀眾」（閱聽大眾）的監督批評，但是任何不當的外力干預，都將造成民主的嚴重倒退」。

《中天》和《年代》電視台都明白指出，確有部分特定個人及團體企圖以廣告主為要脅，來箝制新聞採訪與報導自由。

台灣在解嚴及報禁前，媒體的結構受到嚴

重扭曲，三家電視台被黨政軍所瓜分控制，徹頭徹尾做國家機器意識形態的工具，全台報紙凍結在31家，其中有半數充當黨政軍的喉舌，率皆蝕本，只靠著「國庫通黨庫」的特權勉強維持。（李金銓，1987）1987年報禁解除後，台灣的媒體生態都發生重大變化，有線電視蓬勃發展，打破原來3家黨政軍電視台的壟斷，步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後塵，由大財團取代黨國來壟斷市場（李金銓，1998）。干預新聞的幕後黑手，由昔日的黨政軍轉為媒體的商業利益。前行政院新聞局長葉國興任內的「置入性行銷」令人印象深刻。

2001年5月3日，包括統一、義美、麥當勞、菲夢思、P&G等33家大型企業集團共同成立「中華民國廣告主協會」（簡稱「廣告主協會」）時，該會宣稱將以每年百億元的廣告量來監督台灣各大媒體，要「建立乾淨的媒體資訊環境」。陳水扁總統還親自出席見證。（尤子彥，2001）

### 1. 廣告主協會挾廣告以令媒體

當時外界對此廣告主協會即充滿疑慮，質疑該會將以廣告主的勢力來箝制媒體，320大選後的行徑即是明證。徐佳士當時就指出，媒體內容的監督控管是相當嚴肅的事，在民主國家，除了新聞評議會、報業工會、記者協會等自律性監督機制，以及學術團體的監督之外，對媒體內容最有力量、也最無爭議的監督機制，就是媒體消費大眾的自我覺醒，無論如何，廣告主和廣告主協會都不宜成為監督媒體內容的機制。（楊湘鈞，2001）

事實上，廣告主以廣告為要脅、左右媒體的例子比比皆是。最著名的例子是，《中時晚報》因報導統一企業遭「千面人恐嚇」事件，遭到統一超商的抵制下架，導致通路出現問題。

1997年11月3日，《中國時報》經濟版的房地產報導中，引用了一張國揚實業正在促銷中的青年賣場空蕩無人的照片，結果引起國揚

和負責代銷的新聯陽強烈反彈，就以抽掉上千萬元廣告的金額為要脅，對報社高層施壓。

此事引起編輯組與採訪組幾度爭執。編輯部希望安排國揚建設董事長候西峰出面接受專訪，來表彰國揚的青年賣場在房地產不景氣聲中「一枝獨秀」，但採訪組認為當天新聞處理無誤，不願答應。另一方面，國揚只願派一名副總經理接受採訪，此議遂寢。最後此事以來函照登方式處理，隔天讀者看到國揚自稱青年賣場萬頭鑽動的消息。（李明紀，1997）

## 2. 媒體遇著衣食父母先矮了半截

媒體為了生存，必須依賴廣告的支撐，但是號稱第四權的媒體，監督對象若碰上自己的衣食父母時，媒體在發佈新聞前「心中都有一把尺」，企業也很清楚媒體的「阿奇里斯踵」。（Achillesheel）

以廣告大戶的長榮航空為例，《中國時報》一名記者曾採訪到一則不利長榮的獨家新聞，但該報因「投鼠忌器」，高層主管主動把這篇報導壓下，該名記者憤而辭職。

《財訊》月刊也曾因搶先刊登長榮集團張榮發的自傳內容，引起張榮發的不悅，此後，《財訊》再也見不到長榮的廣告。廣告部門曾多次登門道歉，但未獲其諒解。（張旻）

一名報社記者指出，廣告大戶之一的華航，也曾因《聯合晚報》一則「機師搞飛機，華航誤點」的新聞，把《聯合晚報》給停了一個多月。此事乃因華航一名機師臨時心臟病發，身體不適，隨機的工作人員也一併撤換，造成班機誤點，但華航對此很不滿，事後也是報社高層去溝通才化解此事。

裕隆汽車也曾因勞資爭議解聘兩名工會幹部，導致工會怠工，但此事發生一個多月後，唯一報導此事的是《新新聞周刊》，其他媒體竟無隻字片語。事後大家才發現各大媒體之所以對此事這般冷漠，究其原因正是裕隆汽車車向來是國內汽車廣告大戶。（張旻）

對於每年掌控10幾億元廣告預算的瘦身美容業者，儘管糾紛頻傳，但很少有媒體敢「指名道姓」地寫出來。

曾在《TVBS》電視台任職的一位企畫表示，1995年他在製作「終極檔案」的節目時，曾採訪了幾個控訴「最佳女主角」的案例，她們都是先繳了3、5萬元的減肥課程，後來經營營養師、美容師等人勸誘再參加進一步的瘦身療程，一時衝動下，刷卡2、30萬元，事後反悔了，但因當時沒有消費者保護法等相關法律條文保障，想取消卻被拒。

該節目雖未直接點名「最佳女主角」這家公司，但以影射的方式，明眼人應猜得到。就在節目播出前兩天，「最佳女主角」的老闆黃河南主動向《TVBS》電視台的業務部門表示，若抽掉這集節目，他立即「奉送」一百萬元的廣告費。於是這集內容迄今仍冰凍在《TVBS》電視台的倉庫裡。

近年景氣不佳，企業跳票事件頻傳，媒體在處理這種新聞時特別小心。某銀行與某大報小開因為有交情，在發生金融弊案時，該家逾放比率甚高的銀行也向報社施壓，避免該銀行的負面報導曝光。（李明紀，1997）

前《今周刊》總編輯蔡致中就指出，企業因為不滿新聞處理而抽廣告的行為，幾乎每個星期都發生，所有企業主都希望在媒體出現的是正面報導，但是，站在財經媒體的角度，必須以「經濟正義」與「投資大眾利益」為出發點，至於業者的經濟抵制後果，則留給媒體經營者去承擔。（張旻）

廣告主為了招徠更多的觀眾，而費用卻必須降到最低水平，因此，它使用的材料只能迎合一小部分公民的利益，「廣告業大大壓縮了符合少數人興趣的節目，例如富有美學意義和智力挑戰性的主題，以及政治上有爭議的材料。」（Keane，1991）

## 三、廣告主與讀者不可兼得

在眾多媒體都將廣告主奉為上賓，瞻前顧後的情況下，主張「傳媒不能侍奉兩個主」的《壹傳媒》老闆黎智英走的是貼近讀者路線，而且，逐漸看到了成果。

據熟知內情人士透露，《壹周刊》去年4月已賺了近4千萬，《蘋果日報》目前的零售數字已等於《中國時報》、《聯合報》和《自由時報》三家的總合，每個月以一、兩萬的份數成長，尤其到了周六、日假期，平均都可售出50萬份，預估今年7月可以損益兩平，比原來的計畫還快，包括化妝品等精品廣告已經願意在該報刊登。

這位人士指出，黎智英經營傳媒就和他過去在香港賣衣服一樣，重點是「新聞好不好看，能不能賣錢」，正因為黎智英非常重視讀者的看法，隨時根據讀者的意見進行修正，以《蘋果日報》為例，當婦女團體、兒童聯盟以發動拒買行動，要求該報改善色情、暴力內容時，《蘋果日報》立即作出善意回應，減少情色版面，拒接色情廣告，慢慢已有在地化的傾向。

另一位目前任職於《壹傳媒》的工作人員比較過去在台灣傳媒工作的情形指出，「《壹傳媒》不斷在換血，因為她需要新的刺激」。在《壹傳媒》工作前，他從來不知道讀者的反應，原來新聞是這麼有趣，學著從人性來做新聞，或令人生氣、或令人感動，即使是嚴肅的新聞也應該包裝，讓一般人也看得懂，「過去對我的肯定是來自高層官員，現在直接的回饋是來自於讀者，走到哪兒都可聽到民眾在討論我們寫的新聞，真正感受到媒體的影響力是這麼大。」

黎智英對屬下的指示是：「編輯部對讀者負責，廣告是業務部的問題」。在「只侍候讀者一個主人」的清楚原則下，黎智英碰到屬下來請示時，經常只有一句答案「你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黎智英曾在《壹周刊》的專欄中撰文指

出，單純賣雜誌或報紙是蝕大本的生意，要賺錢便要靠廣告，故不能不重視廣告商的需要，而他們的取向難免會影響刊物的內容，「不過，要是以內容去遷就廣告商的要求，那便會背離讀者的需要，無從引發共鳴，逐漸為讀者離棄，沒有讀者的刊物，怎會有廣告？」他強調，「廣告收入是我們的利潤來源，但讀者的共鳴更是我們的命根。有了共鳴，讀者才會產生消費意欲，有了消費意欲，廣告才有促銷的效力。」（黎智英，2003）

不過，知名傳播學者李金銓分析，《蘋果日報》在1995年於香港搶灘成功的原因有四：

- (1) 印刷精美，顛覆了傳統的新聞編輯手法，新聞內容以照片圖片為主，討好新一代年青讀者；
- (2) 政治立場「識時務」，《蘋果日報》的政治組很小，不是有思想的政治報紙，但它借用犯罪新聞的方法，把政治議程和反共情緒當成商品來處理，故意激發港人反共的情緒，並且強烈支持民主。該報不論從風格、語言和形式上都是民粹式且煽動的。文章不僅吸引讀者注意，甚至令讀者對其政治勇氣心生敬佩；
- (3) 自詡為小市民的報紙，籠絡普羅大眾，仿效美國黃色新聞手法，大炒犯罪新聞，並模仿playboy，聘請優秀的作家寫專欄文章，藉以吸引高級知識份子，擴大讀者群；
- (4) 提供生活資訊，「貼近」讀者。現在《蘋果日報》在台灣完全採行香港的發行模式。

李金銓指出，《蘋果日報》沒有人情包袱，可以暢所欲言，但它最感興趣的是八卦題材，例如挖政治人物的隱私，這對民主素質的增進是毫無意義的。（李金銓）

## 四、媒體經濟壓力影響言論走向

### 1. 媒體的貸款壓力

近年經濟不景氣，各企業預算縮水，媒體

所賴以維生的廣告量大幅下滑，根據潤利公司的調查，自1998年的高峰算起，台灣各大報系的廣告衰退幅度約3成到1成多不等，其中以規模最大的《聯合報系》衰退最為嚴重，從1998年的93億元跌到去年的63億，成長率為負32%，《中國時報系》也有二成多的跌幅。（財訊，2003）

很多媒體都有財務問題，需要政府所屬公營行庫伸出援，提供聯貸，以度過難關。截至去年9月，以《東森》集團的110億聯貸最多，2000年，王令麟曾力挺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連戰，但陳水扁政府2000年上台後出國訪問，王令麟父子也隨侍在側，「變色」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王令麟的政治彈性很多，他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企業主是永遠的執政黨」。（林瑩秋，2003）

媒體聯貸排行榜第二名的是《中國時報系》，有53億元，有財務壓力的中時報系，言論立場呈S型，對陳水扁忽冷忽熱，而扁政府對中時的言論立場，也是該反擊就反擊。相對而言，《聯合報系》的財務壓力明顯比較小，言論方向穩定，反扁親連宋的立場清楚明確。綠旗鮮明的《台灣日報》在台塑董事長王永慶不再資助後，主要是靠本土意識濃厚的誠泰銀行等人資助。《自由時報》因為老闆林榮三財力雄厚，故言論雖然偏綠，但只要觸及兩岸、三通和李登輝等議題時，不一定挺扁，還曾批扁政府開放晶圓廠登陸等。（林瑩秋，2003）

這些例子充分顯示，唯有財務獨立，媒體才能挺直腰桿，暢所欲言。

## 2. 新聞廣告化

受到景氣不佳的影響，媒體的廣告減少除了收入變少外，還有填新聞版面的壓力，因此，如何利用新聞版面「變相」廣告，就成了媒體的「開源」方法，例如，與地方縣市政府首長對談，採訪其政策理念，少說也有7、80

萬到上百萬的收入。（財訊，2003）

部分媒體還要求記者「業採合一」，即一手寫新聞，一手拉廣告，因有佣金可抽，部分記者視為外快，一位中部報社的主管甚至還傳出與候選人有「2百萬元的廣告」互動，故強烈指導跑線的記者如何處理新聞，引起記者抗議，揚言抖出內幕，最後在報社高層的處理下才平息。（記協選戰觀測隊）

## 五、結論

主張市場競爭的自由主義者大聲疾呼解除管制，擁有媒體帝國的梅鐸（Murdoch）就認為，現在是自由與選擇的時代，而不是控制與稀缺的時代，唯有市場競爭是實現報章和廣播自由—即不受政府干預的自由—的關鍵條件（Rupert Murdoch，1989），在競爭中消費者可以決定他們想要購買的東西，選擇物美價廉的商品，而供應者甘冒風險，不斷進行革新，否則他們的企業就會失去活力。

但是，反對者認為，解除管制約束的結果是「垃圾電視」節目不斷滋長，很可能毀掉公共服務性傳播事業，使之淪落為某種文化貧民窟，質量將被貪婪的商業化所吞噬，結果多頻道的選擇無異於多頻道的浪費時光，「更多的選擇」只意味著更糟而不是更好的電視節目，重複不休的節目安排，冗長無味的連續劇，把老題材花樣翻新，公共服務性的廣播和電視從此失去它的優秀傳統。（Keane，1991）印證台灣的現況，後者似乎較具說服力。

John H. McManus在《市場驅動的新聞業》一書中也指出，生產新聞有三個階段：

- 第一階段：找出有新聞價值的議題與事件。
- 第二階段：再從中挑選出要刊（播出）的議題與事件。
- 第三階段：從最關緊要的新聞來源中選出最重要的引述材料寫成報導的內容。

他認為，私營媒體也是企業，而企業的目的



標是追最大利潤，因此，「精於經濟計算的新聞部門必須競相提供花費少而既能吸引最大量受眾，讓廣告主願意付錢，同時又保護贊助者與投資者利益的新聞內容，因此，哪些事情能變成新聞，就取決於生產新聞的三個階段中，對每一階段做的成本—效益分析。」在實際的新聞市場中，由於新聞作為一種商品的特性，追求最大利潤的邏輯經常與讓公眾獲得最多認識的邏輯相衝突。(H.McManus, 1994)

當媒體成為營利事業時，必然會受到金

錢、追求最大利潤的制約，其中電視受到的影響又遠較報紙來得大，除非媒體的老闆或投資者在經濟獨立的情況下，願意接受較少的利潤，市場機制和新聞媒體是有妥協之處。

就民主社會來說，總是希望有多元化的聲音爭辯，以促進社會的進步，但綜上所言，媒體在相當程度受到市場機制的制約下，多是以維護現行體制為主，言論趨於保守，這與主張新聞在自由的市場運作下，能廣泛溝通大眾的意見，是背道而馳的。◎

## ■ 參考文獻

01. 楊瑪利 (2002.4)。弱智媒體，大家一起來誤國？天下雜誌，251。
02. 林佳樺 (2002.8.19)。李四端嘆惡質，沈春華小孩禁視，腥聞，主播不敢看。星報，2版，異事發言權
03. 黃兆璽 (2002.4.2)。惡質競爭殘幼苗，認養kids消業障。星報，10版，名嘴博覽會。
04. 王文靜、郭奕伶 (2004.4)。不要跟我講你的專業，Show Me The Money。商業周刊，854期。
05. 梁玉芳 (2001.4.5)。證嚴提「三怕」，媒體是其一，徐佳士回應，媒體須「三升」，以免成社會公害。聯合報，9版，社會話題。
06. 沈君山 (2003.4.19)。媒體評量之我見—所謂言論自由，評論各述其理，報導追求真實。聯合報，A15版，民意論壇。
07. 莊慧良 (2003.5)。明報。
08. 李金銓 (1987)。《新聞的政治，政治的新聞》。台北：國神。
09. 李金銓 (1998)。〈媒介市場與政治衝突：海峽兩岸新聞交流十年〉。《東亞季刊》29 (2)
10. 尤子彥 (2001.5.3)。33家大企業今成立廣告主協會，挾每年百億廣告量，擬監督各大媒體，總統將出席，學者認為可健全廣告業，但不該干涉媒體內容。聯合報，8版，社會。
11. 楊湘鈞 (2001.5.3)。33家大企業今成立廣告主協會，挾每年百億廣告量，擬監督各大媒體，總統將出席，學者認為可健全廣告業，但不該干涉媒體內容。聯合報，8版，社會。
12. 李明紀 (1997.11.9)。一張照片惹惱一缸子老闆，商業利益掛帥的媒體環境，有無獨立報導空間？今周刊。
13. 張昱。當媒體碰上衣食父母。目擊者，第11期
14. 黎智英 (2003.2.27)。傳媒不侍奉兩個主。壹周刊，112。
15. (2003.5)。台灣報業巨變記，從賺十位數到賠十位數？！中時、聯合心事重重，自由林榮三錢袋深深。財訊，242。
16. 林瑩秋 (2003.9)。王家借110億，余家借53億，邱復生借6億，向銀行借錢最多的媒體老闆！財訊，258。
17. 記協選戰觀測隊。「忘了我是誰」的媒體與記者，媒體在縣市長選戰中扮演的角色。目擊者，第3期。
18. Keane, John (1992) "Media and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no. 3.
19. Beville, H.M. (1988) Audience Ratings: radio, television, and cable. Hillsdale, N.J.: L. Erlbaum Associates.
20. H.McManus, John (1994) Market-driven journalism: Let the citizen beware? London: Sage
21. Murdoch, Rupert (1989), Freedom in Broadcasting, MacTaggart Lecture, Edinburgh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Festival, Edinburgh, 25 August。

# 中國勞工的全球化 及其對國際勞工的影響\*

■陳佩華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

這幾年有不少學術性和非學術性的文章談到全球化和中國勞工問題，但這些文章多半偏重於全球化對中國勞工的影響。本文不僅要討論全球化與中國勞工面臨的困境，而且也試圖探討中國勞工的全球化對世界勞工的影響。全球化帶來的是一種連鎖式的反應，受到全球化衝擊的不僅僅是中國勞工。中國勞工反過來也影響國際勞工。因此本文內容包括兩大部分：(1) 全球化與中國的勞動標準；(2) 中國勞工對國際勞工的影響。

## 一、全球化對中國勞工的影響

### 嚴重的負面作用：

自從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初進入國際市場以來，隨著較大規模的出口導向型產業的出現，中國勞工也成為全球化經濟的一部分。面對國內和海外競爭的雙重壓力，中國勞工必須增加產出和提高效率。其結果是：國有企業的職工人數大量減少，非國有企業的職工人數急劇上升，工人的跨地域流動大幅度增長，彈性勞動制度的採用，職工健康和生產安全方面的

問題堆積如山，以及對工人的殘酷剝削等等。對中國出現的這種革命性的社會變化的評價總的來說是正面的——經濟快速增長並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而這正是中國為維持社會穩定而迫切需要的。持這種看法的人通常把上述現象看作是中國在成為國際上舉足輕重的經濟和政治強國的過程中一個「必須經歷的階段」。而馬克思的「資本原始積累」的概念，常常被用來當作普通老百姓為經濟發展而遭受苦難的藉口。他們爭辯說，為了與國際勞動市場競爭，我們中國必須維持低工資水準。

在這種表述中，「階段」一詞意味著下一個階段會更好一些。至少從歷史上看，事實似乎也確實如此。工業革命起始於西方國家。經過多年的工人鬥爭，大多數西方國家都達到了福利資本主義的階段。這裡我們姑且撇開這種剝削性的歷史階段是不是不可避免的爭論，在今天的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我們看到的是一種非常令人擔憂的現象：我們不僅沒有試圖超越這個可怕的歷史階段，相反，我們實際上是在向那種「免費的」或「幾乎免費的」勞動力

\* 本文為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2004年3月12日~13日主辦的「分享經驗和策略：勞工權益民間論壇」學術研討會論文。非經作者授權，不能引用本文。

作者電子信箱：anita@coombs.anu.edu.au。



階段退步。

中國出口導向產業的工人大多數是民工。至少有兩個明顯的指標表明，在中國勞工更多地被融合進世界經濟的同時，中國的勞動標準卻降低了（雖然這種融合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

(1) **第一是工資水準的持續下滑。**表面上看，因為官方制定的最低工資標準逐年提高，工人的工資也有所增加。但如果根據通貨膨脹率進行調整以後，儘管白領工人的工資有較大幅度增長，廣東省民工的工資實際上卻下降了。劉開明（註一）和我們兩人分別做的研究（註二）都得出了這一結論。這也為最近對深圳的民工所做的訪談錄所證實。由於廣東是世界製造業的重鎮，因此這是一個很可怕的前景。中國實際上是在「向谷底賽跑」的過程中處於領跑地位。

(2) **第二個更可怕的現象是拖欠民工的工資額一年比一年多。**我從1990年代開始收集有關這一問題的剪報。在當時，有關媒體只是把拖欠民工工資的現象當作孤立事件報導。隨著時間推移，這些事件已經成了司空見慣的工資制度。甚至地方政府也開始覺得有必要進行干預。每年春節前夕，地方政府都要開展所謂的「追還欠薪運動」，然後得意洋洋地宣佈為工人「討回」了多少萬元的拖欠工資。追討回來的欠薪一年比一年多（註三）。廣東省在1995、1997和1998年「追討」回來的欠薪分別為2100萬、15億和56億元人民幣。根據這些報導所得出的印象，這些現象主要發生在出口導向的製造業，而受害者主要是女工（註四）。新聞報導的批評語氣後來也變得越來越強烈，例如有的報導抨擊拖欠工資已經成為一種「風俗」（註五），需要「下猛藥」（註六）來根治等。

## 廣東省追回欠薪總額增長情況

廣東省追回的欠薪總額（億元）	1995	1997	1998
	0.21	15	56

今年春節前的一月份，拖欠工資達到了空前的數額。全國各地關於拖欠建築工人（幾乎全部是男性）工資的報導突然一下子大量湧現出來。據估計2001和2002年全國拖欠建築工人工資的總額分別高達2787億元和3365億元（註七）。這還不包括拖欠製造業工人的工資。

## 全國拖欠建築工人薪金總額與銀行未償還貸款總額比較

	2001	2002	2003
全國拖欠建築工人薪金總額（億元）	2787	3365	
全國未償還銀行信貸總額（億元）		9000	19000

註一：劉開明：《邊緣人》，北京：新華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8頁和第145-160頁。

註二：Anita Chan（陳佩華），"Race to the Bottom": Globalisation and China's Labour Standards', China Perspectives, 46, 2003, 41-49.

註三：例如，焦友龍：「工資法能保證工資按時發放嗎？」，載：《中國社會報》2002年3月27日第3版。

註四：例如，李鍵和張華：「追討欠薪，為打工人撐起「保護傘」」，載：《南方工報》2002年7月26日第2版。

註五：詹船海：「南海西樵：拖欠工資成「風俗」」，載：《南方工報》2001年8月22日第1版。

註六：米國琛和郭玉琨：「深圳猛藥治欠薪」，載：《中國勞動保障報》2002年2月19日第1版。

註七：趙承和齊中熙：「全國清欠攻堅戰初見成效，清理欠薪不是「颶風」」，載新浪新聞中心2004年1月21日新華網新聞，<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1月21日01:46，新華網。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這一筆巨大的數額意味著什麼。中國未償還的銀行信貸總額在2002年上半年為9000億人民幣，2003年上半年為1.9萬億元（註八）。也就是說，在2002年，拖欠建築業民工的工資款額超過了中國的銀行信貸總額的三分之一。在這個意義上，拖欠民工的工資可以被看成是向社會強行徵收的無息貸款。更糟糕的是，這種強行徵收的貸款可能永遠也不會被償還。拖欠的款項數額是如此巨大，以致於國務院不得不專門發文來解決此問題（註九）。今年3月在人大會議中，溫家寶總理指出2004年政府主要工作任務之一，就是在五年之內，取消農業稅，每年減輕農民負擔48億元（註十）。這個數額還不及廣東省在1998年追回的拖欠工資額（56億元）。

從以上簡單的比較不難看出，如此巨大的拖欠工資數額可能會讓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本來就已經拉大了的城鄉收入差距失去平衡，而且還會對基尼係數產生影響。換句話說，千百萬民工為城市興建道路和高樓大廈，為「中國奇跡」提供了活生生的證據，並把中國建成了一個具有現代化景觀的國家，然而他們卻是在無償地工作（不是低工資，而是無工資！）。那些無法無天的雇主大多數並不是外國資本家，也不是本國的私營企業主，而是地方政府和國有的建築公司！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數額還只是限於建築業，只不過是整個拖欠工資問題的冰山的一角。而拖欠工資的後果，實際上相當於降低了工資標準。而這肯定對發展中國家乃至全世界的工資水準產生不利影響。

#### 積極作用的跡象：

幸運的是，也有一些社會發展對這種勢不可擋的全球性現象起著遏制作用。

### 1. 更開放和具有同情心的中國媒體

與中國對世界的開放相伴隨的是中國媒體的自由化。有關民工問題的報導，特別是廣東省的報導，都非常同情民工的遭遇。這些報導不僅有助於讓人們瞭解民工所遭受的苦難，而且也為這一問題的討論確立了道德規範。去年各媒體對大學生孫志剛之死的廣泛報導，最終促使中央政府廢除了收容遣送條例，就是富有同情心的媒體能夠起積極作用的一個具體例子。

### 2. 國際反血汗工廠運動和跨國公司的社會責任（CRS）運動

反血汗工廠運動起始於1980年代的香港。1990年代初期，在「耐克觀察運動」的帶動下，反血汗工廠運動在歐美國家開始蓬勃發展起來。這一運動目前的參與者包括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眾多的非政府組織，例如學生社團、教會組織、環保團體、勞工組織、消費者團體和社區組織等，但運動的動力仍然來自發達國家。反血汗工廠運動的矛頭所向，主要是跨國公司和資本主義政府。它抨擊這些公司和政府對第三世界工人的奴役和剝削。它的主要使命和活動是，促使這些跨國公司向它們在發展中國家的供貨廠商施加壓力，要求它們提高勞動標準。反血汗工廠運動的動機是人道主義的，它的關懷是普適性的。然而，就我所知，在中國的媒體上尚未見到對這一基層群眾運動的任何報導。

反血汗工廠運動相當成功地佔據了道德上的高地。很多跨國公司現在已經公開承認它們

---

註八：Nicholas R Lardy, Op-ed in Business Review Weekly (Australia), January 29, 2004.

註九：同註七。

註十：溫家寶：《政府工作報告》，載：《南方都市報》2004年3月6日。

有責任促使那些生產它們的品牌的製造廠商提高勞動標準。這些跨國公司不想因為反血汗工廠運動揭露出來的事實而被弄得聲名狼藉。很多跨國公司現在還僱有專人負責勞權和人權事務。到90年代中期，為確保勞動標準的改善而湧現的大量內部和社會監控（monitoring）、審核（auditing）和認證（certification）活動還導致了一種新的專門負責監督審查勞動標準的行業的誕生。例如，香港的一家監控公司每個月要對在中國境內的1000家工廠提供監控，可見這已經成為一個非常龐大的產業。這裡我要強調以下幾點：

1. 要求跨國公司承擔社會責任背後的驅動力量來自社會而不是發達國家的政府。跨國公司只不過是因為害怕失去消費市場而對道德壓力作出反應。
2. 由於跨國公司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區有投資——亞洲、中美洲、南美洲、非洲，最近幾年還增加了東歐，反血汗工廠運動並不是專門針對中國的。也就是說，並不是特意要和中國過不去。
3. 這一運動的動力是出於人道主義考慮而不是出於政治考慮。其動機不是「保護主義」，更不是某些媒體所謂的「大棒」。因此在這方面不應該把反血汗工廠運動與西方國家政府的政治日程，或西方社會的保守勢力相混淆。

我希望從現在起中國的媒體能夠報導這一基層群眾運動，因為參與這一運動的人是中國民工的支持者。不要把這一運動與公司的社會責任相混淆，公司的社會責任是跨國公司的公關口號。在大多數情形下，跨國公司只不過是利用這一口號來抵擋反血汗工廠運動對它們的批評。也不要將跨國公司的社會責任與「保護主義」相混淆。如果它們是保護主義者，它們就不會到發展中國家來投資和購買東西。恰恰相反，這些在發展中國家採購的跨國公司是反

保護主義的。

除了少數幾個大公司的成功例子之外，推行跨國公司的社會責任並沒有導致其供應廠商的勞動標準的提高。相反，在供應廠商建立起用以欺騙社會監督者的機制之後，違反勞動標準的行為已經轉入地下。而且，有些供應廠商已開始把訂單轉包給更小的廠家，這些小工廠遠離大城市，監督者尚無法對其進行監督。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社會監督行業日益擴大的同時，工人的實際工資水準卻在不斷下滑。這說明公司的社會責任運動對於提供勞動標準並沒有多大成效。

### 3. 企業民主工會選舉

由於監督的效果不大，一些專門設立了人權部門並比較認真地想要提高勞動標準的跨國公司決定嘗試其他的辦法。它們的方案是通過代表制度建立工人參與管理的管道，從而讓工人成為管理方的監督者。這種嘗試目前仍然處於起步階段，其成效仍有待於評估。

與此同時，從去年中期開始，一些中國的報刊突然開始報導廣東和福建有些私營企業的工會主席是由「直選」產生的新聞。據報導，杭州在3年以前就開始了工會選舉，已經有310家工廠舉行了這種選舉。其中有些報導承認，這些工廠的跨國公司客戶向它們施加壓力，要求它們遵循行為約章。管理方是回應跨國公司的要求才同意舉行工會選舉的（註十一）。隨後，中華全國總工會宣佈在今後的幾年裡將大力推進工會選舉活動。（註十二）

「直選」並不等於「民主選舉」。這些選舉

註十一：傅劍鋒：「工會直選：一場老外推動的工人權益變革」，載《南方都市報》2003年6月25日第9版。

註十二：王嬌萍：「直選：在規範中平穩推進——全總副主席蘇立清就基層工會直選答記者問」，載《工人日報》2003年7月25日第1版。

是不是民主選舉仍需要進一步研究和確認。但是討論企業工會委員會選舉中需要某種民主過程這一問題本身就足以使人感到樂觀。如果我們看一下中國的村民委員會選舉的發展過程就更有理由相信前景是大有希望的。中國最早的民主村民委員會選舉是於1980年底和1981年初在廣西的2個縣進行的。20年後的今天，儘管村民委員會選舉有不同的形式——有些是真正的民主選舉，有些部分受當局控制，還有一些完全是走過場，但村民委員會選舉在中國已經被認可為政治過程中的正常部分。因此，現在由全總開始的工會選舉運動是有望逐步實現工會結構的民主化的。

#### 4. 國際勞工組織（ILO）的三方機制

作為這一由政府、雇主協會和工會聯合會三方組成的國際組織的成員，中國也需要設立類似的三方高峰組織（peak organization），哪怕只是為了派三方代表到日內瓦出席國際勞工組織的年會。全總是工會組織的最高機構，但在計劃經濟下沒有雇主協會，所以在1999年成立了中國企業聯合會作為雇主組織的最高機構。然而迄今為止，其成員似乎仍主要是國有企業。國際勞工組織的三方機制本身是一個組合主義模式（corporatist model），是多元政治制度的產物。三方是獨立的，並且都有權代表各自所屬的群體的利益進行實質性的「社會對話」（social dialogues）。

在採用國際勞工組織的組合主義模式的時候，中國需要體制創新。這種新體制應該能夠潛移默化地融解國家組合主義模式的特質。目前三方之間的權力關係並不是平等的。全總是由黨—國家控制的，而中國企業聯合會仍處於襁褓階段。

為了表明自己有誠意促進三方的社會對話，中國於2001年設立了全國三方協商會，並開始推行在鄉鎮以上各級都建立相應的機構。半年以後，國際勞工組織派來的調查委員會在

考察其進展情況後做出結論說：

……按目前的方式建構起來的三方機制無論是現在或將來都不大可能達到所希望的標準。……然而，我們與全國性的和市一級的工會和企業家代表交談時發現，他們都很明確地願意致力於提高他們所代表的組織的能力，使這些組織能夠獨立地代表其成員的利益，在社會對話機制中反應他們的要求和疾苦。（Clarke & Li, 2002:77-78）

該委員會還注意到「中華全國總工會作為保護其成員的利益和維持社會穩定的組織，是三方諮詢中最活躍的一方。」（Clarke & Li, 2002: 77）作為隨行的觀察員，我同意該委員會的這一結論。全總的這一形象似乎與它在國內外的流行形象有點矛盾，但全總的高層官員在與勞動與社會保障部的官員同坐在一張談判桌前的時候，的確流露出全國企業聯合會的代表所缺乏的自信。令我印象深刻的是，2位勞動與社會保障部的官員曾兩次說全總「強大」，似乎他們很難迫使全總接受他們的決定。全總的這種特徵與它在立法過程中堅定而自信的表現是一致的。全總的高層官員在處理勞動關係的政治舞臺上已經佔據了一席之地。在中央一級似乎已開始出現擺脫政府的嚴密控制的趨勢。

## 二、中國勞工對國際勞工的影響

絕大多數中國媒體和與勞動關係有關的報刊雜誌都把中國描繪成全球化的犧牲品，認為世界貿易組織、發達國家及其工會強迫中國遵守國際勞工組織的勞動標準是出於保護主義的動機。在這方面，美國被看作是欺負中國的罪魁禍首。幾年以前，曾有些美國人竭力反對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現在仍有人指責中國違反人權，因為中國政府不允許自由工會；還有人認為是中國害得美國工人失去了工作，而布

希政府似乎正在向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屈服；中國是反傾銷法的最大受害者（註十三），等等。面對這些被認為是敵視中國的指責，中國覺得發達國家是在故意和中國過不去。不可否認，發達國家的資本家剝削發展中國家的勞動人民，世界的貧富兩極分化都是鐵的事實（註十四），但我要指出的是，這是一種南—北兩極範式的看法。這種範式認為勞動力市場的競爭是在富國與窮國之間。誠然，多年來製造業的工作一直在從北向南轉移。但目前富國與窮國之間的工資差距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即使中國民工的工資加倍（也就是說達到最低工資標準），或者不再拖欠工資，工作機會也不會重新回到北方。南—北兩極的範式已經無法解釋世界勞工問題。

這裡我想引入一種新的範式——即南—南範式。換句話說，勞動市場的激烈競爭是其實在發展中國家之間進行的。打個形象的比喻，就好像是窮人在桌子下面搶麵包屑。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在這一競爭中處於有利地位。隨著中國向世界開放，千百萬中國民工也進入了國際勞動力市場。這給其他發展中國家——從其亞洲鄰國印尼、菲律賓、越南、泰國和柬埔寨等到墨西哥、中美洲甚至非洲——帶來了非常巨大的影響（註十五）。大量的中國工人進入世界勞工市場加劇了各國勞工之間的競爭，並迫使其他國家降低它們的勞動標準。這一現象被描述為「向谷底賽跑」（Race to the Bottom）。這種現象與我在本文前面談到的兩個嚴重問題，即中國不斷下降的民工工資和越來越多的拖欠工資並不是沒有關係，因為它有可能導致世界上新一輪的向谷底賽跑。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工人惡意的要去搶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工人的飯碗，但這卻是客觀的事實。

幾個月以前我在澳大利亞參加了一次關於亞洲「移民」工人的會議。這裡的「移民」一

詞並不是指在另一個國家獲得合法的居留身份，而是指跨國界的「輸出勞工」，或人口走私的犧牲品。這些移民工人缺乏任何保障，他們以更低的價格與那些較富裕的亞洲國家（或地區）如日本、南韓、臺灣、香港和新加坡的便宜勞動力競爭。據估計這種非法與合法的亞洲移民工人的總數在2000年為9百萬人（註十六）。隨著亞洲的勞動力輸出國家（菲律賓、泰國、印尼和越南等）的就業形勢每況愈下——這部分是由於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的增長，這些國家將以更低的價格向外輸出更多的廉價勞工。例如，在1998年，臺灣的家傭有83%是菲律賓人。但到2002年，菲律賓家傭的比例下降到18%。他們被更廉價的越南和印尼勞工所代替。中國勞工就是以類似的方式間接影響亞洲勞工。

中國勞工也對世界上其他一些非常貧窮的國家有直接影響。如果你在互聯網上用「中國

註十三：“'Make in China' Products Encounter Massive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s,” China On-line, December 28, 2001; Qi Ming, “Chinese Enterprises to Tackle Trade Dispute by Legal Means,” Beijing Review, May 2, 2002, pp.16-18.

註十四：Elizabeth Becker, “U.N. Study Finds Global Trade Benefits Are Uneven”, New York Times, Feb24, 2004, Late Edition - Final, Section C, Page 5.

註十五：Jay Mazur, “Labor’s New Internationalism,” Foreign Affairs, vol.79, no.1 (January/February), 2000; pp. 79-93; Alan Tonelson, “There’s Only So Much that Foreign Trade Can do,” Washington Post, June 2, 2002.

註十六：根據下述文章中的資料計算得來。Nicola Piper, “Migration and Rights Issue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an Overview,”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he Rights of the Migrant Workers,’” August 6 and 7th, 2003, p. 4.

工人」+「非洲」搜索一下，出來的文章數目之多會令你驚訝不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地方之一，但在納米比亞和萊索托等國家也有中國工人在為外國投資者（主要是來自亞洲的投資者）打工。搜索出來的文章中有不少是有關中國工人抗議非人待遇和拖欠工資的報導（註十七）。其中一個網站在一篇落款為1998年的文章中抱怨說，「在毛里求斯，……儘管當地居民的失業率居高不下，卻僱傭了5000名中國工人到這個島國的自由貿易區工作」（註十八）。關於中國勞務輸出對這些貧窮國家的影響還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這些勞務輸出按中國的人口數量可能無足輕重，但對非洲國家的影響卻不容忽視。

世界上很多發展中國家現在都開始擔心「中國因素」（註十九）。孟加拉——這個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正在憂慮，他們現有的300萬制衣工人到明年也就是2005年將有100萬人失業。中國政府也試圖安撫其亞洲鄰國，強調說繁榮的中國經濟意味著大家都有更多的商業機會。但事實上所有的政府對勞工問題都避而不談。

### 三、結論：十字路口的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

簡言之，中國勞工的全球化不利於中國的

民工和大多數中國工人；全球化了的中國勞工也對其他貧窮國家、甚至比中國窮得多的國家的勞工有不利影響。解決這個問題已經是刻不容緩，但我並不假裝我自己有現成的答案。中國政府應該繼續壓低勞動標準來與國際市場競爭嗎？亞洲已經有3個國家（柬埔寨、越南和泰國）承認它們有責任提高本國的勞動標準（註二十）。但是，除非中國也加入它們，為阻止勞動標準繼續下滑設定底線，情況可能會繼續惡化。我另一個比較遙遠的希望是，世界上受剝削的工人自己形成一個全球化的社群，起來為自己的權利而抗爭。◎

註十七：例如，網址：<http://www.wsws.org/articles/2004/jan2004/euro-j17.shtml>，[http://www.findarticles.com/cf\\_dls/m1571/43\\_14/55710743/p1/article.jhtml](http://www.findarticles.com/cf_dls/m1571/43_14/55710743/p1/article.jhtml)，2004年2月12日登錄。

註十八：<http://www.ainfos.ca/98/mar/ainfos00036.html>，2004年2月12日登錄。

註十九：George Wehrfritz and Mahlon Meyer, with Hideko Takayama, N.J. Lee and T.J. Tan, "Trapped in a Chinese Box," Newsweek (this article not in U.S. edition), February 18, 2002.

註二十：前引書，陳佩華 2003年。

本刊第八期有若干錯誤，茲訂正如下，並向作者與讀者致歉：

## 勘誤

- 一、〈資本主義體系的結構危機與反全球化運動〉一文，P.2左欄倒數第11行第1字「因」應為「且」。
- 二、〈怎樣才能出現進步的第三勢力〉一文，P.16左欄第5行倒數第4與5字間漏「、」號；P.17左欄第6行第1字「總」之前漏「的」字，右欄倒數第17行倒數第5與6字間漏「，」號。
- 三、〈建立適當的道義高度去排斥理智和邏輯〉一文，P.28左欄第2段第4行第8字「檔」應為「文件」；第8行最後一字「復」應為「複」。
- 四、〈有關一九八九年事件的一些思考（下）〉一文，P.43右欄最下方轉載註記應為《中國與世界》一九九八年，八、九月號。<http://www.zgysj.com/>。



中國大陸自實行經濟改革後，右翼的新自由主義思潮逐漸茁長，到了一九九〇年代甚至蔚為主流，從思想、輿論上為資產階級的崛起鳴鑼開道，保駕護航。但隨著大陸的資本主義化，官商勾結、權錢交易，蠶食鯨吞國有資產，損害人民利益的惡行普遍氾濫，工人、農民慘遭敲骨吸髓的困境日形惡化，一些有良知的中青年知識份子，不忍坐視不顧，紛紛奮起嚴厲批判新自由主義的理論與政策。這些知識份子被稱為「新左派」，或非主流派，本刊第五期曾轉載左大培先生的《學術界有人爭著賣國》，本期再轉載楊帆先生的文章，以見大陸非主流知識份子的觀點。【編者】

# 最野蠻最殘暴的私有化

■楊帆（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

## 一、新自由主義的話語霸權

2002年7月份，左大培的《混亂的經濟學》一書出版，這是石油出版社出版的，我主編的《世紀選擇叢書》的第九本，年底出版盧周來《現代西方防務經濟學》即全部完成。這是在叢書層次上全面反思中國90年代社會思潮，批判占統治地位的新自由主義思潮的開始。我們這部分經濟學家，是幾年以來在批判新自由主義，特別是買辦經濟學家的過程中逐步相識，並且有所合作的。

左大培所稱「中國特色的經濟自由主義」即新自由主義，共同理念是放任少數人不顧多數人和國家的利益而自由自在地搶奪財富，讓國際資本放手在中國掠取利潤，必然導致資本主義私有化，而且是最野蠻最殘暴的私有化，導致少數人以犧牲多數人為代價而暴富，國際資本統治和盤剝中國。他把盛行於中國的西方經濟學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來自於西方經濟學中的誤人

之見。

1. 生產資料私有制是一切經濟活動的前途，特別是市場經濟中一切活動的前提。交換和市場的自發運行有充分的效率……新自由主義是堅決反對政府干預的。
2. 自由貿易是最好的外貿政策，靜態的比較優勢是其理論基礎。發展到目前就是主張盲目融入全球化進程，遵守國際統一經濟規則，按照國際慣例辦事。
3. 經濟自由主義認為只有一種最優的經濟體制，把美國經濟體制作為世界榜樣。

第二部分：西方主流經濟學另一部分觀點，中國新自由主義者有意回避。

1. 以公共利益為出發點。
2. 以實證的微觀經濟分析為基礎，重視社會經濟福利。
3. 市場失靈的理論。由於不完全競爭，外部性，不完全資訊，未來不確定性的

存在，市場會失靈。

4. 非自由貿易如保護貿易，戰略貿易的好處。
5. 公有制企業同樣可能有效率。

**第三部分：中國新自由主義特有的誤人之見。**

1. 改革開放至上的政治標準和思維定式。給不同意見和政府干預扣上反對改革開放的帽子。
2. 以效率取代公平和平等。
3. 不要任何秩序的傾向。反對政府任何的治理，主張自由放任，籠統地反官崇民，成為私有化的理論基礎。
4. 將一切與經濟有關的活動都市場化，變成現金交易。
5. 腐敗有理，放縱違法違軌和腐敗行為，把腐敗作為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橋樑。
6. 採取一切可能方式，不惜一切代價實行私有化。
7. 不惜代價擴大外貿規模。
8. 外國投資越多越好，主張以跨國公司整合中國產業，不講民族產業概念和國家的主導權。
9. 大力吹捧全球化，主張對外經濟全面自由化。
10. 相信制度萬能，自由競爭可以做到一切。

我側重於綜合分析，從更廣泛的方法論角度有以下補充：

**第一、中國的自由主義分為一般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在哲理層面上相同，就是文化一元論和普適論，直線發展的歷史觀和庸俗進化論，客觀唯心主義，強者哲學，美國至上。**

**第二、極端的哈耶克自由主義。抬高自由貶低民主。最堅決否定歷史上一切革命，否定毛澤東。反毛，親美，是中國目前自由主義的**

**最基本特點。**

**第三、制度決定論。**以美國制度學派為理論，把中國一切問題都歸結為制度，主張全盤學習美國的經濟和法律制度（不包括民主），照辦發達國家市場經濟制度，並且要強制實行不惜代價。這是一種「右翼史達林主義」，所謂人為改變生產關係促進生產力發展，關鍵是改變所有制，只不過從左傾的國有化變成右傾的私有化。

**第四、在經濟戰略和政策層面，新自由主義者主張腐敗有理，由於大部分是經濟學家，他們自己也獲得巨大利益。一般自由主義者無法獲得經濟利益，有左右翼之分。左翼如秦暉，王東成，丁冬等比較同情人民群眾，反對腐敗私有化。右翼反映大知識份子的親美傾向，不同情人民群眾。他們現在正在積極要求修改憲法，「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他們反對人民民主，主張資產階級憲政。如曹思源，茅予軾等。**

**第五、80年代的經濟自由主義者，還沒有發展到買辦化的地步，著名經濟學家主要代表民族資本原始積累並謀求合法性的需要，現在已經失語。2000年左右中國新的買辦資本代言人出現，如張維迎，江小娟，樊綱，龍永圖等，主張取消民族產業的概念，在高教領域全面推行新自由主義統治，重用「海歸」，甚至要打破本土學者，特別是馬克思主義者的飯碗，如張維迎在北京大學的「改革」。**

**第六、新自由主義話語霸權的確立。**90年代以來，中國官方學術界強調規範性，與國際接軌，年輕化，全面引進外國學科，通過破格提拔，培養了一批經濟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並且給他們特殊待遇。官方政策通過放寬對經濟學的控制，導致了經濟學思維對整個社會科學的控制。對傳媒的行政控制和傳媒自身的商業化炒作相配合，進一步以經濟思維控制了社會輿論和思想。國際資本和民間資本為了形成利



益集團，也追捧一批經濟學家。經濟自由主義者獲得了政府，國際和民間資本的大量資源，得以通過學術會議，辦論壇，評職稱，學術獎金等手段，排斥不同意見，對其他經濟學家進行封鎖，制裁和妖魔化。大批「海歸」佔據國家要害部門。在官方政策鼓勵下，新自由主義迅速成為思想學術界的主流：

1. 堅決反對以國家力量發展戰略產業，主張以外資彌補比較劣勢產業。
2. 進一步對國際霸權妥協，以強制辦法在國內推行接軌。
3. 反對進行利益格局調整，主張繼續擴大兩極分化。
4. 反對進行民主改革，主張以強權保障資本自由，把中國推向拉美道路。
5. 反對政府必要的干預，鼓吹無政府主義。

## 二、新自由主義的社會背景

新自由主義在中國思想界處於絕對控制地位。其背景是：

**第一、專制與自由主義相結合，權力資本化從商業資本，生產資本發展到金融資本階段。**新的強勢集團基本形成，要求相應的思想理論，並且形成經濟學對整個社會科學的壟斷，新自由主義話語霸權對經濟學的壟斷。在中國，經濟學成為神學，經濟學家成為神甫，利益關係代替了信仰，虛構的理性人實際是資本的力量，成為生產力規律的代言人，並且借助權力和國際資本的力量，準備吞噬和瓦解中國。

**第二、改革逐步放棄對弱勢群體補償，剝奪性質日益明顯，背棄了漸進改革的最基本精神。**每一次「與國際接軌」的體制改革，都產生一小撮暴富者，淘汰出一大批勞動者。所謂「帕累托最優」的改革底線在1998年以後被突破，基尼係數超過了0.4，腐敗升級；特別是，在中國這個人均資源極端短缺的國家，生態損失已經超過國內生產總值，面對即將到來

的人口四大高峰和環境資源承载力極限，社會「精英層」缺乏起碼的責任感和道德自律，他們在經濟增長中得到了最大份額，卻把生態損失留給了大多數人和後代子孫。

主流經濟學在中國最惡劣的作用，就是以一套話語霸權掩蓋這一切，喪失了經濟科學最基本的實證性；現在掩蓋不住了，就將自己為權力資本強勢集團利益謀利益的辯護性赤裸裸地表現出來。請看那些當日鼓吹「帕累托最優」和實證經濟學沒有道德的「著名經濟學家」，現在在講什麼？他們在講：歷史發展只有這一條路，改革需要不惜代價，要自由不要民主，選票不如鈔票，政府有現代化武裝，老百姓造不了反！

**第三、經濟學主流派為強勢集團服務並且謀取巨大利益，他們主張專制下的自由和原始資本主義。**

權力資本目前發展到國際化階段，產生了民族資本和買辦資本的對立，民族資本成為弱勢集團。新的買辦資本集團有自己的「海龜」經濟學家，他們在與國際接軌的名義下肆意貶低民族利益，破壞國家安全，並且以海外關係和政府特殊重用的優勢，進行公關，影響政策，甚至企圖在中國奪權。

他們的重點是打垮股市，控制銀行，製造金融危機以後低價收購中國資產，通過控制經濟命脈進一步影響政治，這是買辦資本發展的必然。資本國際化雖然在邏輯上與權力資本化一脈相承，但其代理人卻不相同，所謂「海龜與土鯨之爭」，反映的卻是民族資本和買辦資本之爭。於是，經濟自由主義者面臨分化，民族資本的代表成為非主流派。

**第四、國際資本和國際霸權的壓迫日甚，正在威脅國家基本安全，包括經濟方面的石油運輸線安全，產業安全，基因安全，金融安全，網路安全；政治和社會諸多安全方面。**這就產生國家利益和國際霸權的對立。

經濟自由主義的強者哲學特點決定了其必定站在國際霸權一邊，為國際資本的利益在中國幫助製造危機。

第五、新自由主義的危害非常大，正在影響政府決策，並且形成了市場教條主義，阻止我們認識實際並進行調整。其對新聞和教育的壟斷同樣危害甚大。決策層的主導思想是與經濟自由主義一致的，甚至連中西部，戰略產業，國有企業的代表，都在信奉新自由主義這種對於自己利益不利的理論。

因此我們認定，新自由主義如果再控制我國的思想界，將對改革開放和發展穩定都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甚至導致歷史上王明教條主義那樣的損失。

### 三、經濟學「非主流經濟學派」的興起

正是出於維護國家和大多數人民的願望，中國一批被新自由主義排斥的中青年學者從各個方面凸顯。

1. 反腐敗：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學家的公開衝突始於1994年。厲以寧，蕭灼基等聯手反對政府控制通貨膨脹。左大培在《經濟學消息報》上發表「經濟學界也要反腐敗」一文，引起右翼經濟學家的聯合報復，這是經濟學界以私人力量進行壟斷和制裁的開始。
2. 反壟斷：我在1995年提出「超越左右翼」，2000年我組織系列思想討論會，將記錄在網上發表，以此為基礎主編《世紀選擇》叢書。
3. 許多學者抵制新自由主義。如：趙英著作《大國世紀》，提出發展超級產業，楊斌：《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韓德強：《碰撞》、《薩繆爾遜積極性批判》，張祥平：《美好的中國人》，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王小東、房寧、喬邊的《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

路》，喬良、王湘穗《超限戰》等。

我所主編的《世紀選擇》叢書包括：高粱的《戰略產業》，盧周來的《當代西方防務經濟學》，李大光《中國安全抉擇》，陸建華《中國社會問題》，張祥平《傳統文化在現代化中的作用》，左大培《混亂的經濟學》，楊帆、苑林雅《中國直面大國挑戰》，楊帆、盧周來主編《以民為本，關注民生》，易正《關於中國生存環境的報告》，荊林波《第三隻眼睛看網路經濟》。都是新自由主義有意排斥的問題。

前言中引用陳岱孫先生文章，他在臨終前尖銳地指出在中國濫用西方經濟學的危險。這篇文章被他的學生們劉偉，晏志杰長期封鎖。

我們人單勢孤，沒有任何資源可供利用，盧周來在關於經濟學非主流派的文章中，就表達了這種孤獨和悲涼：「我並不指望這本書的出版能改變中國經濟學界的格局，更不指望能夠對於中國未來的走向產生什麼影響。我始終都是開頭那句話：僅想以此書作為一個文本上的見證，使世人知道，在中國經濟學界，存在著有這樣的一種代表弱者的聲音。」

在巨大危機隱患面前，中國出現與新自由主義對立的三大思潮：經濟學方面的非主流，政治方面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文化方面的新左派。經濟學非主流有如下分支：國防派、戰略產業派、國情派、國土派、農村派、環境派、政府主導派、生產力派等，雖然大家並未溝通，有些人也以為自己是主流或者極力使用模型化的辦法爭取主流派的承認，但是他們的研究物件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成為經濟自由主義的一員，除非他們想把自己的學問變成偽科學，或者損害自己研究物件的利益。

經濟學非主流反對任何話語霸權，反對以規範化扼殺獨立的思想，反對教條主義，主張以實踐衡量一切，主張以通俗的語言表達深刻的思想，而實事求是，反映真實情況，是最起碼的準則。

我們堅持中國知識份子傳統的社會責任感，反對片面模仿西方知識份子的職業化技術化，反對中國經濟學家片面為利益集團服務。中國知識份子應該繼續同時承擔科學和道德信仰雙重職能，成為中國社會良心的代表。

我們反對接受西方定義的全球化，沒有包括勞動力自由流動，不允許中國人向國外自由流動，只是資本的自由，沒有人的自由。全球化不僅不能夠解決中國大多數人基本生存，而且加劇所有社會矛盾。中國有自己特殊的國家利益，應制定獨立的國家戰略。

我們認為改革需要中國大多數人民支援，必要的體制改革應補償受損失的社會群體，由各個社會階層公平負擔改革成本，享受改革成果。借用外資力量提高中國企業運營效率，推動體制改革，是可取的，但最根本的改革合法性，卻只能來自於中國大多數人民。絕對不可以拋棄國家的信譽，不承擔歷史責任，在喪失人民支持的時候，轉向「國際社會」去尋求改革的合法性，絕對不可以美國標準強加於中國，即使某項「與國際接軌」是完全必要的，也要考慮保護中國人民和企業的現實利益，防止國際資本和買辦國內買辦勢力勾結，趁機攫取巨大利益，甚至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影響政治決策。

我們反對新自由主義對中國人鼓吹強者哲學，與強勢集團勾結損害大多數人利益。我們為弱勢群體講話，這個弱勢群體包括全體中國人，包括面對國際資本的民族資本，包括面對國際霸權的國防事業。我們承認弱肉強食規律的存在，但反對以強凌弱，認為弱者有權利，有必要打破強者壟斷，通過自身努力強大起來。

我們提醒全社會特別是國家領導人，對於新自由主義以「經濟規律，自由化，全球化」為標榜推行全球戰略應提高警惕。

我們認為，「和平與發展」是主題但不必然存在，它不是國際霸權者恩賜而來，不是我

們妥協退讓乞求而來。只有以綜合國力的提高，包括以國防和戰略產業所帶動的高科技產業的真正發展，包括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的恢復高漲，包括社會平等與和諧，包括經濟社會的全面可持續發展，包括更加強大的國防和更加強硬外交政策，才能夠真正獲得。

目前中國在獲得巨大發展的同時，也醞釀著重大危機，其根源就是人均資源極端短缺，權力與資本的結合，社會道德信仰的瓦解，而國際霸權壓迫日甚。經濟學非主流以反危機為政策中心，主張提前認識危機，並且提前調整以化解危機。民主改革應該加快速度，但是應該適合中國國情，應成為大多數人的民主而不是少數人的民主。道德和信仰應該在民族文化的基礎上重建，在此基礎上才能健全法治，以低成本方式迅速遏止腐敗，恢復政府能力。

只有有效克服未來的危機，中國才能夠真正走向持續穩定發展的道路，目前的戰略調整是關鍵。如果不能主動調整，那麼危機的發生遲早會促進我們調整，問題是中國人民要付出更多的代價。克服危機的根本動力，就是十幾億中國人要生存。為大多數人利益和國家民族利益奮鬥的經濟學非主流派，為中國大多數人的謀利益的人道主義和人權主義者，在中國具體情況下，它並不表現為個人主義和資本主義，而是表現為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民生主義、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

所有戰略調整，都必須首先樹立「危機預期」，把「和平與發展」換為「安全與發展」。美國「樹假想敵」戰略值得借鑒。孟子說「國無敵國外患，國衡亡」。

中國應以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起步，帶動民生主義與民主主義，提前化解危機因素，以迎來新的發展時期。◎

譯自：<http://www.gongnong.org/bbs/>

# 勇敢的無產階級戰士

■金寶瑜

# 韓丁



我們敬佩的韓丁（William Hinton）在今年五月十五日去世了。韓丁在2001年夏曾來台灣，台灣的年輕朋友們為他安排了幾場演講和參觀。但是在韓丁到達台灣的第二天，他的心臟病突發，台大醫院的心臟外科醫生為他做了心導管手術，手術雖然非常成功，但是他回到美國後身體一直不能恢復，終於在一個月前離去了。

韓丁一生為正義的事業勇敢的奮鬥，從不畏懼。他雖然出生於一個生活富裕的家庭，但是他的階級立場永遠是站在工人和農民這一邊。十幾年前，有一次哈佛大學校友聚會，有一個退休的軍官說：「我的一生都在避免惹麻煩。」韓丁說：「我一生都是在惹麻煩。」韓丁說得不錯，因為他從不放過與惡勢力鬥爭，因此招來許多麻煩。

## 韓丁的母親與他的青少年

韓丁1919年出生，他幼年喪父。他的母親韓卡米麗塔是個卓越的女性——獨立、有智慧、勇敢、有魄力，最重要的是卡米麗塔是個有社會正義感的人。她一個人不但將韓丁和韓丁的姊妹三人扶養成人，並且教育了他們，影響了他們。卡米麗塔相信杜威的教育哲學，她認為人的學習應該是知識與實踐互相結合。為了實現她在教育上的理想，她在美國東北的佛蒙特州創辦了一所（小學到中學住宿的）學校（名為Putney）。這所學校建在一大片土地上，有自己的家畜農場和自己的菜園。所有的學生除了上課之外，都要從事生產勞動。卡米麗塔的三個小孩都是在這所學校畢業的。

韓丁的妹妹寒春（Joan Hinton）有一次告訴我說，她在小學二年級時，全年所學的就



韓丁（中）同妹妹寒春（左一）、妹夫陽早（右一）全家合影。

是由老師代領全班建造一個小城鎮。從設計開始到全部建成為止，他們不但學會如何造房子（房子是小型的，適合孩子們的高矮）、做傢具，也學會如何接電線。在接電線的過程中，他們學習了電的理論。這個小城鎮有學校、郵局、商店還有城鎮辦公的地方等。寒春說：「有多少人還記得他們小學二年級時候學的東西？我卻永遠都不會忘記。」

韓丁說在三十年代經濟大恐慌時，他的母親要請一對夫婦來幫忙料理學校的事。卡米麗塔在報上登了一個小廣告，有好多人來應徵。在卡米麗塔已經雇用了一對夫婦之後，應徵的人還是陸續不斷的來。韓丁說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對夫婦步行了好幾十哩的路才來到這家學校。他說很多年後，他還是無法忘記這對夫婦離去時失望的神情，和他們開始漫長回程時的背影。

我聽過好多有關卡米麗塔有趣的故事。七十年代她去中國看望寒春時，走起來一跛一跛的，原來是她去華盛頓反越戰遊行時把腿跌傷

了，一條腿比另一條腿短了一節。過了兩年她又來中國，這次走路不跛了，原來是滑雪又摔了一跤，這次把另外一條腿也摔短了一節。卡米麗塔年輕時是個滑雪健將，她到了七十多歲，還繼續滑雪，她的三個孩子都深深受到她這樣無所畏懼的精神的影響。韓丁中學時的一個暑假，找到一份工作，這份工作是給幾個到加拿大高山勘查地形的人揹行李，這些地方沒有人去過，所以沒有地圖，他們去就是為了畫地圖。在荒山僻野裡，韓丁被一隻大黑熊趕追，差一點沒喪命。

1936年韓丁中學畢業，他想要到世界各地走走，希望能對社會和人生多增長一些認識。他堅持不要拿他母親給他的錢，也拒絕一個做船長叔叔的幫忙。韓丁在舊金山等船時，先做清洗磚頭的工，他說工人不管多努力做，每天就是達不到老闆規定的數額，因此就拿不到工資。後來他跟其他的工人聯合起來，把他們洗好了的磚湊在一起，來領工資，然後大家再分。這是他第一次跟雇主鬥爭的經驗。





韓丁在解放區培訓新中國第一代拖拉機手。

China) 給韓丁和陽早讀，這兩個年輕人讀後，對中國革命非常嚮往，一心想去中國。

1945年大戰結束，韓丁作為美國戰情新聞辦事處的一名職員來到中國，次年陽早也來到中國，他直接去延安。國民黨轟炸延安時，陽早負責趕著一群牛跟著部隊後面撤退。寒春是原子物理學家，曾參與造原子炸彈。她喜愛科學，但深恨用科學來殘殺百姓，1948年，韓春決心放棄原子物理的研究而來到中國。陽早和寒春在窯洞裡結婚，在中國生活了半個多世紀，在生產上他們從事乳牛牛種改良和農業機械化，在政治鬥爭上他們堅持毛澤東路線，陽早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去世。

1947年聯合國救濟總署給中國一些農機，並招志工使用這些農機，

上了船，韓丁在廚房做洗碗工。船在日本東京停泊，韓丁在那邊一家美國報紙找到了一個記者的工作，六個月後，他經韓國、中國東北、西伯利亞、蘇聯、波蘭、德國，回到美國。中國給韓丁留下深刻的印象。韓丁在哈佛大學讀了兩年，感覺到他所學的很不切實際，因此轉學到康乃爾讀農業機械。在康乃爾結識了陽早 (Sid Engst, 陽早後來跟寒春結婚)。陽早的父親是一個紐約州養牛的佃農，學的是畜牧。多年後，這兩個好朋友還在回憶他們當年在紐約州組織農會不成功的往事。

### 中國革命與韓丁一家人

韓丁的姊姊是個進步的知識份子，她介紹了斯諾寫的《西行散記》(Red Star Over

韓丁應召後被派到東北工作，但是他不滿國民黨的惡行和腐敗，自願來到共產黨所佔領的河北解放區。在解放區中，物資供應雖然缺乏，生活也非常艱苦，但是因為幹部與農民共甘苦，所以農民的士氣很高。韓丁與當地人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他教年輕人如何使用和維修農機，韓丁佩服這些農民吃苦耐勞的精神和認真的學習態度，與他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寫的《鐵牛》這本書就是記載這一段故事。

1947年秋天，聯合國結束了農機救援的工作，把志工解散送回美國。韓丁決定留在中國，但是農機沒有燃料，無法使用，他只好離開農村的工作，來到山西長治附近的北方大學教英文。北方大學的教職工組成到張莊村的土改工作隊，韓丁要求參加。

## 《翻身》——從張莊土改的筆記到出版

1948年韓丁跟著土改工作隊的其他教職工一起來到張莊，他踏進的第一家就是後來成了韓丁的好朋友王金紅的家，在寒冷的冬天，這間房子連一扇門也沒有，他一眼望去床上沒有被褥，只鋪了乾草。在此之後的六個月中，韓丁看到張莊的貧農和下中農生活困苦的狀況，和他們對土地改革的支持。韓丁在他的一千頁的筆記中仔細的記下這一場群眾運動，他誠實的寫下在土改中所遇到的問題，和幹部所犯的錯誤，重要的是共產黨的領導和張莊的人如何解決了這些問題和糾正了錯誤，達到最後成功。在1947年的前後，同樣的土改運動在中國廣大農村中進行著，土地改革將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制度從經濟基礎的根上拔了起來，在這場群眾運動中，農民翻了身，這就是為什麼韓丁將張莊土地改革的經驗寫成書出版後，在世界各國引起如此大的震撼和影響的原因。

1953年韓丁回到美國時，正當麥卡錫主義反共的高潮，韓丁的筆記被沒收了，韓丁沒有筆記，沒有辦法寫他的書，就決定到美國各地去演講。韓丁在一年內走遍美國各地，做了三百次演講。每到一站講完後，大家給他湊夠汽油錢，介紹給他去下一站。美國的FBI一路追趕，但是老是遲了一步，他們來時，韓丁已經走了。韓丁在周遊美國的演講時，他發現美國一般人很渴望知道有關中國的消息，他在演講中學會了如何與群眾溝通，群眾熱烈的反應使他認識到他要寫的這本有關中國土地改革的書的重要性，也因此下了決心要向惡勢力鬥爭，拿回他的筆記。

美國的海關沒收了韓丁的筆記，海關隸屬財政部，韓丁告美國財政部侵佔私人財產，兩年後韓丁勝訴，海關通知韓丁到華盛頓去取他的筆記。到了華盛頓，海關的人說筆記已經被參議員伊斯特蘭（James Eastland）委員會派人拿走了。韓丁只好再重新起訴告美國國會的



韓丁在法庭上勝訴的情形。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也叫Eastland Committee。這個委員會是麥卡錫主義為反共設立的，它專門對付美國的左派。

在這期間，韓丁的生活越來越困難，他要養家，還得付律師費，他在費城的碼頭找到了一份維修起吊機的工作。韓丁只會修農機，對起吊機一無所知，他只好自己摸索著，碰到困難就假借上廁所去偷看起吊機結構的書。在碼頭工作的幾年中，韓丁又來惹麻煩，忙著組織碼頭工人。韓丁回到美國後一直支持美國的共產黨，直到中蘇論戰開始，韓丁看見美國共產黨不能獨立思考，只知道跟在蘇聯後面，才放棄對它的支持。

不久韓丁因為被列入黑名單被解雇了，也因為黑名單，所以他找不到其它工作。卡米麗塔在賓州有一塊農地，韓丁決心作農人，靠種地過活。他為了要重新起訴，又要花很大一筆律師費用，韓丁和他的家人和朋友用開餃子晚會來募款，韓丁說他們包了好多個餃子。在韓丁從新上訴後，他被Eastland Committee傳去國會作證。這時FBI收集的韓丁的檔案已經有兩萬頁。韓丁被傳去作證的原因是，這個委員會認為是韓丁安排寒春去中國的，而且認為寒春把作原子彈的祕密給了中國。



1987年韓丁和山西張莊村村長王金紅在美國波士頓附近的邁勒羅斯市特夫茨大學同英國劇作家大衛·哈利改編的話劇《翻身》的演員合影。

「假如你告訴我為什麼招我來作證，我就告訴你我的名字。」。問：「我們關心美國的內部安全，我們認為你可以提供這方面的資料。」韓丁答：「我也關心美國內部的安全，但是我認為這個委員會的主席對美國的安全的威脅要比我來得嚴重。」每一次一個參議員問韓丁一個問題，韓丁就從他的口袋拿出一張小紙條，紙條上有韓丁收集的有關這個議員所作的壞事，韓丁就一個個反問這些議員。沒有人知道韓丁口袋裡還有多少張小紙條。因此第二天，聽證會就搬到一間比較小的房間，也不允許有電視

韓丁為了準備去國會，他收集了Eastland Committee中的幾個參議員的資料，心裡有了底。他每一次講到去國會作證這一段經過都得意洋洋，1999年韓丁八十歲，朋友為他慶祝，辦了一場研討會：認識中國革命，慶祝韓丁一生的貢獻。在大家要求下，他又講一次這段得意的故事。（見每月評論，2003年10月）

韓丁說Eastland committee的幾個參議員做了很多犯法的事，韓丁在三家電視台，六架錄影機耀眼的燈光下，充滿了信心跟他們針鋒相對。他們問他：「你的名字？」韓丁說：

錄影。第三天搬到一間小閣樓，不許新聞記者參加。韓丁說他與這些人對抗的信心來自他在各地演講時，群眾對他的支持。

韓丁終於勝訴拿回了他的筆記，他一邊種地一邊寫書，《翻身》在1966年出版，第一版就賣了二十萬本。其後《翻身》被翻譯成八種語言，在德、日、法、義大利、西班牙和印度（孟加拉）和中國出版，也被英國劇作家大衛·哈利（David Hare）改寫成劇本，在世界各地上演。《翻身》成了美國各大學中國歷史課中必讀得教科書，在世界許多國家都產生很



大的影響。

中國總理周恩來邀請韓丁和他的家人來中國，後來卡米麗塔帶領了一對年輕人去中國各地參觀學習。

### 《深翻》——記載張莊集體化的經驗

1971年韓丁再度回到張莊，村民見了他歡笑著說，「老韓你回來了。」，「你好老啊。」，「頭髮都白了。」韓丁也發現在這二十多年中，張莊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深翻》記載了張莊在土地改革後集體化的經驗，跟《翻身》一樣，韓丁誠實的寫下張莊從互助組到初級社，再從初級社到高級社和人民公社的歷史。韓丁記下了在集體化的每一個階段中所碰到矛盾和困難，這些矛盾和困難又在集體化進一步提高後得到解決。張莊的人信任他，跟他講實話。韓丁寫到張莊農民參予有關集體化事宜討論開會的過程，有時為了決定一件事，花好多時間開會討論，顯得很沒有效率。但是我倒是覺得農民集體開會討論跟他們利益密切相關的事是很了不得的發展，那時每到秋收之後，幹部都要向農民作檢討，為他們做的事負責，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事，也是今天中國農村再也看不到的事。今天中國農村的幹部在沒有農民的監督下胡作非為，他們有些惡行甚至超過解放前農村裡的惡霸。

《深翻》在1983年出版，那時中國共產黨已經開過三中全會，全面的農村改革即將開始，韓丁在《深翻》裡雖然認為毛澤東在土地改革後，積極推行合作化的做法是對的，韓丁說：「土地改革給貧農和雇農一股衝力，因此有可能在農村中普遍建立起互助組和合作化這樣集體的生產關係。毛澤東抓住這個機會，完成了這場運動。如果他不這樣做，他就失去這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機會，農村的兩極分化和分裂的現象就註定會再一次猖獗起來。」(165)

但是在寫《深翻》時，韓丁沒有看清劉少



王金紅（右一）向韓丁和他的旅行團組介紹張莊發生的變化。

奇和鄧小平的路線，他說他知道毛和劉在政治上立場不同，但是他認為不能判斷劉的路線到底是要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還是真的要搞資本主義。他說他雖然看到毛和劉在政治上的分歧，但是不知道這樣的分歧只是因為在實行社會主義該採取什麼步驟而產生的意見上的分歧，還是由兩個完全不同的階級立場而得出不同的路線。八十年代初時，有很多人對鄧小平改革的真相不瞭解，對改革還抱有很多幻想，因此韓丁這樣的模糊的論點無助於釐清當時中國改革的方向。

但是韓丁做事永遠是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在他認清鄧小平改革的真相後，韓丁勇敢的承認了他以前判斷的錯誤，並且糾正了他的論點。在他為深翻中文版寫的序裡，他說他當初不能瞭解毛所指的阻礙社會主義的對抗性矛盾的意思，他說張莊的領導人，像黨支部的幹部們也不瞭解，但是他說他自己沒有領悟到毛的意思是不可原諒的。他這樣說：「在美國長大，我有許多年與資本主義打交道的經歷，對資本主義的認識我極少會有錯的判斷或存有任何幻想（因此不應該犯這個錯誤），但是一直到了改革之後，我親眼看到中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從一個部門到另一個部門被毀掉了，我才明白毛所指的：「中國資本主義道路」和



韓丁與農民下地勞動。

「走資派」是什麼意思，我以前從來不認為這樣的改變是可能的。1979年以來全面展開的改革讓我醒悟到，我開始明白改革並不是要探索一條對國家發展最有效的道路，也不是要通過錯誤和挫折學到什麼，或者用各種不同的嘗試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也不是什麼：「摸著石頭過河」。相反的，改革正是在執行一套經過熟思的完整的計畫，這套計畫逐步除掉了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逐塊挖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基石，而這套計畫是有意識的在貫徹推行的。」

韓丁在序言的最後這樣說：「我如果有現在的認識再重寫《深翻》的話，我就會對劉少奇要鞏固新民主主義體制的論點提出批判。同時我也不會像我以前寫《深翻》時錯誤的認為是封建主義在阻礙社會主義的發展，而會正確的指出是黨內走資派真正的阻礙了社會主義的發展。我也會對在廬山會議中毛澤東對批評他的人提出反駁給以更正面的評價。毛抓住了大多數人（包括我自己）沒有抓住的一幅清晰的全面發展圖片，因此他知道囂張的批評來自何

處，和這批評背後的階級立場。總的來說，我會對文化大革命做出更正面的評價，對毛一生的貢獻，特別是毛晚年的貢獻做出更正面的評價，因為他晚年的貢獻是最有創造性的，最有遠見的，也是對於人和社會進步的辯證關係探索的更深的。」

《深翻》的中文譯版沒有出版，因此韓丁在序文裡的話也沒有公開，但是韓丁的這些看法在1990年出版的《大回潮》（The Great Reversal—the Privatization of China, 1978-1989）中說得很清楚。

在《大回潮》的最後一章中——1989年6月天安門屠殺，韓丁嚴厲的批評了中共政權。

1966年韓丁在《翻身》的序中說到，《翻身》雖然拖延了十八年才出版，但是它並沒有過時。韓丁過世後，在一篇在印度每月評論中紀念韓丁的文章裡，作者這樣寫著：「韓丁寫的《翻身》出版已經有三十八年了，但是這本書到今天還是及時的。印度倒退的農業仍然籠罩了印度的社會和經濟，印度的人民到今天還沒有翻身。」◎

一九五〇年代開始的「白色恐怖」時期，長達數十年，根據官方公佈的檔案，其間遭槍決犧牲者四千餘人，身繫囹圄者二萬餘人，受害人數之多與刑戮之殘酷，皆遠過「二二八事件」，但因所牽涉者大多為左傾人士，既為國民黨政府所厭，復為台灣分離勢力所不喜。故而，不論國民黨當政或民進黨掌權，這段慘痛歷史的真相全貌始終沒有受到官方重視，在民間知者亦極其片斷、有限。這段殘缺的歷史實仍有待補苴罅漏，恢復其歷史意義。本刊自創刊起即連載顏世鴻醫師細膩動人的「白色恐怖」回憶錄，頗獲讀者好評。同為白色恐怖受難者的陳英泰先生鑑於迄今學者與政府官員對「白色恐怖」歷史的詮釋昧於史實，「並不亞於刻意加以隱瞞或曲解的先前統治主流的國民黨」，故發憤撰寫回憶錄，摘錄部分章節授交本刊。本刊將分兩期刊載。【編者】

■陳英泰

# 白色的青春， 黑色的記憶（上）

一個與台大青年有關的  
「二二八」往事與「白色恐怖」的回憶

## 戰爭結束後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中午，日本天皇廣播宣布投降。我當時當學徒兵，是在內湖國民小學列隊聆聽的。日本天皇聲音微弱而發抖，完全聽不出他在講什麼。但由周圍的空氣感覺出是宣布日本投降，要大家放棄反抗。我早由美國飛機所投的宣傳單偷看與和朋友間互相的談話知道終戰的一天遲早會到。我們抑不住台灣從此要日本統治而興奮，的確我們對日本失望透了。

瀕臨戰敗邊緣的學徒兵沒有師生的禮節，教授們和我們一樣都被徵為二等兵，要受曾經

在軍隊待過而位階為下士官甚或一等兵的學生或下級職員的頤指氣使。日本本土來的學生與台灣人的學生理論上都屬日本臣民，彼此從來不曾感覺出有那麼嚴重的隔膜的。現在日本人假借高軍階的特權，狐假虎威的常使勁地欺負台籍同學。日本學生常在夜間把看不順眼的台灣學生一個一個叫去，而幾個人一起拳打腳踢施予暴力。我們四、五月間駐汐止國校時，特別厲害。我也是常挨打者之一。施暴的日本學生中竟然有每天藉新店線火車由新店一起通學的名字叫小出的，台北第二中高我一級，現升學至台北經濟專門學校和我同班的，他們如此

不顧交情，給注重交情的我們台灣人深深感覺他們的民族性真是翻臉無常，加之每一個人的操守都有問題，若有人沒和大家一起出去操練或做工，留在房間整理內務，大家背囊與包袱都被抄得亂七八糟。他們趁機偷吃別人的食品。奇怪的是從來沒有一個台灣人會抄別人的東西。但日本人每一個都會。於是我深覺若把一個台灣人與一個日本人相比，日本人的劣根性比台灣人大。

對於日本人所加的暴行，日本投降了後自然的我們就給以報復。挨打的日本人不甘心地说，他們幾年後一定會重回佔據台灣，叫我們等著瞧吧。當時我們不會把他們的話當真，認為無論如何也不會有那麼一天的到來。我們回到強大的祖國，我們既然是戰勝國，大家合力建設，必定會國富民強，而日本一片廢墟，永遠也看不出有翻身機會。但當時何曾想到半世紀後的現在，日本再成為經濟大國，政治企圖心大，還在企圖重整軍備！我們卻在經濟上遙遙落後於它，更糟的是我們國不成國，國民黨造成的戕害看來永遠也追趕不了他們了。

幾天後我就很高興地除隊回家。台灣現在只等著中國方面的軍隊與官吏來接收。這中間等待回國的日人相當有分寸，有條有理等著被遣返。我們盼望的國軍終於登陸基隆，大家爭先恐後地去迎接，但首先就被他們不起眼的外觀嚇呆了，衣服襤褸裝備很差，且都見不到他們間有任何紀律。和敗戰的日軍仍然威風凜凜很有規律不成比例。大家深表失望之餘，我還在替其辯護說，他們經過困苦的環境下長期地和日軍抗戰，其裝備與服裝之差應予以了解。然而國軍並不只是表象差而已，骨子裡更是魚肉人民，不尊重人民，時時要佔人民的便宜，於是軍人欺負人民的事層出不窮。

日本人回去，房子空出很多。大家紛紛地去佔住。很多郊外的木柵的人都去佔住。我們

看準日本人還沒回日本還在的房子要讓給我們住，他們會打量一下，若覺得不中意就說已許給別人，若中意就會答應。我們兄弟一去幾乎都不會被拒絕。大哥英儒因已有家室，他自己在師大旁邊佔了一棟非常體面的房子，二哥英茂與母親與其餘兄弟都一起住進龍安國小旁邊的一棟有大院子，面積頗大的房子。

但每天都會有軍人拿著蓋有關防的紙條，看到中意的比較大的房子就亂貼，說軍隊要使用，要趕人走。很多人惹不起他們不得不搬給他們。我們好不容易爭取到的房子又大又漂亮，幾天就有人來一次要把成果橫奪，我們每天都要和他們理論。由於不勝其擾，我二哥就向台大拿了一張蓋有台大關防的紙條貼在門口以避邪。我們成功地避開軍人的打擾，卻種了嚴重的惡果。以後我們自己佔的房子成為校產無法處理，損失慘重。

國府所派來統治人民的行政公署長官陳儀沿襲著日本的殖民地統治原則，歧視台灣人民，對台灣仍施行著殖民地統治，（編按：作者此說不確。國民政府在大陸也實行專政，抗戰勝利後，大陸光復地區也普遍發生軍政官僚劫收所謂敵偽財產之事，在西康、四川等地區更是橫征暴斂，民眾不堪其苦，1946年末至1947年初，發生眾至數十萬的民變，組織「政治改革委員會」，與台灣的「二二八」約在同時期（參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第780頁）。國民黨在全中國各地的專制腐敗是中共得以深獲民心，勢如破竹，取得政權的重要因素。）政治不修明、由於當時國民黨與中共在大陸把內戰打得如火如荼，拼命地在台灣搜括糧食與一切物資運到大陸，導致民不聊生，怨聲載道。我非常失望，但希望這只是過渡時期現象而很快就會上軌道而解決，但事與願違，其後物價膨脹厲害，失業嚴重，導致一九四七年間發生二二八事件。

## 在學時

日本投降，戰爭結束，我們重回學校。戰爭末期我們入學，一入學就當兵都沒有上學，蹉跎了半年時間。一回校，制度、學課、教師都照樣，這中間當局派人來接收，台北經濟專門學校幾經改名，併入國立台灣大學法商學院，後又改為法學院，校長、教務主任、訓導主任等慢慢具備。我們主要學課都由留下來的原來的日籍教授擔任，整個看不出改變，只不過其中新來插有擔任國語、國文、公民等台灣或中國人教師而已。

我們沒有教科書，一切靠講義。註冊不必註冊費，講義不要錢。因此上學幾乎不花錢，不僅如此，還有戰爭遺留下來的大陸的制度，對於本人申請經過審查通過的還有公費制度按月拿三十公斤大米與副食費。因此我在學期間都不必用到家裡的一分錢。穿的都以舊衣服將就，事實上有錢也買不到衣料，鞋子也沒有，整年都拖著木屐，一走長路，木屐其中一支撐著腳板的橫帶常會斷掉，以致不得不只穿一支而提著斷了帶的那一支走路。

學校的管理很鬆，學生常簽到後相伴去打麻將或做其他事，有的甚至整年都看不到人也順利地畢業了。因此個人的學業就看個人如何讀了。我初遇了社會學各課，社會上各思想，自由、民主、人權、社會主義等等。由於民主一說是中國立國的根本，我不得不加以特別注意與研究。我初讀《三民主義》還是日本改造文庫出版的孫文原著的日文翻譯本與岩波新書出版的周佛海著的「三民主義」為書名的上下冊。

終戰後相當一段時間幾乎都看不到新出版的書籍。但等待遣送回日本的日本人把所珍藏的書傾巢拿出擺路攤出售。其中有很多非常珍貴，更有許多是日本當局思想控制下的限制書或禁書。我只知道很多書珍貴而要買真是千載

難逢的機會，所以在窮學生極為有限財力許可的範圍下也買了一些。這些後來因白色恐怖事件家人為怕麻煩都丟掉，實太可惜。

學校除了日本籍的舊老師外，台灣籍的與中國籍的人越來越多。周憲文當我們的院長，他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潘志嘉，經濟學者，極為開明。在學校無所顧忌的對諸事發表議論，日本在戰爭期間所加的禁忌得到解禁，深感自由之可貴，深覺這才是人應有的社會制度。但我何曾料到當局不出幾時竟把言論壓制的比日治時代更厲害，乃至演變成屠殺幾千人、監禁上萬人的白色恐怖大鎮壓。

## 二二八事件

我對祖國心結大，首先對於二二八事件沒有多少共鳴。但看政府在二二八事件中越做越離譜，到處亂殺人，行政長官官署屋頂上所按機關槍掃射殺了多人，十五份的橋頭與其他幾個地方棄有幾個屍體。政府派代表出席在中山堂召開的處理委員會，只是緩兵計，暗中大陸正派軍隊來鎮壓，他們一登陸基隆，沿途看人就掃射，國民黨政府對於自己的人民像對付敵人，大肆屠殺。這就是祖國原貌！我所受震撼很大。國民政府對於自己的人民所用的盡是騙局，真正為人民謀幸福而被推舉出席處理委員會的一個個都被抓去槍斃。我看到此情形對國民黨徹底失望。從心底想除非徹底的改革，台灣人民無法安居樂業過有尊嚴的生活。

戰爭結束我心底憧憬著自由、民主，能使國家富強的政府。為免於被外國統治，國家富強是最重要，而中國應有充分的條件。人民除努力使國家富強，內部應有民主與自由。然而看國民黨政府一點也沒有使國家富強的條件，對內則施行暴政，人民沒有自由民主可言。

二二八事件中我首先對處理委員會抱著很大的期待，想現在事件既發生，政府也不得不

施行某種程度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吧。我與同鄉，就讀醫學院的許某，於三月二、三日到中山堂看究竟。我當時還對政治了解不多，就只關心的看幾個委員們熱烈的討論，心想以後就有希望吧。當場看到最活躍的是一名為許德輝者，我暗中佩服他的周旋能力與堂皇的主張。殊不知他是國民黨相當有地位的情治人員，只是做臥底替政府矇騙人民，等待蔣介石正在派遣的鎮壓部隊到達。台灣人民的處境與下場多悲哀。

我去過中山堂四五天後的三月八日吧，鎮壓部隊由基隆登陸，到台北的沿途用機槍掃射街上的人民。當然到了台北後佔領了中山堂，開始捕殺處理委員。我慶幸我三月三日後就沒有再到中山堂，不然後果真不堪設想。

鎮壓部隊大肆搜捕人民屠殺，荒唐的是把當時因軍警癱瘓不得動員維持治安的中學生集體地屠殺震驚了社會。於是我感覺要期待國民黨放棄暴政實是緣木求魚，唯有強求更換他們。我由衷認同二二八事件，惋惜沒有成功，只能期待不久將來，來一個人為的，有計劃的，使其成功。

## 二二八事件前後的學校

二二八事件過後，學校回校的人數越來越多，一時不知跑到哪裡去的人重新又結集在一起，學校訓導主任很關心所頒布的自新辦法，且指定幾個人需要辦理自新。這些人中間除了有後來逃到大陸的陳炳基外還有哪幾個人我已不記得。但我只記得，新店線（註一）朋友、台北二中一期後輩，當時還就讀於成功中學高中部的高俊彥，要到校辦理自新時卻受成功中

學何啟華校長阻止，要他暫時不要露面，等到另外通知他始可露面辦理。何校長知道高受當局特別注意，怕他一露面，即使要辦理自新也有被抓走、甚至遭屠殺的危險。高至近每回憶當時往事，對何校長感激不盡。

二二八事件以前，老實說我對台灣的政治與國共內戰本來不感興趣。但既然發生了這麼大事件就引起我的極大關心。我本來沒有預期會發生像這麼嚴重，一發不可收拾地重大事件，雖然沒有預先計劃卻做得轟轟烈烈地幾乎要把政府推翻成功，然而卻被國民黨以欺詐等卑鄙手段壓平，實太可惜。

究其原因，二二八事件是突發事件，不是經過預先策畫發動的。台灣中部有謝雪紅領導的武裝隊伍稱為二七部隊和國民黨軍做了有效對抗，那也是臨時湊成的，因此蔣介石軍隊一登陸就招架不住，退到埔里的山地而最後解散掉。以後才知道，當時事實上以蔡孝乾為首的中共地下組織早已滲透到台灣，但仍成不了氣候，對於突發的事件措手不及，發生不了作用，且和謝雪紅之間的聯絡也不好。

從此以後我對國共內戰感覺興趣，且對共產主義也起了好奇心，但那時對中共還沒有認識。我想台灣既然光復回到祖國，國家實行的說是三民主義，不把三民主義搞通不可。當時市面上有岩波新書周佛海所著的《三民主義》與改造文庫發行的孫文原著日文翻譯的《三民主義》，兩本都用日文寫，因此看起來方便。我詫異孫中山一再地說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我懷疑三民主義居然是大家不歡迎的共產主義。孫中山的理論與周佛海的三民主義詮釋引起我的震撼。於是我對三民主義產

>>> 註一：以前新店萬華間舖有私營火車稱為新店線。我二中一期前輩的林子文的堂伯父景美士紳林永生是大股東，戰爭末期被政府收購為國有。沿線廣大面積的學生與上班族大都靠此線火車上下學或上下班。我們把他們稱為新店線。該線大約於一九六三年被拆除。



生了興趣外對共產主義也產生了興趣，而且慢慢地去了解。

當時學校留有日籍教授，教經濟地理的教授松尾竟然說中國若不實行共產主義沒有辦法強盛，為此中國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首先就實行共產主義，一條是先實行徹底的資本主義以引誘各國的投資，待投資得差不多，然後忽然地實行共產主義而把外國的投資都收歸為國有，如此就不費吹灰之力就成功地搞好經濟。結論是中國無論如何都要實行共產主義一路。戰後一直沒有遣回留用的日本人教授，到二二八事件後，除了再留一兩個外都被遣回，包括松尾教授。

中國大陸籍的教授，在國共對抗方面好像都比較傾向中共。教國文的潘教授（志奇）所選的教材一律都是有關於國共內戰的。他意思是說共產黨日正中天，中國將來非中共莫屬。院長周憲文是有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他似也親中共。

我和林從周、張某（仁明）、陳某（獻琛）等因為都是台北第二中畢業的，互相走的很密切。林從周沈默寡言，卻成為反國民黨的先鋒，後來被補被判十五年徒刑，我受了連累也被判十二年徒刑。張某、陳某等也絕對地不同情國民黨。陳某後來聽說也牽涉到案件，卻獲自新沒有被補。張某則置身事外。

鄭文峰和我之間非常親近。他住在東門仁愛路巷子的一棟日式房子。我住在台灣大學旁和平東路二段，每天早上學都要順著新生南路中間有大水溝兩邊有馬路的掘川向東走，走到仁愛路交叉處，轉彎向北走仁愛路，走到杭州南路交接，再轉北走到學校。文峰家就在途中，由大馬路稍一彎則到。因那裡離學校很近，自然的成為大家最好的集合所。學校同學很多來自中南部，曾群芳、陳廷裕、楊進火、鄭錦州等幾乎都住在附近。

文峰是嘉義朴子人，父親當醫生，已逝。母親帶著他與他妹與一個弟弟來住在台北。他家屬於大地主，有三十甲左右的田地。我從來沒有聽到一個人有那麼多土地。他母親受過高等教育而是社會主義者。由於他從小就受她的薰陶，他滿腦子都是社會主義。一去他家，有很多像蘇聯革命、馬克思《資本論》等左翼作家的書籍，且有很多其他學校的學人常集合到那裡。後來推想其中有很多是他的同鄉人。文峰後來被捕處死刑。常到他家的後來被處死與判徒刑的頗多。曾某（群芳）、陳某（廷裕）也受牽連，但獲自新。

各學校的左翼思想漸漸地滋長，戰後不久，早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初，各學校共同組織學生聯盟；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有以基隆中學學生為主參加的紀念五四運動的遊行；一九四六年有澀谷事件發生，學生便做了抗議遊行；一九四七年一月有針對北京女學生沈崇被美國兵強姦的遊行抗議；雖當時反美與反國民黨的意識還不強烈，各校反應還不能說熱烈。當時我所讀的法商學院常可看到非常活躍的陳炳基，他台北第二中早我一期，是有名的反日、主張回復祖國的份子。一九四六年陳儀大招法商學院專修科學生時入學的，他因是畢業於成功中學前身的台北二中，故對成功中學等學校的影響力相當大，對學生運動出力極大，實是理想的學生運動領袖，接著當年發生二二八事件。由於受周圍的影響與二二八事件的刺激，我也慢慢地同情社會主義思想。

左傾的文化工作人員也藉歌唱、話劇等大力宣揚社會主義與反美反國民黨思想。二二八後為灌輸一般民眾對於祖國的了解，二二八事件當年後半年在台北市有台大學生為主舉辦的歌唱會，更以其做為基礎與包括部份師範學院的學生，成立了麥浪歌詠隊做全島性的巡迴演唱，也加進舞蹈與歌劇等。當時主導之一為後

來被槍斃的台灣電力公司總經理劉晉鈺的兒子，他後來逃到大陸倖免於難。一方面簡國賢等為中心組成話劇團，演《壁》等鼓吹社會主義與反國民黨的戲，對台灣社會震撼很大。鄭文峰當時很熱心且對這些活動盡了很大的力。

二二八事件曇花一現，幾乎要成功的，我覺莫大惋惜，我向林從周表示惋惜之意。但每一次和他談話，我發現他對種種內幕知道很多。他很肯定地說，有些人正在籌劃第二次二二八事件。我期待著，但總沒有發生。畢竟國民黨因有前車之鑑，且其後從大陸調有大軍駐防，有萬全的準備。林從周也許已和地下組織有關係所以才知道那麼多內情。我很希望類似二二八事件因為預先有策劃，不會再失敗。我期待著過一年就發生，但一年後並沒有發生，其後也沒有發生的跡象。

在此之前，省長官公署募集了一些去中國大陸的公費留學生，很多人響應，其中有台北第二中同班的陳繼樹。因中國內戰激烈，他沒有讀完就回來。回來後的他竟有脫胎換骨之感，他本來生活環境好，戰爭時代食物極為缺乏，有鴨肉可吃，他尚且不吃鴨肉，使我大吃一驚；現在卻滿口的社會主義與親中共語言。和他一起去大陸的都和他如出一轍。陳繼樹也無形中成為我越加傾向於反國民黨的一個因素。那一批中國大陸公費留學生很大部分都變為左傾，回來後不遺餘力地宣傳國民黨的腐敗。其中有幾個後來牽涉到白色恐怖案件，如鄭溪北等。有的滯留在大陸或因內戰而不能回來，也就在中共的機構做事。張克輝便是其中之一。

## 學校畢業後

二二八事件過一年即一九四八年二月，我學校畢業。訓導主任蔡章麟四面八方地奔走，驚人地把要畢業的幾乎每一個人都給找到工

作。台灣銀行要學校把二十名成績名列前茅的名單送去讓其甄選而採用了十名。我所幸在其中。故我一畢業就被以辦事員資格錄用，成為立即有很好收入的一個。時離台灣光復才兩年半多。國民黨治理無方，台灣產業不能興盛，人民大多民不聊生，加之物價惡性膨脹，能有工作實屬萬幸，我迫不及待地開始上班。

我們同班畢業名次第一的曾文謙與第二的蘇義徵進了貿易審議委員會。該會不久取消，曾文謙轉進台灣銀行，卻比我們被重用得多，後來當過分行的經理乃至第一銀行總經理等高等職務。蘇則自己做生意。進入華南銀行的有王紹慶、張進興、許勝發、楊進火等；進入彰化銀行的有杜組誠、楊昭訓、賴文泉等；進入第一銀行的有陳嘉禾、吳進興、陳鳳儀等。台灣糖業公司有余文柄、陳廷裕、蘇義明等。進審計部有曾富、曾文勳、林登榮等。

和我一起進入台灣銀行的有林從周、陳獻琛、張仁明、劉新韜、許榮昌、蘇震、楊萬福等連我共八個。我和陳獻琛、楊萬福被派在營業部出納科，林從周在營業部放款科，劉新韜在營業部會計科，張仁明、許榮昌、蘇震則在金融研究室。

我們都以月薪一百三十元的辦事員任命。這在當時台灣人來說還算是優厚的待遇。我們是正式由大專學校畢業的，在當時算是相當高的教育。銀行有很多台灣籍職員，大都是日治時代留下來的，除了台灣銀行本身留下的外，有一些是三和銀行留下的。大部分只受過職業學校的教育，除了因年資關係而有很少部份升為辦事員外，大部分是助理員任用。女職員從高等女學校畢業而以助理員任用的不很多，很多只小學畢業，當過服務生後升為雇員。

我在那裡遇到幾個早在那裡工作的熟人，一為林昭仁，自從我自木柵公學校畢業後到老松讀高等科一年級以來一直一起坐新店線火車

通學的舊識。我在老松時他讀日新小學，後來讀商工專修。我不知他畢業進了銀行。他在營業部會計科。一位是木柵我從小就住在我對面的張賢子，她在秘書室。一位是住在公館的我父親朋友陳清波的女兒陳月。她有弟弟陳德星是我第二中學後輩。她在營業部匯兌科。有一位我在老松高等科同學過的吳榮諸在營業部放款科。我木柵公學同學的張拔進在南門分部做職員。還有木柵來的多位朋友鄭金財、張金榮等在那裡當工友。我第二中前輩莊顯仁在營業部的存款科。

銀行的高級職員都是大陸來的，幾乎是浙江寧波人的天下。台灣銀行是屬於台灣省的，故台灣省財政廳長嚴家淦自然的成為董事長。總經理為瞿荊州。營業部經理清一色都是浙江寧波或其附近的人，有的當上副理坐在大椅子，他的工作只是核對傳票、把印章蓋在傳票上，有的甚至於看不懂傳票，也不知道要蓋在傳票的哪裡而常鬧出笑話。即使是普通職員，外省籍的受到器重。也許除了省籍不同，待遇不同外，他們有的可能也兼做政府的情治人員。

我們是二月畢業的。那一年夏天有一批台大本科畢業的進來台灣銀行。黃耀堂、許文發、許敏惠、楊忠烈等。他們因是本科畢業的，以一百四十元辦事員任用。他們之中，除了許敏惠因是許丙的兒子背景特殊，升的很快而外，其餘的和我們一起進去的一樣平平。

過一年有一批台大法學院專修科算是低我們一期的進來，馮光威、曾錦堂、許詩禮、徐漢城等。這一批不像我們與那些本科畢業的，畢業以前都在學校因而不大世故，他們很多先出了社會再應徵陳儀大批招生的專修科，故比我們世故多，在銀行混得比較好。

也有一批商業職業學校畢業的進來，巫鳳毛、潘昭章、王耀欽等。其中巫和我曾以政治

犯被逮捕。他們一群另有兩個比較傑出的，潘昭章，在銀行工作期間，下班後仍到大學夜間部進修，當過美國花旗銀行的高級幹部與台灣大貿易商高林公司的重要幹部。王耀欽則回到其故鄉高雄當華僑銀行南部的最高幹部之一。

台灣銀行同時也從大陸招募一批大學畢業的。因是外省籍的，受到很大的禮遇。就像日治時代的台灣，統治民族的日人比殖民地的台灣人，進昇機會與待遇優厚的多。

當時大陸的國共內戰打的如火如荼。台幣與法幣的掛牌匯率，法幣貶的非常厲害，每天大幅度的貶，且一天之中好幾次的貶，貨幣幾乎成了廢紙，法幣垮了，接著台幣來一個大貶值，因貶得太厲害，對美金更是貶得不可開交。民國三十八年間舊台幣四萬元換一元新台幣。與美金的匯率固定為一美元換五元新台幣。

大陸還沒被解放前，台灣的種種日用品主要都由大陸，特別是上海，進來，每天都有生意人來銀行匯款。我當時在出納科，客人拿來的鈔票一天比一天多。反看我們的薪水天天失去價值，購買力微不足道。每月五日領的薪水只夠幾天之用，一般人民的生活之苦可想而知。好在我們是發行鈔票的台灣銀行，重要幹部一樣領薪水，為自己什麼有利的辦法都想得出來，幾天就來一次借支，鈔票先借用，但不怕無法還，到下一次發薪水要扣回時，物價早已跳好幾倍，早就再調薪好而薪水數目變的更大，扣除以前所借的，變為不痛不癢。薪水不夠用再借支，如此無止境地等於在先發薪水。

無怪乎大家都說銀行工作是金飯碗。如果省籍的歧視不說，又如果一個人沒有抱負甘於滿足現狀，銀行實是最理想的工作所在。何況台灣工業基礎本來就薄弱，加以正是內戰中顧不得建設，就業機會低到谷底，銀行的工作是人人羨慕的焦點。

陳獻琛和我同在營業部出納科，林從周則在營業部放款科，我和他們因工作場所近相處機會多。鄭文峰因家離的遠，也就除了有什麼事互相相約外疏遠了許多。鄭文峰選擇不就職而編到大學本部去讀。我們是以大學附屬專修科資格畢業的。我們被准許上本科三年級。同班畢業的有幾個去上，除了鄭外，余文柄、陳鳳儀、鄭如蘭、廖運番、張金谷等。余文柄等幾個都有工作，除了要上班外還要同時上日間的大學，真是辛苦。余文柄就職於台灣糖業公司，但他苦幹到底，結果還是畢業。

中共的地下組織曾幾何時也進來台灣。其實據後來知道的資料，早在一九四六年二二八事件發生以前就派有蔡孝乾等來負責發展組織。二二八事件時候組織羽毛未豐，還不成氣候，對於二二八事件沒有發生多少作用。隨著內戰打得不可開交，地下組織也滲透到各角落，特別是學生界，戰後多次的反政府與反美的遊行，歌唱隊、話劇隊等鼓吹社會主義與反政府的文化工作等，且二二八事件的主角很多都以學生為中心，因此引起政府很大注意，而始終伺機要加以彈壓。

政府知道事態的嚴重，失去學生的支持等於失去一般大眾的支持，學生會起帶頭作用而推波助瀾，最後非把政府搞垮不可。於是先發制人的對付師範學院為主的四六事件發生。那一天一清早用軍隊闖進師範學院校內把平常受注意的一些人一網打盡，成為以後五〇年代大逮捕的先聲。

除了中共的地下組織，台灣獨立運動雖勢力微不足道但也在悄悄進行。我遇到了新店線二中前輩後就讀於師範學院的劉新吾先生，從他嘴裡初次聽到台灣地位未定論，而台灣應獨立。我暗地裡很驚訝，不是〈開羅宣言〉已決定了台灣地位了麼。但想只要能替換國民黨的暴政，那也好。

中共地下組織的聲勢越來越大，發行有《光明報》，除分給所認識持有相同想法的、或想以影響或爭取的人外，主要靠郵寄寄到各目標去。街頭巷尾的言論偏袒中共。國民黨非常著急，總想要如何加以打擊。五月一日舉行戶口總檢查，加強日本遺留下來的戶籍資料為基礎，控制戶口。覺得還是不妥的國民黨五月十日施行人類史上最長期的戒嚴令，想以鐵腕鎮壓與殘殺異議份子。該戒嚴令竟延續到一九八七年共三十九年！造成人類史上沒有前例，以後也絕不會有後例的人類史上蹂躪人權的大罪行。

### 與地下組織發生關係

我因和林從周與陳獻琛在同一個地方上班的關係來往比較密切，加之時局越加緊張，彼此談論的機會變得更多。我看林的消息太靈通，私下懷疑他必定和地下組織有關係。我不正面的問他而隱約地刺探他，但他一點也不透露。我不僅是和他們之間，和其他朋友之間也常談起時局。二二八事件時一起到中山堂看處理委員會討論的台大醫學院學生許某也常問我是否有地下組織的線索，我總給否定的答覆。那時若把他介紹給林，後來組織被破，我與許的命運就全然不一樣。我因介紹他必定需負很嚴重刑責，許就不會有輝煌的將來。按，許後來當醫師，還當到某大醫院的副院長。

林終於說他參加了地下組織。我想既然我懷疑他有此關係，為何都不透露給我，而我一定是最會替他守密的。我推想他從我很坦白的談話中懷疑我的自由主義思想太重，對中共的立場不會太堅定，且我對台獨不排斥，我想只要針對國民黨，大家殊途同歸，都是朋友。

我和林的談話談的太深入已無法回首，我就答應和他維持個人間的密切關係甚至加入他的組織。他要我提出自傳，介紹了我認識一位

在華南銀行任職的名為高懷國的人在第三水門外見面。我在他監誓下宣示加入他們的組織。於是我和林成為又是好朋友又是同志的關係。林平常沈默寡言，對於我所問的都不做充分地回答，特別是關於組織問題。他說組織只能有直的聯繫不能有橫的關係。他不告訴我他上面是誰，但我想像那位姓高的可能就是。他既不大講組織的事，我也就不問。然而我對於我在明處，他與其他不知誰的許多人在暗處的組織關係，產生某種程度的不信任感。我一方面和他接觸，一方面卻提防著不要太深入以免遭池魚之殃。他要我多介紹人與他認識，他說上面催他很厲害，急著要擴大組織。但我想我在明處，別人在暗處的不明瞭情況下不敢涉入太深，也就不敢貿然介紹人給他。甚至於對常問我有沒有組織線索的許某都不敢透露任何信息。不然，日後組織被破壞，我被認為吸收他人參加，我的處境定非常危險。至一九四九年間王明德出事、《光明報》被破壞，我更加小心不敢和林太深入。我的小心無形中救了我。不然，我以後就逃不了整個組織，被出賣而遭更大的殃。我們整體地給「上面」出賣，信誓旦旦說無論如何也不會出賣我的林，最後還是不能不說出我。

當時大家生活都困苦。我把所領取的薪水都全數給母親當家用，自己幾乎不留任何零用錢。當時所住日本房子面積不很大，當一起住的二哥結了婚，更覺得地方太小，也就搬進台灣銀行坐落於重慶南路的第二單身宿舍。我們不用付房租，水電燃料與雇用的廚師都不必負擔。那裡離銀行只有一二十分的路程。陳獻琛，林昭仁、巫鳳毛、潘昭章、王耀欽、黃耀堂、蔡木榮、楊忠烈、陳瑞欽等都住在同一宿舍。

陳獻琛平常的言論比我激烈，他和正在逃避國民黨逮捕的陳炳基是堂兄弟。我被補，但他沒有任何跡象，我以為他顯然沒有參加組

織。我本來懷疑他為何沒有參加組織，但我不敢問林。當時陳的父親逝世，他要擔負整個家庭的生活費用。幾十年後威權時代過去，我才聽說他曾經也參加過組織，但因他要負起生活責任，組織方面就讓他脫離關係。這個事實後來曝光，他雖沒有被抓去坐牢而獲自新，但其後一直成為情治機關管制的對象。按照國民黨的哲學，一個人曾經和組織有關係，若沒有向政府自首，後來雖斷絕了關係，仍被認為他繼續在組織裡。

我後來被捕關了十二年。刑期到，回來幾十年後，戒嚴解除，言論比較可自由，有機會和其他同學回想我們同學牽涉到這一次案件的，這些人除了林從周和我外，大都沒有組織關係，且我也不知他們是否另和組織有關係。這些人前後有：張義明、陳席珍、王明德、鄭文峰、林從周、曾群芳、陳廷裕、陳獻琛、與南部還有一位李清亮者。張義明當時在新莊當國中校長，不知受何牽連被逮捕坐短期的牢，但後來沒有事；陳席珍也不知何故被短期關在保密局；王明德惹起《光明報》事件，被判感訓而送到內湖執行；鄭文峰被逮捕後被槍殺；林從周被逮捕判了十五年、期滿回來幾年後病死，我受林從周連累被逮捕判十二年；曾群芳、陳廷裕、陳獻琛等三人身分暴露自首，免牢獄之災。但曾群芳、陳廷裕兩個因被懷疑自首不清被關進軍法處幾個月後脫險。

## 入學行政專科

台灣由一九四九年開始，由於日本軍事顧問白將軍設計施行徵兵制度，一九二八生（民國十七年）的首當其衝。我剛好不能置身於外。我接到了身體檢查通知。我想反正台灣政權的生命屈指可數，對於體檢通知我置之不理。不久我接到了法院的妨礙兵役的開庭通知，我出席了法庭，那是一偵查庭，和我同樣



不理兵役體檢而被調問的有幾十人，可見大家的想法相差不遠。幾十名的開庭，大家亂成一堆。法官宣布大家不起訴處分，但要參加將再通知的體檢，而後大家散會。

我總想非想出辦法以避免兵役不可。湊巧，當局為解決忽然由大陸跑來的大批流亡學生學業的出路設立了行政專科在招生。該專科分甲種與乙種，甲種大學肄業一年以上為資格，要讀一年，乙種高中畢業就可，要讀二年。於是我應徵了甲種的行政科，參加了考試而被錄取。校舍暫借成功中學教室。於是我白天銀行上班，下午去赴五、六點開始的上課。我一方面有工作，當然無法正常的上課，偶而上課而平常則請同班的人給我護航。有時曠課太多，教務室要找我，貼的布告貼了很多天，我尚且不知道。我就如此混混逃過兵役。至一九五〇年十月我被補，我不知我的學籍變得怎樣。法官可能也不知道，從來就沒有提及此事。當時我同班有三個台灣籍的和我處得很好，他們什麼名字，現在在哪裡，我一概不知。聽說黃信介、許水德以及和我一樣被捕的張振騰是當時的同校同學。我被捕時要逮我的特務說是為了問兵役問題，可見我的兵役問題那時還是受到情治人員的注意。行政專科後來和台中農學院合併，改名為中興大學。因該校是為養成行政人員，畢業生後來在官界發展很多。

### 地下組織發生問題

一九四九年八月底有一天，林從周很緊張的告訴我王明德出事被抓走。王明德會參加組織而被抓走，我是最沒有料到的，在我印象中他態度不穩重、有執褲子弟的習氣，這種人怎麼會參加組織？王明德於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七日被捕。

林從周不大講話，但也講經過給我聽，聽

來真荒唐。事實是這樣：他暗戀著我同學住在基隆的姓賴（文泉）的妹妹。由於和賴是同學關係，他時常出入賴家而對他妹妹有愛意。他妹妹置之不理，於是他把大批的《光明報》放在她房裡要她看，如此可能是意圖一面要向她宣示他是非同小可的地下工作份子，一方面要教育她。但她就把這些《光明報》拿給她父母。他們竟拿這些向治安機關檢舉。國民黨正苦著找不到線索破獲《光明報》或中共地下組織，這成為絕頂的破案契機。王立即被抓，而導致設在基隆中學的《光明報》本部的破壞，因而導致整個台灣的地下組織被破壞。

後來組織被破壞，我始終以為王明德是唯一禍首。但聽多種情形後始知他是其中之一而已。聽說主要人物之一的李中志搬家時竟把藏在日式房子天花板上的文件等重要資料忘記搬走以致被檢舉被捕，實也荒唐。

王被捕後我關心的問林會不會有事，他說他不會被波及，但自那以後他顯得緊張，好像一直提防著。整個情勢真有風聲鶴唳之感。我一再地問他是否有關係。他說沒有關係，萬一有什麼不對，他可以逃匿於幾個山上的幾個地點。我不知他指的哪裡，但以後組織的陸續破壞，推想指的是鹿窟、阿里山或什麼地方。

我不知鄭文峰是否受到波及。我與他沒有組織關係，雖然我懷疑以他的反國民黨的熱誠，總脫不了關係。他經我介紹，認識了山地分教所的黃校長，忽然跑到那裡當教員，是否因擔心受此波及不得而知。於是我們常在一起的幾個同學有了新的旅遊場所，他們幾個結伴去，也愛上了那純樸的地方。解嚴後才聽說，鄭當時有把那裡做逃亡基地的想法，但不知何故沒有做成。我後來被捕，但都沒有被問到與鄭的關係。他都沒有供出我，雖然我想他一定知道我與林的關係。

台北夜間常有不停的飛機聲，一聽便知又



是由大陸某個地方撤退。我從英文報看到大陸撤退當時的情形。國民黨一由什麼地方撤退，沒有例外地就把所關的政治犯槍斃，增加恐怖氣氛。我也從報端看到蔣介石為革新軍隊以保衛其台灣的政權，透過戰爭一結束時他所營救的岡村寧次，大力地雇用白將軍為首的過去日本的軍官，在台灣革新軍隊的制度與軍官的教育與訓練。

台灣情勢緊張，中共隨時有渡海來解放台灣之勢。林從周一方面也著急，想拼命的擴大其組織而常對我加壓力。但我始終無動於衷，我越加對他的組織沒有信心，組織已有問題，且其中原因是王明德的荒唐事所引起，如此不堪一擊，我怎敢相信？但我也不便批評。我想我已騎虎難下，怎麼可擴大組織連累別人？我只是與他虛於委蛇。

我聽到了很多風聲，住在師大旁邊大水池邊的台大講師李薰山被帶走，煤炭調整委員會主任劉明被抓，甚至其祕書木柵人張釜鈿也被請去，住在新店和我一樣讀老松公學校、後來讀開南商業、畢業後任職於郵電管理所的王文清也被抓走，延平學院院長朱昭陽與第二中第一期生的其弟朱華陽也出問題。我也聽到文山中學出了事情，聽說有一些學生在操場打球，球滾進操場旁邊日式房屋的床底下，找球時赫然發現那裡藏有槍枝等武器，於是一些人遭逮捕。新莊國中也出了事，而當校長的張義明也被抓。當然我很關心這些人的其後。我晚飯後常走到師大旁邊李薰山住家看看。我看到他那熟悉的名牌依然很寂寞的掛在門前，但我不敢進去問他太太關於李的情況。李任職於台大，和當時也當教職的我二哥英茂是台大同事，也是好朋友。他所住那棟房子本來屬我大哥英儒所有。他在戰爭後從日本人原主承接，住了大約二年後要搬回木柵時，我二哥把它無條件

的送給李住。李後來告訴我，他被捕後幸虧有那一棟房子，他太太把它變賣幫助他家家計很大。劉明後來被判「資匪」，人被關，龐大家產被沒收；張釜鈿雖被請進保密局，後來沒事，沒有經過軍法處就由保密局直接釋放；王文清牽連於郵電案，被處十五年徒刑；朱昭陽後來沒事，但其弟朱華陽被處七年；張義明沒事。

### 組織被破獲，大逮捕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四日早晨，到銀行上班，看營業部有些反常，三三五五地站立著不知談論什麼。一聽，原來前一天晚上林從周被抓走，且是雙手被反銬著。我立即有不祥的預感可能會被波及，我緊張地不敢逗留在銀行。那一晚起幾晚我不敢回去我所住的銀行第二單身宿舍，而跑到木柵、樟腳、或景美不定住所在地睡覺。

當天的報紙詳細地刊登昨天晚上舉行大逮捕，說中共派到台灣工作的首腦蔡孝乾被政府抓到，坦白地交出一切組織關係，因此幾乎所有的政要幹部與各地的地方委員會都被破壞殆盡，昨天的大逮捕是全省性的，且是最大的一次。其實已延續了有一些時候，且還在繼續中。蔡替政府呼籲，政府頒有自新辦法，自首的既往不究，給自新，但必須要把案情無所保留的供出。我知道事態非常嚴重，這正是我所擔心的。我本能地覺得不能自首，因為如此做會害到被捕的林。一方面我相信，中共攻台箭在弦上，拖些時候事情就會自然解決吧。

我暫時向銀行請假。因都看不出有抓我的動靜，我想我牽涉的不深，甚至於有沒有正式的牽涉都有疑問，且林一向堅決地表示，即使他出問題也不會把我講出來。我首先半躲半公開地，後來因見不到任何動靜，就索性每天照樣上班。

有一天，曾群芳為找我到銀行來，他很驚訝我還上班，告訴我太危險而勸我要躲藏。他要我帶他到鄉下躲，他一起帶了一位我不認識的人，說是其同鄉在跑路。我始知曾有組織關係。於是我立即離開銀行，帶他們到木柵陳家和家裡讓他避難。曾沒有告訴我，他朋友的名字。我只知道他畢業於師院，在其家鄉竹南當教員。他原來被捕到警察局後，設法成功地逃出。我甚至連他的名字都沒有問，以免成為日後的心理負擔。因為，我藏匿他的事，日後萬一暴露而被調查機關追問，我想我若不知道他的名字，即使遭受多厲害的拷問也無法從腦裡無中生有講出他的名字。他就跟著我躲藏，我無形中救了他的命。他當時若沒有由警察局逃出，且逃難失敗被抓回必定會被槍斃無疑。我不知他以後的狀況。我坐牢完也不敢問他的其後。解嚴很久後始知他姓顏，但仍不知他的名字，再過多年，才知名為松樹。原來他躲藏一段時間出來自首保住了生命。但至今我沒再看過他。

我半躲半公開的動作引起了幾個同事的懷疑。有一天營業部副理鄭萬生對我說，我若有什麼心結應向政府辦理自首以維安全。我覺得那是不可思議的事，要辦自首是要把所知經過的都全盤抖出來，不然若被認為不坦白或有保留，自首會無效，反而等於自找麻煩地告訴他們祕密，成為他們處刑的藉口。蓋自首辦法有規定，自首不坦白自首就不成立。要自首不可避免地要講出人的關係。我非把和林從周的詳情講出不可，我不知林講我到什麼程度，故我不能講得太超過以致加重他的刑責。現在我的情形多出曾群芳與他的朋友而增加了複雜性。我聽到這個或那個的，很多人自首，其中有一台北二中前輩當醫生的翁某（庭俊）。

我晚上不敢回銀行的宿舍或和平東路的家

睡覺，而跑回去木柵，有時就在老家隔壁睡，更多時到樟腳陳家和家裡睡覺。白天則在附近的河流游泳抓魚打發日子，但一面非常注意社會的動靜。因都看不出抓我的跡象，我想我牽涉得不深，甚至於有沒有正式牽涉都有疑問，且林不一定供出我。他不是一向堅決地說即使出問題也不會把我講出來的麼？我先半躲半公開地，後來就索性每天照樣上班。

## 陳家和的庇護

樟腳陳家和家便成為我與顏的短期間的避難所。我避難的大部分時間都在那裡，有時候到木柵。但到木柵也不敢在家裡睡覺而常在隔壁謝德修家或高銘輝家睡。在謝德修家或高銘輝家睡覺一向是我們幾個朋友的習慣，故他們都不會覺得有疑。我有時就到景美火車站旁的大姊家。如此做不定點的住宿。

顏兄大部分住於陳家，偶而暫時離開，推想是回竹南。他把環境摸得很熟，自己坐新店線火車到景美站，然後沿著景美溪經過寶橋走路到陳家。我不知他繼續到什麼時候。因我不久被捕，我就不知，也不敢過問他的情形。我猜他可能在我被捕後沒有多久就向政府自首結束其逃亡生活。

我真感謝陳家和一直對我的庇護，更難能可貴的是，他不討厭也不害怕他庇護素不相識的顏。陳父陳泉先生或許對顏起有疑心，但始終沒有表示任何難色。我與顏都非常感謝陳家和的庇護。

儘管我被捕後擔心陳家和庇護我與顏會出事情。我擔心當顏被捕或自首時會不會牽出陳家和，因顏案總會做一結局，不是被捕就是自首。若牽出陳，將很對不起他，不僅怕牽出包庇事，更怕或許陳被懷疑和組織有牽連，在國民黨調查機關的問案是很可怕的。那將成為我的更多更致命的罪責，我的處境將極為危險。

但大家終於相安無事，我擔心的悲劇沒有實現，顏後來自首，不久曾也自首，都不曾觸及陳家和，也沒有牽連到我。

### 曾問我我下面有一個人是否是陳家和？

曾某看我與陳那麼要好，陳那麼死心蹋地地庇護我，問我他是否是在我組織下面的人？我毫不考慮地立即堅決地回答說不是，他與組織沒有關係。本來曾某可能由林聽到我下面有一個人，而猜測那就是陳。我固然對陳提及組織事而他知道我是其中之一員，我徵求他加入，而事實上他也同意，但我看王明德事件發生我就一直拖延不介紹他與林見面，也不叫他拿出自傳。他既然沒有拿出自傳也沒有宣過誓，當然我不認為他已是組織的人。事實上我看到組織搖搖欲墜，雖然林給我很大壓力要我

吸收黨羽，我無法推卻，就說我已成功地吸收一個，至於那人的自傳我會補送，但其後我一直不採取進一步行動。事實上我若有心要吸收人，我很可能運作許某成功，因他曾經問我是否有地下組織的門路。我沒有給肯定的答覆，因那時我對組織已沒有信心，不敢冒險擴充以致不能自拔。

曾某聽我否定也就相信我不再追問。我讓陳某成一個模糊狀態，以後萬一有事那一個也不牽連哪一個，反正是或不是又怎樣。後來我被捕，他們兩個自新，從頭到尾沒有人牽出陳某，不然對我、曾某與顏某都會帶來極為不利的結果。我後來被捕坐牢看到其他很多人類似情形。他們真亂地不可開交，只要有一點情節，那情節且是比陳某小得很多，卻互相牽連造成很嚴重的局面。 >> 待續

## 稿約

歡迎踴躍投稿

《批判與再造》旨在提供一個用左翼觀點曠觀寰宇、立足本地的公共論壇。我們歡迎引介世界思潮、評析國際與中國兩岸政治經濟形勢及社會文化現象、回顧反思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歷史的文章，與反映社會現實的文學創作。同時也期望不同觀點之間開誠布公的論辯，以有助於釐清觀念、深化認識，促成左翼力量的團結進步。因此，我們衷誠盼望各方朋友來稿，充實《批判與再造》的內容，推動台灣左翼以至世界左翼聲勢的再興，抑止人類處境的進一步惡化。

我們的徵稿原則如下：

一·文字請力求簡潔扼要，一般以5,000字

以內為宜。

二·理論文章以10,000字為度，特殊狀況不在此限。

三·論辯文章務必觀點明確、邏輯嚴謹，秉持實事求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原則，切忌曲解論辯對手原意，或迴避論題，言不及義。

四·我們充分尊重所有來稿的觀點，但有時視編務需要，須在不損及作者本意下，酌情刪改。如不願刪改者，請註明。

五·本刊因經費所限，無法提供稿酬，敬請見諒。

六·來稿請於每月十五日前寄達。

# 城外城裡

■葉芸芸

城外的想進來，城裡的想出去。錢鍾書的「圍城」這般詮釋婚姻，人生大抵也是如此吧！我常覺得自己的生活，好似籠子裡不斷踩著輪滾動，在原地奔跑的小老鼠，時時會興起要過一種簡單靜謐的生活的渴望。

陳正統的客廳上掛的對聯是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顯然，這是他嚮往的人生境界。但現實生活中，乞求有一天安靜讀書的時間，卻是相當奢侈的願望。就以我們一行到漳州的那一天為例，除了安排漳州市的台胞接受我們採訪之外，他同時還得安排接待四個來看投資環境的台商團體。那一天，陪我們參觀採訪、天南地北的開講，談美學，到「南山寺」看佛像造型，論「河殤」和金觀濤的「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對他而言，相信也是難得的逍遙，而又不帶臭銅味兒的一天吧？

## 漩渦當中的憂心

陳正統是近兩、三年才改行，由學術研究轉涉入現今閩台經濟關係圈的。就漳州市引進台資貿易的範疇，他是漩渦當中的人物。台商到漳州投資不少要找他，一來，陳正統對台灣有了解，比較熟悉台灣商人的心態習氣，跟他們混得起來。二來，傳說陳正統在漳州是「通天」的，我問是怎麼回事？他說大概是指他拿起電話來，可以直撥給部內首長，比較快把問題反應到上邊，所以能較順利的解決，因而他協助台商在漳州投資設廠，頗有效率。他有一份令人羨慕的樂觀與罕見的率直，總是面對問

題，直來直往沒有推拖敷衍，他說：「不是故意挑剔，是希望把事情辦好」。

一九八八年底，漳州市已有台商投資工廠四十六家，分析漳州的投資環境，陳正統說是存在著硬環境和軟環境兩方面的問題。前者指地理環境，初以香港為中轉站的兩岸貿易，漳州雖有低生產成本的吸引力，但運輸成本偏高，難以和深圳競爭，尤其是原料加工的企業。不過，將來若開放由廈門——台灣直接通航，做為廈門腹地的漳州，競爭力自能增強。已有一些大資本企業，同時在深圳與漳州設廠，即是著眼於將來。軟環境是指有關辦事部門的素質，在大陸辦事是一道又一關，碰上幹部素質差的，事情確實難辦得很。但陳正統認為，總的情況並不若外面傳說的那麼糟，在他所知範圍，至少省市領導還是很好的，腐敗的幹部當然也有，但是台灣人也很容易急躁，很多情況是制度與辦事習慣互相不了解而引起的。

年來，到大陸投資的台商不絕於途，舉世震驚的六四事件，也沒有使他們緩下腳步。果真台灣人是全世界最優秀的商業民族！？無論如何，兩岸關係的情勢發展，領路的是經濟，橫衝直撞前去，政治在後跟來，包袱繁重步伐艱難，如今直接通航似已指日可待，但是在這漩渦中打轉了幾年的陳正統，卻不敢樂觀。最近他自東山島來信，提到台灣商人的暴發戶心態和過份自我陶醉於幻影中，令他對台灣前景十分憂心，信尾他還加了一句「我們都是台灣人，都希望台灣好。」這個工作崗位上，還有許多難為外人道的苦衷與無奈。

## 「台灣仔」又來了！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初，我們一行人從福州、泉州、石獅、廈門、漳州一路走過來，沿途聽到不少台灣客的新聞。到泉州的那一夜，就在街頭看到酒後鬧事的，路旁又聽說，早幾天另一個台灣客因買歡不成而演成傷害人命的刑事案。到了廈門又聽說有台灣客經營妓女戶販賣人口的事。

廈門和上海兩地人，素來就對台灣人沒有什麼好印象。因為日本侵華時代，曾帶來一批台灣流氓，在廈門是號稱「十八大哥」之流的人物，在當地開設賭場、當舖、鴉片煙館、妓女戶，充當殖民統治者的中間人，仗日本勢力營利，當地人稱「台灣呆狗」。日本戰敗之後，這一類「台灣人」識時務，跑得比誰都快，留下來的卻要替他們償付歷史債務。大陸解放以後，歷次政治運動當中，歷史因素是影響台胞命運的主要原因，因此，過去有很多台胞要刻意隱瞞自己的籍貫，尤其是閩南地區的。

一九七九年，對台政策由「解放台灣」變調成「和平統一」，閩南沿海地區跟著改革開放，搞起貿易經濟。該地區台胞才獲平反，恢復籍貫，並在工作、生活、子女教育各方面得到一些補償性質的特別照顧。近幾年來，到閩南投資、觀光、探親、尋根的台灣來客日多，這樣的趨勢發展很快，但也漸漸出現複雜而矛盾的反應。

文革之後，階級意識大降溫，一片「向錢看」風潮，代之而起，台灣所顯示的經濟實力，使得「台灣關係」對大陸的台胞而言，多少是帶有實惠的，他們不再是沾惹不得的黑五類，更是受羨慕的「一等公民」。但是，台灣來客財大氣粗，特別是來投資的老闆們，多半帶著帶在台灣通行無阻的——有錢能「買倒」一切的效率觀念。當地人從歷史經驗反應，難免會有「台灣仔，又來了？」的感覺，對於解

放四十年以來，無產階級工農當家作主的驕傲，這些台灣資本家的行徑，又是何等難以消受的衝激？因此，閩南地區的台胞，特別是在台灣事務的第一線工作的，心存戒惕，祈求歷史的惡夢不致重演，自然不是沒有緣由的。

## 眼科醫生的悲劇

陳正統的父親陳德仁，過去是漳州極有名望的眼科醫生，漳州人提起「陳眼科」都說是「台灣仔」。陳德仁是南投縣名間鄉人，其妻出身西螺的廖家，婚後他們住在西螺的時候比較多。一九四七年，陳德仁跟幾個姪甥輩參與了二二八事件，「回想起來，父親也不是什麼領導人物，只是憤慨國民黨，阿山仔在台灣那種胡作非為，而自發地去參與抗議活動而已。」

二二八事件後，陳正統跟著父親回到南投老家，在山上到處躲藏了近一年。一九四八年一月，父親才帶著全家（除了大姊留在老家）出走到漳州來，那一年，陳正統剛滿九歲。

開業執醫的頭幾年，「陳眼科」在漳州市稱得上風光一時的，知名度高，賺了錢，蓋了樓房，也引來當地人的「紅眼症」。陳正統說他父親「醫生人，膽小怕事」，很早就將醫院歸公搞合作化，自己只向政府領工資，儘管這麼小心翼翼，還是逃不過災難，自一九五八年之後，「陳眼科」就受到暗中的監視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幾次三番受禁閉檢查，因為外面傳言，「陳眼科」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家裡藏有電台發報機，「陳眼科」房子地面被挖了三尺深，樓房連地基全打掉了。結果發報機沒找到，只沒收了四十二兩黃金。

長期以來，精神上承受著這麼大的壓力，四十多歲時，陳眼科就患了高血壓，後來得腦瘤而影響視神經，一生醫治過多少人的眼睛的眼科醫生，晚年竟然自己也失明，不能不說是悲劇。陳老先生已經在一九七八年鬱鬱而終。

## 自學成「雜家」

童年的逃亡經驗，艱苦而充滿恐懼。少年求學時期也總籠罩在陰影下，姐姐珊珊考上大學的那一年，正趕上反右派，上海一所名牌大學的錄取通知已經發下了，因為家庭出身不好，竟被更改錄取學校，改分配到上海船舶專科學校。陳正統高中畢業的時候，父親已經成黑五類，他沒有機會進正規大學受教育，完全是依靠函授自學。「如今回想起來，有一點自我感覺很好的，就是我們做子女的，並沒有因為家庭的緣故而喪志。」

陳家姊弟都一副硬脾氣，不願依靠「台灣人」身份受照顧，要和大陸人同樣地公平競爭。而且「無論幹哪一行，不跑在人家前面，我絕不罷休。」陳正統自我剖析說，這種好強心理，大概是長年受壓抑的一種本能和反抗。無論環境多麼惡劣，姊弟倆總相信，只要努力終究有出人頭地的日子。陳珊珊曾被「人民日報」譽為女強人，現任福建省海洋漁業公司的副總經理兼冷凍廠廠長。

陳正統以優異的成績自高中畢業後，留校擔任語文教師，雖然沒有正規大學的文憑，三十歲出頭時，他在中學語文教學方面在漳州一帶已有相當的知名度。一九七六年，他被選派參加「漢語大辭典」的編寫工作，這是全國重點科研工作，規模比「辭海」要大五倍，現在已經出版到第四卷了。他還為「福建省人民出版社」編寫過「中學文言文辭典」和「中學語文辭典」，前者已出版三十萬冊。

一九八〇年，鑑於會讀古文的人愈來愈少，陳雲提出計畫要在二十年內，將全國所有的古籍標點完畢。陳正統被調到「地方誌」辦公室，負責漳州市文獻古籍的整理工作，他已經把漳州舊府誌一百多萬字，完成初步的斷句，接著要開始標點，也就在此時，他被調到對台灣事務工作（台盟漳州市委會）。朋友惋

惜他斷了專業，自己也頗有悔意，丟了多年心血的學術工作，現在這樣的工作，他自嘲是「混政治飯吃」，成天無事忙，卻忙得不可脫身了。話雖這麼說，他還是紮紮實實地，對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下了一番功夫，成了名符其實的「台灣通」。

談到學術工作，陳正統的話匣子，像連珠砲似的滔滔不絕，我馬上就能理解他對古典文學的專注與鍾情了。他說當初參加編寫「漢語大辭典」的工作，只是想通過這個工作充實自己，打好古文基礎，將來他希望能專心研究朱熹的周易，以及明末理學家黃道周的著作。

他認為，研究古典文學，若單單在鑽營古文訓詁是絕對沒有發展的前途，因為乾隆嘉慶年代的水平，現代人無論如何是不可能超越的，除非有新的觀點。因而他勤讀東西方文化哲學思想的書籍，文革之後，在大陸學術界流行過來的佛羅依德、沙特、韋伯等等，他都研究了。他又喜歡跟青年人在一起，「因為我怕老化，怕自己被時代所拋棄。」他說，青年人學問的根基或許並不深厚，但是思想觀點前進有創意，常跟他們一起議論可以刺激思考。

## 下放改造的「白專」

我忍不住打岔，問他文革當中的經歷，聽來聽去他都是那年頭最受批判的典型白專知識份子。他倒答得十分輕快——「沒挨過什麼大批鬥，就是下放到山區改造了兩年。」

據說漳州的台胞下放，一律是進山區，沒有到濱海地區的，大概是防止偷渡回台。陳正統去的是最偏遠的詔安縣秀篆鄉，離漳州有二百多公里路。那時他已經結婚了，家眷留在漳州。跟他一塊下放的是台中人吳振國，吳振國曾任漳州片仔黃藥廠廠長，這家著名的中藥廠，由他一手苦心經營起來，從藥舖的規模，發展到年營業額數千萬美金，但運動起來了，



廠長照樣得下放改造。

山區生活條件差，基本上是自給自足，什麼都得靠自己生產。到了公社的第二天，陳正統上山砍柴就拐傷了腳，隔天早上，全公社都知道有個下放幹部拐傷了腳。他很感懷農民，在山上磨練了兩年，很受農民照顧，也跟農民學了不少農事，他舉個例子說「烏龍茶」，這幾年常碰到台灣來的生意人，愛自誇品茶的功夫如此不了得，但只要他開口說幾句茶道，愛講大話的就沒再提品茶的功夫了。

山區兩年，他也練成了「雜家」，因為那段日子，偶而能抓到一本書讀就很不錯了，什麼中草藥、面相學、把脈全亂學一通，而且是無師自通。他原打算過了四十歲才收的，「如今要收也收不起來了」，他萬分感慨的說。

問起婚姻？「我這個人命運比較坎坷。相學上，我的眼睛和眉毛距離太靠近了，這種面相運道不順暢的。」他有過一次失敗的婚姻，那顯然不是愉快的經驗，但是他說得樂觀，「離婚也不一定是壞事。」現在的太太是廣東人，跟他有類似的經驗，彼此能互相體諒，他笑咪咪地說「他帶個女兒，我帶個兒子，湊合搞個合作社，也很不錯。」關鍵的是他們有共同的興趣，她也喜愛文學寫作。可惜陳正統雖然仍舊愛書，目前卻難能有讀書的時間。近幾年工作上常出差到外地，有機會跑各大阜的書店，他總要買一堆書回家。太太常感嘆「你什麼時候才有時間讀呢？買了又有何意義？」但是他說看到書不買，十分難捱，「手會癢癢地。」

## 知天命

海峽兩岸的老人們有共同點，代表也好幹部也是，都害怕退休。方進入之天命之年的陳正統，卻希望能早點退休，好回頭重拾學術工作。事實上，他目前的職位是多少人羨慕的好

事，若想做生意賺錢，以現有的兩岸關係足以大展鴻圖，他卻無意汲汲營營於權或利。他的話坦率無遮攔——「我目前的生活水平，雖然不是很好也還過得去，工作蠻愉快勝任，地位也還可以。」他認為，人對物質生活的慾望是永無止境的，無論怎樣追求都無法滿足，「我也並不完全不追求物質上的享受。」但是他有個不強求的信條，一切順乎自然，可遇不可求。

他的母親隨妹妹一家人多年前移居香港，並在一九八六年回到台灣探親，他也有足夠的條件赴港台探親，卻一直都沒有積極成行的意思。人們都說他傻，但好像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傻」字能解釋他的思維。

他自認受老莊思想影響太大，而對「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這樣的人生境界，有如下的註腳——「遠遠看去是美好的，也確有其合理之處。但也消磨了中國人的奮發精神，導致中國的落後，迄今還妨礙著改革開放。」妨礙中國改革開放的原因，好像也不是這麼就能解釋。

慾望的解放是十分容易的事情，我自以為是的推想，陳正統並不是一個狂熱的教條主義者，也不是什麼痛苦的道德家。或許，他所嘗試的，是要在物質與精神文明的兩極激盪中，探詢一種可能的心靈上的平衡。

現代人的慾望是濃烈的。西方資本主義的商業社會中，「慾望」這個字眼兒，早已自基督教文明的「原罪」突圍而出，並不帶有什麼負面的含意。甚至，還是刺激消費與生產的原動力。但是，當人類的物質生活變得如此豐富，精神生活卻相對地充塞虛無、造作的激情，我們也正逐漸喪失了對自然與純樸的美的感應能力。

一九九〇年五月二十日

於華府◎

## 《弱勢群體之聲》 第一集

共  
24  
首

■浪淘沙

## 誰是弱勢群體？

一個幽靈，在中國的大地上徘徊  
 她深淵的恐怖是無邊的海域  
 沉默，懷抱數億個雷霆  
 我帶翼疾飛的詞句呵  
 卻在寒冬撞響了烏雲

極悲不哭的苦難  
 極哀無淚的燃燒  
 披著九百六十平方公里的憤悶  
 這個巨大的幽靈，它充塞虛空的無形  
 集合受害者冤魂的碎片  
 在三百萬海涇眼中  
 湧動、漲潮、游刃如劍  
 她沒有名字  
 她沒有身影  
 她是一切創造者的創造者  
 她是一個偉大的整體

放下鐮刀收穫白條的農婦  
 是她的一部分  
 在車床上白白丟下血手的打工仔  
 是她的一部分  
 被錦衣衛無情踢打的擺攤下崗工人  
 是她的一部分

為兒子的學費賣腎的父親  
 是她的一部分  
 用屍骨鑄起摩天大廈  
 而倖存者找不到歸路的民工  
 是她的一部分  
 交不起漁政費被魚霸的高利貸逼死的漁民  
 是她的一部分  
 掏不出白領戶口薄的「黑領們」  
 是她的一部分  
 還有，懷著一絲善念不能安眠的心靈  
 以及懂得君臨萬物的太陽  
 無法被搶奪的靈魂  
 是她的一部分  
 80%承受著種瓜種出了胡漢山（註一）  
 栽豆結出了南霸天（註二）的  
 普通中國人  
 都是她的一部分  
 這個巨大的幽靈  
 在喘息，她是九州方圓權全的  
 司命  
 她要在林立的高樓間  
 認領自己橫陳遍野的屍骨  
 她要在穿梭的轎車下  
 找到自己被輾碎的血跡

註一：胡漢山——為上世紀70年代著名電影《閃閃的紅星》中的反面人物。一個殘酷壓迫、殺人民的的地主武裝的代表。

註二：南霸天——為上世紀70年代著名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中欺壓百姓的惡霸劣紳。

她要撕開喧嘩的商業中心  
被精美包裝封殺的人肉叉燒、人皮灌腸  
二十多年了，一場兇暴的筵席  
已經到了酒足飯飽的時候  
二十多年了，一場兇暴的種族迫害  
已經到了黑錢洗白的時候

弑母者呵，誰不認得你  
長著錢的眼睛  
權的鼻孔  
獅子的嘴  
臉上散發出豬欄骯髒的臭氣  
渾身濺滿母親的血  
他，正在被人民的內臟撐死  
他，已經太虛肥了  
他，已經疲弱得  
無力銷贓了  
他，滿頭湧動著蛆蟲  
他的軀體是蒼蠅的巢穴  
他的每一塊肌膚每一個細胞  
正在流膿  
蟑螂已經鏤空了他的四肢  
這些寄生蟲把他的腐血  
稱作小康生活的  
葡萄酒

但，人民  
這不死的母親  
這磅礴奔跑著幽靈  
80%從來不惜乳汁的中國百姓  
那些雙手爆裂著憤怒經脈的勞動者  
那些闖蕩大江南北  
被死亡和饑餓燒煉著的無產者  
那些在曠野中投筆鑄劍的武士  
那些被剝奪了最後一份草料的無助者

這無窮的力量  
只有弑母者的顫抖  
和卑鄙者的盲瞎  
才自欺的稱人民——  
這改天換地的巨大偉力  
是——弱勢群體  
就像吸毒者瘋狂痙攣的一瞬  
愚蠢的看不見  
陽光的箭簇，聽不到  
風暴、山崩、海嘯  
雲水震怒的聲音  
人民的聲音：  
「誰是弱勢群體？」

他們弱嗎？  
他們曾砸碎千年枷鎖推翻三座大山  
他們弱嗎？  
他們曾擎轉日月親手托起  
共和國的大廈  
他們弱嗎？  
他曾讓貪官污吏吸血蟲  
聞風喪膽  
他們弱嗎？  
他們曾讓帝國主義在鴨綠江邊  
鬼哭狼嚎  
今天，一無所有的他們弱嗎？  
不，他們有壓迫、屈辱、受盡摧殘的財富  
他們有最威嚴的武器——死亡  
他們正以黑暗的屑沫  
和粗礪的雷鳴充饑  
他們已牢牢地握住了把柄雪亮的  
罪證

一個民族的一念之差哟  
他們把北京看成了毛澤東的故居  
以為大幹快上的是周總理繪製的

## 四化藍圖

但，一個持槍的強盜  
搶竊了九個手無寸鐵者的  
勞動果實  
然後，扔出一塊骨頭讓九個人  
拼搶  
沒有搶到或公而忘私的  
這八個人有罪了呵  
封建式的市場經濟  
就是他們的服役的集中營

在這聽不見受害者呻吟的地方  
那個衣衫襤褸的牧羊人基督  
是典型的弱勢群體  
那個韶山中只顧自學拿不到文憑的  
鄉村民辦教師毛澤東  
是典型弱勢群體  
那個被學術權威們趕出京城的  
墮落文人魯迅  
是典型的弱勢群體  
那個交不起音樂學院學費的  
青年民工聶耳  
是典型的弱勢群體  
還有所有對良心、愛情、美  
和人的生活抱著一絲人性的人  
是典型的弱勢群體  
他們和一切只顧埋頭把蛋糕  
做大的人一樣  
只分到滿腔的欺辱和饑寒交迫

是的，他們是囚徒  
苦難中的難友兄弟  
尖刀在他們石頭般皺紋間  
磨礪過  
失學、無錢就醫、無理可訴的

鞭子每日抽打著生活  
失去在自己的土地上播種  
並收穫麵包的人們  
勞作中用鐮刀和斧頭分開  
黑夜和白晝的人們  
隨陽光在莊稼、河流  
鐵道、作業簿上乞求的人們  
像宇宙的瀑布跌落人間的  
命運轟鳴的人們  
像蜻蜓一樣在生存的風中  
迎著死亡顫動的人們  
像磁石一樣堅強的  
吸附著血塊記憶的人們  
男人、女人、老人、兒童  
寒冬樹根般緊緊抓住大地胸膛的  
人們  
此刻，我一個下崗女工的心  
看見了這些復活中的事物  
旗幟的種子一般  
狠狠地待命於中國地下的  
激情  
那是天空神偉的高處  
將五顆光芒四射的星辰  
命令在血海翻湧的旗幟上的  
使命

看，劫後的原野上  
忿怒的胸牆壘成長城  
穀穗是上膛的武器  
民風在呼嘯  
時間像烙紅的鐵  
灼焦了中國的心  
「誰是弱勢群體？」  
我們嗎？不  
只有自絕於人民者  
才註定是真正的

## 弱勢群體

中國的貓子貓孫們  
這些人民的叛徒  
假借捉鼠之名闖進  
祖國金庫的  
強盜  
才是真正的弱勢群體  
吃喝嫖賭、魚肉百姓  
不用付費的當代和珅們  
才是真正的弱勢群體  
恨不能把中國倒賣成美國東部的  
一個州的當代李鴻章們  
才是真正的弱勢群體  
向帝國主義的炸彈和飛機  
行下跪禮的當代汪精衛們  
才是真正的弱勢群體  
想方設法把中國變成世界妓院的  
政治流氓們  
才是真正的弱勢群體  
拉皮條的帳房經濟學家們  
才是真正的弱勢群體  
把不用成本的中國  
宏觀調控成四大家族的托拉斯的  
正人君子們  
才是真正的弱勢群體  
右手寫一句賣炭翁作秀  
左手挽十個小蠻腰的  
小資白居易們  
才是真正的弱勢群體  
侏儒門童般的以自賤賤人為生的  
「人大代表們」  
才是真正的弱勢群體

人民，十幾億人排山倒海的意志  
從來不需要人代表

工人、農民、士兵、學生  
擺攤的面色師  
他們從來就在勞作中發出著  
主席台宣判的聲音：  
「倒賣世紀偉人毛澤東  
把毛澤東思想勾兌成  
謀財害命的假酒  
毒死正義和善良  
毒死黨心、軍心、民心的  
黑心販子  
是人民的公敵！」

人民要舉起勞作中一貧如洗的  
雙手  
把它捏成霹靂的拳頭  
人民要高擎鐮刀和斧頭  
像無敵的英雄  
只有我們是創造世界的主  
主人翁  
四面八方的勞動者啊  
揮舞我們風雷激蕩的雙臂吧  
揮舞我們傷痕累累的生命花束  
揮舞我們浸染二十年的血衣吧  
揮舞我們被壓迫者的旗幟  
衝破金錢和權力的牢房吧  
五湖四海的窮人要呼吸  
自由和平等的空氣  
砸碎豺狼虎豹的洞穴吧  
人民必在屹立千百萬的戰士中  
再生  
這就是我們強勢群體蕩滌塵埃的  
歌聲  
每一個遭受摧殘的心  
火山般的噴發的歌唱：  
「要掃除一切害人蟲  
全無敵！」

# 弱勢群體的籍貫

永恆女神顫慄著  
呻吟傳遍亞細亞的腹地  
火焰和風暴落下來  
你創造泥土呼吸的意志  
你母性遼闊的手  
無限勞作揉捏黑暗的仁慈  
女媧，你女性的多情  
你神性的悲憫  
你牝牡一體的作坊  
這些華夏的受造物  
那玩意兒  
本不是東西——  
人，體面的劊子手或強盜  
正將你金色七彩的胸脯  
五馬分屍  
弑母者  
這樣稱呼你撕裂的聖軀  
——弱勢群體

而真正的人啊，為什麼都非你親生  
抱養的恩澤  
卻在泥土的子宮裡  
洗淨了下身  
沐浴東方山林散發焦苦的太陽  
卻擁有一把和風之椅的  
忠誠  
女媧，你的義子  
從來沒有繼承權  
老聃、莊周、陶淵明、曹雪芹  
還有現代墮落者  
魯迅  
和你一樣懷著同一弱勢的命運  
是弱勢的歷史中  
最弱的孩子  
惡人，不放過他們  
體面的劊子手和強盜  
還要吃他們  
不朽的  
靈魂



# 光州， 難以墜落的記憶

現在，書頁在日午酷熱的陋室裡，  
依自身輕薄的重量，找尋夏天……  
從島嶼南方吹來的一陣孤寂之風。  
書頁中，有人起身，以他素樸的肩膀，  
凝鍊的眼神，以及夾雜著殖民時期混音的  
話語，對我訴說一場肅殺。天亮之前，  
記憶隨著乾涸的血逐漸蒸發；微明中，  
時間藉由一雙萎弱而纏滿藤蔓之手，  
緩緩拉開一扇窗。朝向一座城市：  
置身窗外的我，顫慄的身體，  
傾斜的目光，還有彷彿歷經世紀之久  
依舊激切的情緒。於是，我目睹：  
幾何造型的光與影，在公共建築的  
樓舍間，如春天難以設防的利刃，  
瞬時間，切割過一具具堆疊起來的  
屍身。光州，1980……。空降師  
戒嚴的子彈；市民身體上剝不落的血衣；  
穿越噤默夜空的學生革命的吶喊；還有，  
這個日午，走過殉難者墓碑前，那些乾涸的鮮花；  
那些殷切的土丘；那些已然側身世紀之外，卻又  
始終不忘回返的魂。難測的屍骨之溫，  
在我靈魂深處的旅站徘徊；轉身，才發現，  
我仍然身處時間的窗外，亞洲的窗外，  
無法不去面對的，卻一直隨波逐流的  
冷戰的窗外。

■鍾喬

後記：1980年發生於南韓光州的民眾抗爭事件，雖然在血腥鎮壓中落幕；但運動所帶起的對亞洲冷戰／獨裁體制的反思及行動，卻至今仍未停熄……。

子彈到底幾顆，幾顆子彈  
誰問，誰舉手，問誰  
正規兵工廠早經授意陸續打烊  
廠長想要，不要換黨  
回家坐在電視機前呼嚕嚕打鼾  
涎垂三尺比夢還長  
有的招呼席哈克，有的撞倒密特朗  
幻影兩干，拉法葉追贈尹清楓少將……

前面那一顆快閃失卻準頭  
活脫台灣本土版曼波  
實體鮪魚肚內臟也得躲開惡臭  
後面那一顆屏息精心  
貼緊下腹膀胱上方浮潛穿透  
翩翩降臨假的真神團夥  
真的假鬼閉嘴全部轉身向後  
一切詞藻形容寧非世俗的形容

江湖幕啓遠及開天闢地  
江邊泥淖而湖心妖嬈  
潦落去，潦落去  
勒驚蝦小  
摸啦啊兼洗褲勒驚蝦小

銅彈頭鉛彈頭莫非昔日蛋頭  
鉛彈殼咳咳銅彈殼也咳咳  
聾子聽見？槍聲邈邈不知去向  
炮竹煙霧瀰漫至白  
除了盲者，目矚攏總key勾到屎

——2004年愚人節於臺北新店

# 兩顆子彈

■施善繼

《新二二八史像》 編著◎曾健民 / 定價NT350

80篇歷史證書

首次大量出土新史料；事件當時大陸、香港報刊雜誌上的二二八評論、報導，以及詩、小說、創作

有初次公開的第一手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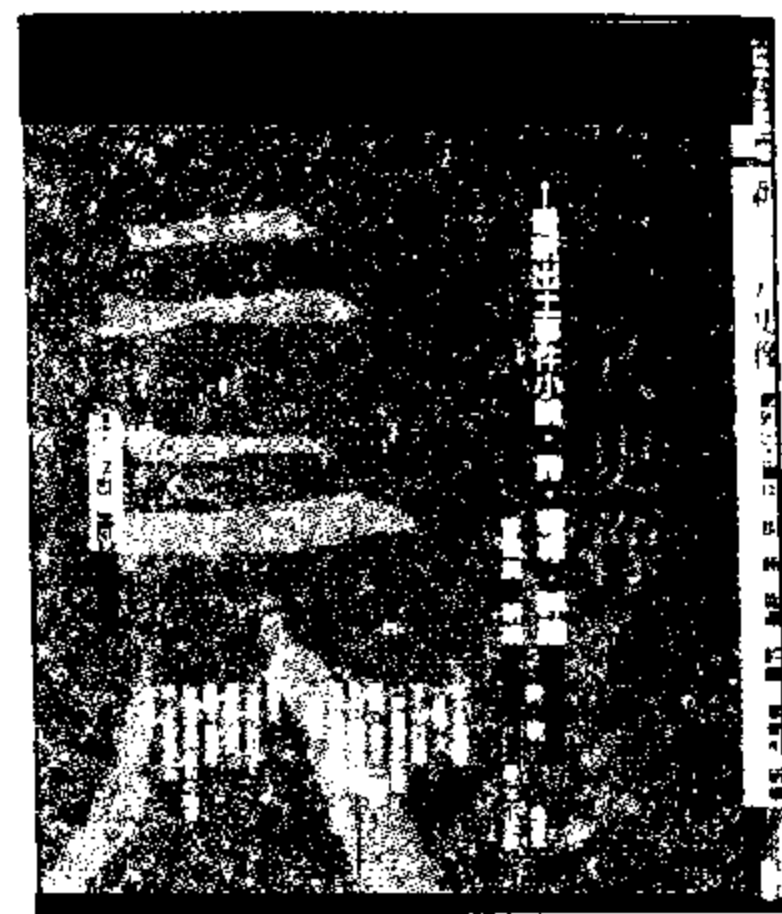
二二八女鬥士謝雪紅《告同胞書》

名記者范泉《記台灣的憤怒》

文匯報記者董明德《孤島一月記》

蘇新的《台灣的前途》

名作家郭沫若的《還要警惕著不流血的二二八！》



《天黑黑嘜落雨》◎詹朝立 / 定價NT350

——十二萬農漁民大遊行傳真

「1123·與農共生」大遊行總指揮詹朝立親筆力作

文化評論家南方朔推薦：

「這本著作，所記述的不只是一次大遊行的因果經緯而已，更是當今台灣農漁民和農漁會艱苦情況的紀實報告，充滿了理解與悲憫的抗議情懷。」



《走進台灣》◎周良沛 / 定價NT300

——光和影的心靈紀實

作者周良沛是一位大陸資深的進步作家，且在台灣有豐富的生活經驗。本書超越了兩岸的歷史糾葛和現實迷障，以更廣闊的視野和深刻的感情，用獨特的紀實散文風格，描寫了台灣生活底層中許多不知名的或知名的人和事。藝術地概括了九〇年代前後台灣複雜的社會變動中的光和影，有鮮明的時代感。



直接訂購八折優待

台灣社會科學出版社 郵政劃撥 / 19747069

■電話 / (02)87714051

■傳真 / (02)87713801

■電郵 / tssra@sinamail.com

■地址 /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238巷2號2F

□涂照彥

###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 四八〇元

從日帝獨佔資本與以地主、佃農制為主軸的本地資本間之矛盾，解明殖民地台灣經濟形成的過程與本質……

□劉進慶

### 《台灣戰後經濟分析》 三五〇元

從「公業」、「私業」雙重構造，官商資本的支配，對美日經濟的附從化剖析台灣戰後資本主義（一九四五～一九六五）的性質與構造……

□段承璞

### 《台灣戰後經濟》 三五〇元

探討台灣戰後資本主義（一九四五～一九八五）中官僚資本、集團企業資本，僑資、外資、中小企業資本，分析台灣外貿與產業構造的變貌……

□谷浦孝雄

### 《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 二五〇元

以六〇年代後高度成長的構造為焦點，解明做為美、日中心國家加工基地而發展的台灣戰後資本主義之結構……

□陳玉璽

### 《台灣的依附型發展》 二四〇元

分析深層結構轉化及帝國主義體系功能變遷，以解明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發展之機序，並批判地探討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的相應性……

□隅谷三喜男 / 涂照彥 / 劉進慶

### 《台灣之經濟》 三六〇元

刻劃台灣「獨裁下的成長」和民間經濟向海外擴展的勢頭。從農業、工業、勞動、金融財政、貿易和經濟體質，解明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的實相。

□Winekler等編

### 《台灣政治經濟學諸論辯析》 三八〇元

以西方當代保守派的、自由派的和激進派的社會發展理論，分析台灣資本主義的本質和結構，並交互進行各派分析之分析，檢視三派政治經濟學在台灣研究上的貢獻和極限。著名社會學者，除編者外，R. E. Barret、T. Gold、D. F. Simon之台灣資本主義論的總匯，向台灣在地社會學界提出無從迴避的詰問……

■杜繼平

### 《階級·民族與統獨爭議》 三八〇元

#### ——統獨左右的上下求索

台灣戰後世代第一個接受完整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育的學者杜繼平，在科學對待當前大陸社會主義性質的基礎上，闡明當前台灣左翼應以克服民族在外力干涉下的分裂構造，追求祖國統一，並從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揭發台獨運動的本質，批判郎中「左」派陳芳明知識上的荒疏，振臂呼喊「做一個理直氣壯的統一派」……

#### / 本書要目 /

1. 從世界體系的觀點看台獨運動的過去與未來
2. 統獨左右問題的上下求索
3. 跳蚤「左派」的滿紙荒唐言  
——評陳芳明的所謂左翼台灣史觀
4. 做一個理直氣壯的左翼統一派
5. 從《台灣論》風波剖視台灣分離主義的奴才意識

凡平 1987 年，可享有以上書籍 8 折優惠，郵撥時請填上訂戶編號。若須掛號則加收二十元。

出版社：新華出版社  
郵撥帳號：一一七四六四七三 / 電話（〇二）二三二二三五七